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

第一卷

署 總 版
館 書
章 藏

華 崗 編 著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印行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		圖書分類：	
徵集圖書樣本表格		1950年 2 月 2 日收到(註1)	
書名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		
原書名(註2)			
作者	華崗	譯者	
編者		叢書第	種
出版者(註3)	遼東分館		
印刷者(註4)			
發行者(註5)			
本書連封面共 224 面 32 開本. 印 3000 冊			
1949年 8 月出版(初版於19 年 月 在 出版)(註6)			
基本定價：5.50 元 (另有 裝本定價 元)			
1950年 2 月 2 日繳送			
繳送者(簽字)			
遼東分館			

註1. 此處不必填寫。 2. 譯著須填外文原書名。

註3.4.5. 填寫機關名及所在地。 註6. 重復書須填寫此項。

627.64
502-4
3:1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

第一卷

華崗編著

北京新華書店總發行



3 1764 9975 8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

第一卷

編著者 華

崑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

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店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 第一版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一卷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三三
第二章	鴉片戰爭	三三—六〇
第一節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與鴉片戰爭的起因	三三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經過與平英團的起義	三九
第三節	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與民族自衛運動的再起	四五
第四節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	五一
第五節	帝俄的侵入——中俄交涉	五八
第六節	鴉片戰爭的性質和教訓	六三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	六九—一〇二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發生的背景	六九
第二節	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中國農民戰爭	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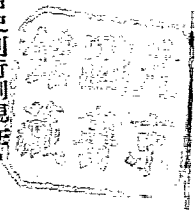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勃興和戰爭……………	七八
第四節	反革命的崛起和太平天國之衰亡……………	八二
第五節	太平天國革命中的三合會暴動和捻黨叛亂……………	八七
第六節	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	九二
第七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其歷史意義……………	九八
第四章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	一〇三—一〇六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列強侵略中國的新姿態……………	一〇三
第二節	法國掠奪安南與中法戰爭……………	一〇七
第三節	朝鮮獨立問題與中日甲午戰爭……………	一一一
第四節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的教訓……………	一一九
第五章	戊戌政變與義和團運動……………	一二七—一五八
第一節	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	一二七
第二節	維新變法運動的產生和發展……………	一三四
第三節	戊戌政變的經過及其平償……………	一三八
第四節	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和特質……………	一四二

第五節	八國聯軍之役與列強的衝突	一四九
第六節	辛丑條約與拳亂事件之評價	一五四
第六章	辛亥革命	一五九—一九〇
第一節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和鬭爭	一五九
第二節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辛亥革命前立憲與革命之爭	一六六
第三節	與中會與同盟會的產生和活動	一七一
第四節	辛亥革命的經過和意義	一七六
第五節	辛亥革命的結果和教訓	一八二
第七章	五四運動	一九一—二一六
第一節	五四運動的國際環境	一九一
第二節	五四運動的國內環境	一九九
第三節	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	二〇五
第四節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教訓	二一一

自序

本書係由中國大革命史改編擴充而成，當然其中被刪削的地方亦不少。自大革命史刊行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九年的歲月。當時本來只是一種初稿，徒因一時無暇修正，而又恐稿件難於保存，乃交由春耕書局暫印數千部，以供給讀者的研究需要。原擬蒐集批評意見，再行修正問世。不料該書正在刊行，作者即被送進所謂特種休息室，從此與外界隔絕者達七年之久，於是修正該書的志願也就歸於泡影。而滬平兩地書商，未徵作者同意，竟將初稿本濫行翻版，其中錯誤脫落，更視原版爲甚。日譯本據說係根據翻印版，錯誤殆更難免。爲補救此項缺陷，惟有將該書重加訂正；但兩年來忙於抗戰實際工作，又簡直無暇及此。最近養病山中，始稍有整理時間，並索性加以改編擴充，使成爲一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這是因爲現在抗戰建國事業，需要參考吸收過去經驗教訓之處，已不限於大革命時期，故現在改編擴充的形式，或許對於讀者要有些用。我的計劃是將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作爲第一卷，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作爲第二卷，大革命以後直到現在抗戰作爲第三卷。這裡先刊行第一卷，第二卷與第三卷如無其他意外，亦將陸續刊行，惟病中精力有限，參考資料亦很不充分，如有錯誤或不妥，尙希讀者不吝指教，以便將來再版時訂正。

本書研究的範圍不是廣義的中國民族運動或種族革命，而是近百年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所以不但黃帝伐蚩尤與周對玁狁，漢對匈奴，東晉對五胡，北宋對女真的抗爭史跡，不在本書研究範圍之



內；即明末清初各地屢起屢仆的種族革命，亦應讓整個中國社會運動史去處理。本書的範圍只是把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民族解放的史實給以忠實的記載和扼要的分析，指出這些運動的根源、特徵和教訓，以便對於當前抗戰建國大業有所借鏡和幫助。我所以從鴉片戰爭說起，也正如有些史家所說一樣：鴉片戰爭乃係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它劃定了近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界址，此後中國社會所有的一切動亂和變遷，都以鴉片戰爭為出發點。鴉片戰爭不僅是中國開始被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濤所衝擊，而且從此引起了中國社會內部重大的變化。鴉片戰爭後，中國不僅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而且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容上，以至文化思想上，都表現了巨大的轉變。所以本書從鴉片戰爭說起，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時，再過幾個月就是鴉片戰爭的百年紀念，我們回溯過去這一百年用血與火所寫成的中國史，不禁會引起無限的憤怒和興奮。因為在這一百年回溯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國際資本主義的群魔怎樣從中國吸吮着背血來澎漲它們自身，怎樣驅使它們的鷹犬來榨取中國人民；而且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怎樣用自己的戰鬥力去反抗外寇及其代理人的吸血和絞榨，來爭取中國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並向我們提示了許多爭取解放自由的道路和方法。因此，我願乘此機會把我的一點研究心得供獻於國人，並願意把這本書作為對於中國現代史百年紀念的一件微末的獻禮。

關於研究中國過去民族解放運動對於目前抗戰的意義，在緒論裡已經有所說明，這裡不再贅述，現在所應該聲明的，就是本書雖名為民族解放運動史，但對於中國內部的社會解放運動也還是加以記載，這是因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根本是不能分離的。在中國現在條件之下，如果沒有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固然談不上社會解放了；可是歸根到底說起來，如果沒有社會解放的實現，也就不能最後消滅民族的壓迫。這一真理，已經有蘇聯活生生的歷史給我們證明。以中國來說，我們只要看鴉片戰爭以後的

歷史也就可以知道，一百年來我們民族的鬭爭的歷史，同時也就是一部階級鬭爭的歷史，一部克服階級矛盾並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來爭取民族澈底解放的歷史。因為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中國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殘餘，是外國資本無限制剝削中國民衆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又轉而維持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不僅如此，帝國主義所以能够在中國取得這樣高的利潤，同時也還依據於中國工人階級生活的低下，勾結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做它的同盟者。所以非常明顯的是：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消滅一切封建社會關係之殘餘，解放中國民族，國內社會關係之革命的改革，這些事都相互聯接着，成爲中國革命之整個的責任。自然，民族的壓迫，可以加速革命危機的成熟，加緊工農群衆的不滿，便利他們的動員，並且賦與革命的起義一種真正民族革命的基本的量和特質。再者，民族的因素不僅能影響勞動階級與農民的運動，而且能影響其他階級的態度，在革命的過程中，改變其結合的形式，這就使民族統一戰線成爲可能與必要。然而無論如何，反帝運動遲早必然要推動廣大工農群衆去進行社會解放鬭爭，這正如工農的社會解放鬭爭不能不喚起全國人民去反對民族的壓迫一樣。這種民族革命鬭爭與社會解放運動互相影響與互相推動的事實，差不多充滿近百年的中國歷史。譬如辛亥革命，直接的原因是由反對滿清專制而發動的，但是它發展的結果，却推動了全國人民去進行反帝運動；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是由反對二十一條件而發動的，但是它發展的結果，却推動了全國人民去進行反對安福政府賣國賊，反對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成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又如五卅運動直接的原因，是由反帝國主義而發動的，但是它發展的結果，却推動了全中國人民去進行反對當時的北洋軍閥；再如民國十六年北伐開始是直接與北洋軍閥作戰，同時

在革命軍佔領的區域，就開始掃除帝國主義的勢力，發展的結果，後來直接收回租界，又成爲直接反帝的運動。這種例證可以說舉不勝舉，細心的讀者自不難舉一反三。因此，本書在民族解放運動史的名義下，同時也記載了中國社會解放的鬪爭史跡，應該是不足爲怪的。

最後，還有必須聲明的一點，即作者去年在武漢時，曾將本書提綱在抗戰常識研究班及兩個類似的訓練班，做過好幾次講演；事後並曾先後收到謝文耀、劉乃仁、彭菊似、曾亞男四位同學經過細心整理的記錄，各人的記錄雖有詳略的不同，但也都有他各人的優點；我現在的刊行稿，其中有些地方就是採用他們的筆記，這是我應當感謝他們的。所可惜的，就是最近接到彭女士家屬來信，知道彭菊似與曾亞男兩君已於今春在戰區工作時犧牲。她們爲了爭取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的勝利，已經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兒女的一分子，也是催促我編著本書最積極的同志，可是她們現在已經不能再看到本書的刊行了。所以本書的出版，也可以說是對她們的小小的紀念。

民國二十八年雙十節華崗自序於重慶南泉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民族擁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位於亞洲東部的廣大地區，全國面積約有一千一百七十七萬三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國土之廣僅次於蘇聯。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的面積爲可耕地，揚子江、黃河、珠江三大河流，由西向東橫貫其間，沿江河沃野平原爲中國最富之區域。物產之豐與礦產之富，爲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農產有五穀食糧，工業原料有棉、麻、烟草、絲、茶、植物油、木料、牲畜、家禽、皮毛、羽角等，礦藏則有煤油、煤、鐵、錫、鎢、鉛、錫、金、銀、銅等，煤的蘊藏總數達九三〇〇〇〇〇噸，鐵的蘊藏總數在十萬萬噸以上。

中國文化是全世界人類與歷史上最最早古的文化，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其中有偉大的思想家、卓絕的軍事家及出色的發明家，有豐富的典籍文藝，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遠在紀元前兩千年間中國已有指南針的發明，而火藥的應用亦在歐人以前。二世紀時即有紙張的出現，七世紀時，已有刻版印刷的發明，到十一世紀更有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其他如華美精緻的金屬品、陶瓷器及光澤美觀經久的染料，亦爲中國自古著名的特產。中華民族是愛好勞動的民族，而勤苦耐勞，愛國熱忱與酷愛和平的精神，尤爲中華民族向來的特色。

可是雖有如此顯著的優點，而至今還是一個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中國的封建社會，延長了二千年，其中雖然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暴動，但是因爲那時還沒有發生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也沒有一個

新的階級來領導農民，所以農民暴動，還祇是被利用去改朝換代。朝代雖然換過不少，而地主階級的統治，還是繼續維持；封建關係，還是沒有打破。這種情形，在過去閉關自守時期，如果還能維持着自給自足的生活，那末，一到十九世紀時，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東方，中國便不免要暴露出自己經濟上的落後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落後性。由於這種落後，我們中國人受盡了外人的打擊。首先是英國人打了我們（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然後英國人和法國人一齊打了我們（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之役），然後甚至三島小日本——幾千年來受中國文化培養薰陶的日本，歷史上尊敬中國為『天朝』的日本，也打了我們一頓（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從此以後，特別是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所以大家都看不起我們中國人，大家都敢於欺侮我們中國人。因此，一九〇〇年的時候，西方和東方的大小帝國主義都聯合起來打我們中國人（即所謂八國聯軍之役）。在中國當時統治的腐朽的滿清及其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完全腐敗的軍隊，自然不能對於外國侵略者實行真正嚴重的抵抗；而滿清所實行的反中國和反人民的政策（即所謂『寧贈外寇，不與家奴』的政策），更助長了外國強盜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滿清在外寇威迫之下，簽訂了各種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賣身契約），中國支付了而且到現在還支付着大量的軍事賠款；根據這些條約，中國開闢了一切最好的江海口岸，讓外國的商品、資本和軍艦自由的侵入；根據這些條約，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根據這些條約，中國把最富藏的礦山都出租給外人成為租借地。外國強盜們在中國整個活的肌體上實行分割，於是我們中國東西南北各方面的邊疆和藩屬都被割去了！外國強盜們把中國最好的地方搶去了，在那些地方開闢所謂外國租界，這些租界，無論在實際上，無論在『法律』上，都是國家內的國家。外國強盜們把中國一切經濟命

賦都搶奪在自己手裡，他們在實際上監督着中國的財政稅收和進出口。在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藉口之下，這些強盜們在中國最心腹之地經常駐紮大批的海陸空軍。這樣一來，中國人民最痛恨的外國強盜們，在中國，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來隨意支配；而我們中國人，在自己家裡反轉來由主人變成奴隸。於是中國由獨立國變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但是我們不但是『偉大的善於夢想的中國人民』，而且還是『偉大的善於自求解除束縛的中國人民』。因此在最近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總是不折不撓地爲解除自己這種被壓迫的被屈辱的半殖民地的情況而奮鬥。

同時，中國的生產力被最野蠻的君主政體和軍閥官僚制度束縛着。當時雖然在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是，在中國依舊統治着中世紀黑暗的清清專制政體然後除了辛亥革命後很短的時期試行民主共和外，又統治着封建性的軍閥官僚制度。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盡了各種可能和難堪的義務，但是中國人民沒有最低限度的人權。如此，經濟的落後，民族的壓迫和政治的黑暗，使中國走到一種非常貧弱的地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經常地挨餓受凍，每年有幾百萬人甚至幾千萬因所謂天災（水旱蟲災、傳染病等）而死亡，而流離失所。中國的統治階級經常不注意建設真正合乎國家需要的國防力，他們把國家的收入多半用在無益的消耗，和裝入個人的私囊；因此，不能建立強有力的國防軍隊去抵抗外寇的侵略，中國就變成了外國經常侵略和進攻的對象。也正因爲如此，所以中國人民異常迫切地找尋各種方法和道路，以便把貧弱的中國變成富強的中國，就是使中國變成人民無飢寒交迫之苦，力能過飽暖生活的國家，以及使中國變成有充足的國防力，能够打退一切外敵進攻和保護自己的每寸土壤和每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國家。因此，在中國近百年史的篇幅上，充滿了中國人民爲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運動和鬭爭。

然而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與中國民族的淪爲半殖民地，以及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發展，都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自有其客觀發展之規律。本書的任務就是想根據歷史科學的基本法則，對於上述現象加以較有系統的研究，以期從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研究上，能夠得出一些應有的結論——其發展規律，其經驗教訓，以便有所助益於當前的抗戰建國事業。緒論的目的是要略略說明一下民族運動與民族革命的時代性，以及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在總的世界革命中所處的地位和意義，並說明一下本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作爲讀者在閱讀正文之前的一種準備。

本來，殖民地並不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才出現的，當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就已經有了殖民地。古代以奴隸制度爲基礎的羅馬，即曾經進行過殖民地政策。在資本主義發生之初，殖民地也會起過很大的作用。殖民地的劫奪，乃是資本原始蓄積的重要來源之一，先進國家奪取和擴充殖民地的鬭爭，是跟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分離的事實。同時，在西歐形成近代民族的過程，也是與西歐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民族獨立、民族建國運動的過程相符合的。在舊的封建社會內，舊的生產關係及舊的封建國家阻礙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發展，乃產生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民族獨立及民族建國運動，這些運動之完成是經過許多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及許多次民族戰爭的。

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前，英國會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封建國家。英國一六四〇至一六四九年資產階級大革命是比較澈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領導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及城市貧民去推翻了英國封建國王、貴族、牧師、紳士們的政權，在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會由英國人民法官一百三十五人，公審當時英國國王查理士第一，由法官當衆宣布：『查理士第一爲專制者、叛國者、虐殺者，是本國善良人民之公敵，判處死刑。』真的，在法官宣布後，查理士第一送上

斷頭台了，並且宣佈了英國爲共和國。經過這次革命，並經過一六五二至一六五三年對荷蘭的戰爭，英國把荷蘭打敗了，英國民族統一、民族建國才得到了初步成功。然而，終因克倫威爾在一六五三年解散了英國國會，實行了軍事獨裁，並因後來英國國王又會復辟，英國共和民主政體又被推翻了，而進於反動時期。至一六八八年又發生了第二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即所謂貴族革命，英國乃變成了近代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的國家，名義上雖然存在有國王，實際上一切政權都在資產階級國會所產生的政府手內。經過這兩次的政治革命，又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在英國很迅速地發展起來，後來發展成爲現在的英國帝國主義。英國本身也由一個進步的民主國家變爲現在帝國主義的擁有許多殖民地的多民族國家，而英國民族也變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

法蘭西共和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法蘭西民族是怎樣統一起來的呢？這也經過了許多次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與反異族侵入的民族戰爭。在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前，法國在經濟上是一個農村經濟佔絕對優勢的國家，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會是農民，工業則以不滿十個工人的手工業佔優勢，而有十萬人以上的城市，不過巴黎與里昂罷了。在政治上一切政權會經落在國王、貴族及僧侶等級手內，第三等級的平民完全沒有享受任何權利。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法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會是比较徹底的革命。在一七八九年革命政府發表了有名的人權宣言，廢除了身分、等級等特權制度，推翻了國王、貴族、僧侶的舊政權，建立起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權。特別是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四年的雅各賓派的小資產階級專政，曾經毫不留情地打擊了摧毀了一切舊的封建勢力。在一七九三年一月，革命政府公室通敵（奧國）逃跑的國王路易第十六，當時在群眾高喊：『與其死十萬人，不如殺死路易一人；祖國

不能亡，所以路易不能不死」等要求下面，法國憲法會議終以多數通過了判處路易第十六的死刑。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震動了當時歐洲諸國，使得當時歐洲各國的反動封建君主膽寒心驚，奧普英俄瑞典等國會經共同訂立了所謂神聖同盟，武裝進攻法國革命。法國人民爲保護法國大革命，反對反革命的君主同盟而進行的戰爭，曾是革命的民族戰爭。但是，後來拿破崙建立法蘭西帝國，奴役歐洲許多國家，法國民族戰爭又變爲帝國主義的戰爭。

如果沒有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如果沒有摧毀法國封建國家及對外民族戰爭，法國民族是不能統一起來，而法國民主的民族國家也是建立不起來的。雖然，這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君主，但是，後來又經過兩次君主專制與兩次革命，始建立起近代法蘭西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却是建築在鎮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上面的。近代的法蘭西共和國雖然是實行一八七五年以來的民主憲法，然而，法國人民究竟還是處在資產階級壓迫剝削之下，法蘭西民族也由解放的民族變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法蘭西共和國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宗主國，壓迫和剝削法屬非洲及安南等殖民地內被壓迫的民族。因此，我們說，法國民族不是自由的民族，因爲『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

德意志民族是怎樣獲得獨立的？德意志底統一是怎样恢復起來的呢？列寧說：『德意志底統一，在當時各階級力量對比關係中，可用兩種方法來實行：或者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並建立德國共和國的革命來實行；或者是用普魯士底鞏固，普魯士地主們在統一德國的領導權的那些皇朝戰爭來實行。』（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五四七頁，論培培爾一文。）

然而，因爲在十九世紀前半葉及中葉德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及組織上還是很薄弱，並因爲拉沙爾及拉沙爾派看得無產階級的民主的道路很少可能，而投降了俾士麥，結果，德意志底民主的革命統一

遭受了失敗，而德國民族及德意志國家是按俾士麥的道路，在普魯士君主制度領導下恢復了統一。在普魯士君主制度領導下的德國統一，是曾經過三次對外的民族戰爭的。第一次是一八六四年德丹戰爭，普魯士聯合奧國而戰敗丹麥。第二次是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普魯士聯合俄法意，使奧國陷於孤立，而戰敗了奧國。第三次是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普魯士聯合俄奧，使英國中立，而戰敗了法國。馬克思認為：普法戰爭在德國歷史上是進步的戰爭，因為它是反對法國拿破崙第三的專制，並且是恢復德意志底統一；但是，當德國軍隊逼近巴黎，已喪失了防禦的性質，馬克思則又反對德國向法國的侵略。

德意志民族及德意志國家雖然統一了，但是，德意志的人民並未擺脫資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特別是當目前法西斯統治德國時，德國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都被剝奪了，德意志民族是最不自由的民族。

意大利民族是怎樣獲得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呢？是從反中世紀封建殘餘與反對法奧異族侵入的鬥爭中獲得的。在統一前，意大利會是一個散漫而不統一的封建國家，在當時意大利領域內會有幾個小獨立國及其他小附屬國。意大利內部封建勢力及異族法奧之侵入，阻礙了意大利民族及意大利民族國家之形成。先是拿破崙第一侵入意大利，為意大利的國王，後又是奧國梅特涅侵入意大利。經過反對奧法及羅馬教主的三次戰爭，始獲得了意大利國家底統一及民族獨立。第一次是一八三〇年在意大利權炭黨領導下的民族運動，會企圖從奧國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但是被奧軍鎮壓下去了；第二次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在加里波的領導下會進行了反對奧普的民族戰爭，會將奧軍驅逐出境，建立起羅馬共和國。但是，由於意大利內部不團結，這次民族運動也被奧法聯軍所鎮壓下去了。第三次

是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七年反對奧國的民族戰爭，意大利在這次戰爭中與法國聯盟，聯軍將奧國打敗了。因為對奧民族戰爭的勝利，意大利內部都統一於薩丁尼亞，而於一八六一年成立了第一次意大利國會於吐林。資產階級的意大利民族國家得以初步形成。然而，當時在意大利之羅馬尙駐有拿破崙第三的軍隊。祇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法國失敗，拿破崙第三撤退羅馬駐兵，意大利始定都於羅馬。

在十九世紀意大利反對奧法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意大利獲得了勝利，意大利民族得以獨立，國家得以統一。然而，這次統一，與德國一樣，不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革命的民主統一，而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自上而下』的統一。因此，意大利底資產階級，在自己掌握政權以後，實行侵略其他弱小民族的政策。強奪非洲的殖民地，奴役別個弱小的民族，意大利民族也由解放的民族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意大利國家由民主的單一民族的國家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自從莫索里尼登台執政以後，取消了意大利人民用許多流血鬥爭所獲得來的民主自由，他把資產階級的民主的意大利變成了法西斯的專制的意大利，使意大利人民及意大利民族呻吟於法西斯的鐵蹄之下，意大利的人民與民族除了推翻法西斯帶統治以外，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與自由。

總括起來說：在西歐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特別是從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第一次大革命時起，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止，這個時期是西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恰恰又是民族運動及建立民族國家的時期。西歐這些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是什麼呢？列寧回答說：『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會與民族運動有聯繫。這種運動的經濟基礎就在於：爲要使商品經濟完全勝利，就需要資產階級奪取國內市場，就需要使語言一致的人民底領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妨害這種語言底發展

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之統一及順利發展是真正自由的、廣泛的、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周轉底最主要條件之一，是人民自由廣泛地團集為各個階級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最後，又是市場與任何每個大經濟主或小經濟主、賣主與買主發生親切聯繫的條件。』（列寧選集第七卷，中文版，三五二頁。）西歐這些民族運動的性質顯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些運動的內容是消滅國內封建勢力，並且驅出異族的民族壓迫，而統一國內的市場，以造成在國內發展資本主義的順利條件；這些運動的形式，則表現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及反異族壓迫的民族暴動及民族戰爭上。

美國，在地理上說來，不在西歐而在北美。然而，美國民族及美國建國與西歐相同。這就是說，近代美國民族形成的過程與近代美國民族國家的建國過程也是相符合的。大家知道，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後，歐洲各國開始向南北美洲移民。在一七五四年至一七六三年英法戰爭以前，英國在北美之殖民地，僅限於北美之東北部，而北美內部大部分為法國的殖民地（所謂新法蘭西）。自該次英法戰爭後，法國失敗，法國大部分在北美殖民地被英國所佔領。

在美國獨立以前，北美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對美的殖民地政策阻碍北美當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了北美人民之反抗，產生北美獨立運動，要求脫離英國而獨立，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民族國家。北美利加民族的民族獨立及北美合眾國之建國，亦曾經過兩次對外民族解放戰爭及一次對內民主戰爭始行獲得。第一次北美獨立戰爭在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一七七五年四月在費拉特爾費亞第二次大陸會議上，北美宣佈對英戰爭，發行自己紙幣，開始組織革命軍隊，舉華盛頓為革命軍的總司令。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發表了北美獨立宣言，宣佈北美十三州脫離英國而獨立。當北美革命軍開始與

英作戰時，僅有一萬七千人，糧食、彈藥缺乏，革命軍士兵及長官多爲平民，缺乏軍事訓練與作戰經驗，革命軍被英國軍隊打得一個大敗，北美工商業中心城市紐約失陷，爲英國軍隊所佔領。當時，北美革命政府爲着反抗英國，會派富蘭克林出使歐洲，尋求同盟國。當時法國因爲反對英國強奪其殖民地，並在歐洲與英爭霸，而利於滅弱英國。因此先在暗中援助北美獨立，至一七七八年，公開與美訂立同盟條約，公開援助北美獨立戰爭。當時西班牙、荷蘭亦援助北美獨立。法荷西等組織義勇軍數千人赴北美，參加北美抗英獨立戰爭，其中有鼎鼎大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經過八年苦戰，英美互有勝敗，終因北美內部團結一致，不向英國妥協投降，英國政府無法，始於一七九三年三月訂立英和平條約，英國承認北美十三州的獨立。這次北美獨立戰爭，雖然有法荷西之援助，他們會包含帝國主義之目的，然而，這次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真正爲求解放的革命戰爭』。（列寧）

英國雖然在一七八三年承認了北美的獨立，然而究竟還未放棄自己底野心，仍然企圖把北美變爲自己底殖民地，取消北美之獨立，因而爆發了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四年的第二次英美戰爭。戰爭開始時，美軍佔優勢；但自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征俄國失敗，英國在歐洲無後顧之憂，乃集中兵力，大舉攻美，英國海軍將美國各海口一律封鎖，美國京城華盛頓於一八一四年八月亦被英國攻下。然而，當時美國政府並不因京城失陷而向英國投降，仍然堅持繼續抗英民族解放戰爭。英國無可如何，乃於同年十二月與美國議和，仍然承認了北美的獨立。

北美在兩次對外民族解放戰爭中奠定了北美合衆國的基礎，然而，不到五十年又會爆發了一八一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南北戰爭。這次戰爭乃是代表地主（黑奴主）利益的南方，不滿意代表工業資本

家利益的北方解放黑奴的政策，因而引起的。這次戰爭從歷史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代表工業資本家利益的北方會是進步的民主的，代表黑奴主利益的南方是反動的反民主的。這次戰爭的結果，南方失敗，北方勝利。從此以後，南北美在經濟上政治上等方面都統一起來，北美民族形成爲一個近代的先進民族，美國成爲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共和國，國基得以鞏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達達到驚人的速度。然而到十九世紀末，美國也已變爲帝國主義的國家，藉口西班牙人殘酷壓迫古巴革命，於一八九八年派艦隊與西班牙開戰，不到四個月而克服了西班牙的海軍。西班牙割菲律賓群島與美國，爲美國之殖民地，西班牙並承認古巴之獨立。從此，古巴在形式上雖然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了，可是實際上却變成了美國的附屬國。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因爲美國及西班牙都是爲着爭奪殖民地而戰爭，並非爲着那一方面的民族解放而戰爭。從這次戰爭以後，美國由單一民族國家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多民族國家，北美利加民族由解放民族也變成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

如上所述，各先進資本主義的國家由單一民族的國家變爲擁有很多殖民地的多民族國家，由獨立解放的民族變爲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許多原來獨立的國家却變爲不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許多原來獨立的民族却變爲不獨立的被壓迫民族的奴隸。這是一個現象的兩方面。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存在着而無民族壓迫，不去搶奪殖民地，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到了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列強佔殖民地尤其來得厲害。因爲資本的不斷集中而尋求出路，生產力的擴大，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狀態中所起的消費限制，以及因此而必然發生的經濟衰疲和利潤降低的不斷威脅；這些原因，都迫使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的向外擴張，尋求殖民地，以便開發起來，一方面當作資本輸出的市場，一方面也當作商品輸出的市場。同時，又可從土人手中提取來原

料運回本國，並以國家權力所及的各種強硬方法，迫使土人做工，而給以不够一飽的低微工資，以實現它們超利潤或高利潤率的目的。加以資本積聚和集中率，引起了強大的壟斷團體（卡特爾、新透加、托辣斯）底形成，引起了由銀行併結而成的巨大企業的新形式。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融合，大地主之加入資本主義組織的整個系統內以及此種資本主義形式之獨佔性質，遂使工業資本時期變為財政資本時期。代封建壟斷與商業資本壟斷而起的工業資本時期之自由競爭，現在一變而為寡頭財政資本的壟斷了。但由自由競爭中產生的資本主義的獨佔並沒有消滅自由競爭，而是駕乎它之上和依傍它而存在的。因此更招來了無數特別緊張，嚴重而深刻的矛盾，傾軋與衝突。對於這現象最初研究得最正確深刻的是列寧，他曾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又說：『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個定義，包含了最主要的現象：『一方面，因為財政資本就是少數壟斷式的大銀行跟工業家獨佔團體資本相結合的一種銀行資本；別方面，因為世界的分割，就是從毫無阻礙地擴大未被資本主義列強所佔領的地方的殖民地政策，轉變而為壟斷業已澈底分割的領土面積的殖民地政策。』

在這時期，一切從前還是『自由』的殖民地已被瓜分，為着重新分割殖民地與勢力範圍而發生的糾紛和衝突，乃漸次帶着武裝鬭爭的性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就是英法德等最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為重新分割世界市場與殖民地而進行的最露骨的劇烈的鬭爭。殖民地成了帝國主義的投資場所和原料的源泉，成為帝國主義的生命線。如此，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便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是所謂少數『文明』民族的營壘，這些民族握有財政資本，而對地球上大多數的民族加以全融的統治及殖民地的壓迫；另一個是殖民地及附屬國家被壓迫及被剝削民族的營壘，這後一個營壘佔有

地球上人口的絕大多數，約有十二萬萬以上的人口。如此，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世界的問題，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內被壓迫民族要求解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的問題。這也就是說：不能像第二國際考茨基、包威爾等機會主義者，把民族問題只限於注意歐洲幾個「文明」民族的問題，而忽視了亞非洲成萬萬的「不文明」人、有色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問題。『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端不符合的情形，毀壞了那個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中間的，歐洲人和亞洲人中間的，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中間的牆壁，這樣便使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八十九頁。）

民族問題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解釋說：『這並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為這是兩件不同的東西。至於說民族問題不能與農民問題看作一個東西，因為除了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國家等等問題，那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內在的本質，仍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點而說的。』（斯大林著論民族問題三三二頁。）在一九二五年共產國際討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時，南斯拉夫共產黨員舍米契不願意把民族問題的實質看為農民問題，而把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看作為資產階級相互間的競爭，這是因為他輕視了民族運動的內部力量，而不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地民衆的、深刻地革命的性質。斯大林曾經堅決反對舍米契的這個觀點，斯大林說：『當然，斯拉夫族及克羅阿脫的資產階級與賽爾維亞資產階級間的競爭，在民族運動中也能起相當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民族運動之社會意義看作為各民族資產階級競爭的人，就不會把民族問題看作為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這也

是同樣毫無疑義的。現在民族問題已由地方的和國家內部的問題變為世界的問題，變為關於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帝國主義鬭爭的問題。這時候民族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現在民族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殖民地及附屬國內民衆反抗統治民族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財政剝削、政治壓迫及文化掠奪的鬭爭。在這一民族問題的提法之下，各種不同民族底資產階級相互間的競爭，能有何種意義呢？這種意義當然不是決定勝負的，有時甚至不是主要的。很明顯的，這裡最主要的問題並不在於：這一個民族底資產階級在競爭中，把另一個民族底資產階級打敗或能打敗的問題。這裡的問題是在於：佔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者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的基本群眾，首先是農民群眾，而這種剝削和壓迫同時就引起他們反帝國主義的鬭爭，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同上書，三六七至三六八頁。）這一個問題在我們中國更有重要的意義，因爲農民佔中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農民群眾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軍隊，同時因爲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中國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所以消滅一切封建社會關係之殘餘，合理地解決土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乃是中國民族革命之整個的責任。這一個問題在目前抗日戰爭中，顯然是一個有深刻意義的問題。幾萬萬農民與一般勞苦大眾，既爲全民族的柱石，那末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要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就非切實改善民生，並用民權的方法把幾萬萬農民動員組織起來不可。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通常總是被人曲解，常常被縮小到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於達到這樣的地步，就是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這種情況便使民族自決觀念曾經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武器變成辯護吞併政策的武器的危險。現在中國也還有人抱着這種觀點去對待國內其他少數民族，這自

然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旨不相符合。列寧與斯大林更擴大了民族自決底概念，把它解釋爲殖民地及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是各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利。這樣，就使人們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民族自治權來替併吞政策辯護了。至於那些在表面上掛着『民族自決』或『民族自治』的招牌，實際上却是鞏固和加強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統治，則不管在口頭上或表面上說得多麼好聽，在客觀上却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民族運動。例如日本帝國主義爲着併吞中國，爲着分裂我中華民族的內部團結，提出『蒙古民族自治』及『建立蒙古國』的口號，其目的是在挑撥少數蒙古人來反對漢人，想利用蒙古民族內一部分民族敗類如德王者來加強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日寇利用蒙古族中這些少數民族敗類，正像利用漢族中的民族敗類汪精衛之流一樣，無非是想達到它以華制華的目的，企圖把中華各民族不論是漢滿蒙回藏等，都變爲它的奴隸，根本就談不到什麼蒙古人的自決或自治。

從前，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通常都被看作是純粹法權上的問題。第二國際曾拿來誇耀的，就是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的宣言來鼓吹什麼『民族平等』，同時却抹煞了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的）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些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例如上面提到過的那個南斯拉夫共產黨員舍采契），也居然企圖把民族問題降低到憲法的立場，也就是說民族問題不是革命的問題，而是改良的問題。『這些人會經暗中設想，以爲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名而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路，不要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而從容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然而『列寧主義證明了，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

命則證實了：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分。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底革命解放運動內部所含著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都用完了？如果沒有都用完，那末，是否有希望和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將殖民地及附屬國，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列寧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被壓迫國家底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利用這些能力來推翻共同的敵人，來打倒帝國主義。」（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九十一至九十二頁）

由此可知，革命者處理民族問題，不應從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則出發，而應從歷史的具體形勢出發。對於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不應從形式的民主底觀點上去估量，而應該從反帝國主義底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去估量。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也就是說，不能把民族問題與國際環境分開，而必須與國際環境、世界的事變及革命的發達前途聯繫起來。特別是，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運動已開始深入，俄國十月革命已取得勝利之後，我們解決某一個民族問題時，在決定對於某一個民族運動的態度及立場時，更不能不把這個問題與當前的國際環境，整個世界事變及革命發展的前途聯繫起來。

以下，我們再把最近幾十年來世界革命發展的總趨勢，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在這總趨勢中所處的地位和關係，加以簡明的記述。

上面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時期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底時期。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及

其所開展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證明是世界經濟增進的生產力與國家限制間深刻矛盾底直接結果，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內腹已成熟着社會主義底物質前提；它們證明資本主義的外殼已成爲人類繼續發展底不能容忍的枷鎖，歷史已把以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羈絆提到日程上了。從資本主義勢力底中心到殖民地最偏僻的角落，帝國主義把各國無產階級廣大群眾都屈服在財政資本全權統治底獨裁下。帝國主義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暴露着與加深着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矛盾，極度增加被剝削人民底壓迫，驅使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鬭爭尖銳化。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戰爭極深刻地動搖着整個統治制度，而必然地引向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帝國主義把全世界繫在財政資本底鎖鏈上，以饑餓與鐵血把各國無產階級、各民族與種族威迫在它的羈絆下，無阻止加厲對於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與奴役。因而帝國主義把奪取政權的任務直接提供無產階級，促使工人們不分國界、民族、文化、語言、種族、性別與職業底界限與區別逐漸自覺地團結成各國無產階級底統一的國際軍隊。同時，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不絕地增高，這矛盾的壓力主要是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身上，於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便不能不產生它的反面結果，這就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出現，農民的貧困化，革命知識分子的發生，民族的覺醒，解放運動的興起。於是與財政資本強有力的聯合勢力相對抗的，終於有兩個革命的主力結合起來，即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與爲外國資本所奴役的殖民地民衆。這就是表示『資本主義征服殖民地，可是殖民地也給資本主義之崩潰以一個有力的反擊。』

這樣，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而且也就是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時代。帝國主義愈加緊的壓迫與奴役被壓迫民族，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也愈是高漲，而成爲帝國主義國家崩潰的一個原動力。馬克思很早在中國及歐洲的革命一文中就曾說過：『一個探求支配人類運動原理的深

玄的想像家，慣於把兩端相接的法則，稱爲支配自然界秘奧的原則。在他看來，「兩極相遇」這句名言，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偉大而有力的真理。這一個原理，哲學家用之，可以執簡馭繁，如同天文家用克普勒爾的法則或牛頓的偉大的發現（引力法則）一樣。兩極相遇，是否是那樣一個普遍的法則，姑勿深論，而此法則之顯明的表現，是在中國革命必將影響於所謂文明世界的結果看得出來的。『可以大膽地預先斷定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制度底那裝滿着炸藥的地雷上，並引起早已成熟了的總危機底爆發。這總危機，當它傳播到英國國境以外去的時候，就會直接在歐洲大陸上引起政治革命。你看！這將是一幅多麼奇妙的圖畫呀！中國引起西方的震動，而同時西方列強却在英法美軍艦幫助之下，將在上海、南京以及運河口等處規定所謂秩序。』後來馬克思的繼承人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一九二〇年）上，亦曾明白指出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解放運動對於世界革命有絕大的意義。當時列寧不僅指出民族問題祇有和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正當解決，西方各國革命亦須經過與殖民地 and 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才有勝利的可能。並更進一步指明：現在各國帝國主義正集中力量進行反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鬭爭，我們有着全世界先進工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援助，亦必然能够勝利地打退敵人的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會以後各種事實的發展，使馬克思與列寧這種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預見，都得到了輝煌的證實。而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會以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也確實有許多新的發展。一方面，從殖民地是帝國主義剝削所必需的對象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經比以前更成爲帝國主義侵略的經常目標；他方面，許多主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論在經濟上和在整個社會結構上，都已經起了不少的變動，最主要的就是工業的成份已經加增的發展，無產階級跟着長大，農業的危機

也更加劇烈。再則，國際形勢亦已起了巨大的變動：帝國主義的戰線，在它最弱的據點上——在沙皇的俄國——被突破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專制政體，十月革命打倒了資產階級；其他各帝國主義列強在大戰時及在戰爭初停的數年，處境亦都非常困難，革命暴動前仆後繼。如一九一八年芬蘭的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的『搶米暴動』；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奧國和德國的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君主專制的統治；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使資產階級暫時喪失了政權；一九一九年四月德國巴伐利亞亦豎起了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工人佔領工廠；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暴動；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的暴動；一九二三年秋德國的革命危機等。其中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不但剝奪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生產手段，第一次在一個絕大的國家中建立了而且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蘇維埃的這個新的國家型式，因而開始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而且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動搖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及附屬國中的統治。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便打破了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壓迫的鎖鏈，使一個龐大國家中的各被壓迫民族一概擺脫了這種壓迫。沙皇俄羅斯向來被稱爲『各民族の牢獄』，而現在被革命鐵拳摧毀了。向來被賤視的民族，被看作奴隸的民族，從此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高昇至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地位，並以自己的榜樣感動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因此，十月革命不僅開始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而且還展開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新時代。加以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內資產階級因爲得着改良主義者的扶持，暫時渡過國內直接革命恐慌，於是英美法日等國的殖民地政策，又加濃了強盜式的侵略性。這必然更要引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壓迫民衆有力的反抗，推動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普遍高漲。最顯著的如一九一九年五月高麗的叛亂，同年的中國五四反帝運動，一九二〇年一月土耳其民族資產階

級革命一九二五年四月摩洛哥的暴動，同年八月敘利亞的暴動，荷屬印度的起義，印度的革命醞釀。各國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動行爲，差不多都遇到大力的反抗。英國進攻阿富汗竟被擊退，法國帝國主義的大兵竟困不倒敘利亞的抗鬧，里夫民族的游擊隊與法國、西班牙具有最新式武器的常備軍竟能相持兩年之久，美國鎮壓尼加拉瓜民族之反抗亦達一年以上，數萬萬印度工人與農民的革命浪潮，時刻威脅着要搗毀世界帝國主義的城堡——大不列顛的統治，一切這些情形，都證明一九二三年以後，資本主義列強雖獲部分與暫時的穩定，西歐無產階級革命雖暫時退潮，但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却如海裂山崩的起來，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更可說是這種含有極大世界意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代表。中國大革命實是世界革命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不但對於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有極大的啓發推進作用，不但震動了全部的亞洲大陸，而且成爲搖撼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主要原素之一。雖因國共兩黨之分家，反帝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之破裂，使這次革命受到暫時的失敗，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但是這個革命確實給了帝國主義一個相當大的打擊，給整個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人民一個很大的刺激。

斯大林說：「資本主義可以局部地穩定，可以使生產合理化，可以暫時加緊壓迫工人階級，但是它已經不能恢復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前的那一種「穩定」「平衡」狀態了。現在西歐各國以及歐洲資本主義活命的東西——殖民地，已都紛紛地爆發了革命的火焰，就以這一點就可知道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平衡已再沒有恢復的希望了。今天奧國爆發了革命的火焰，明天英國爆發了革命的火焰，後天法國和德國又爆發了革命的火焰，後來，中國、馬來群島和印度等也都爆發革命起來了。歐洲和殖民地是什麼東西呢？這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和四周。歐洲資本主義中心已經不安靜起來，在它的四周還更其不

安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號斯大林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殖民地和中殖民地革命的興起，乃係預告世界帝國主義的滅亡。當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歐洲各宗主國內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大巨流曾經流通全世界，這就是通常所稱爲戰後第一個戰爭與革命的周期。

自從一九二九年美國開始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接着轉變爲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戰後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在經濟上終結了。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錯綜結合起來，並因此而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狀況更加惡化了。日形高漲的經濟恐慌，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和附屬國加緊壓榨，因爲這些國家是銷售商品和取得原料的主要市場。在這方面帝國主義者所採用的方法，就是更加降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生產品底價格，首先是降低原料底價格，其次是降低糧食底價格，此外還實行商品傾銷政策，以及用強迫手段來減低半殖民地國家底關稅率（例如在中國自一九三三年夏季起，根據日本帝國主義底直接要求，對於日本的紡織品及其他商品，減低了關稅率；一九三五年根據美國帝國主義底要求，對於美國布疋等的關稅率，在巴西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在古巴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至六十等等）。因此，帝國主義強國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出口商業大獲其利，而這些國家本來就是荷延殘喘的民族工業却日益衰頹。同時，他們竭力勾結並利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最反動的勢力，以便使自己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侵略易於實行和更加深入。不僅如此，帝國主義還公開進行大規模的軍事侵略，來侵佔半殖民地國家底領土和威脅他們的生存，想把自己所受恐慌的損失來取償於防衛薄弱的國家。最顯明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進行的武裝佔據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侵佔阿比西尼亞的戰爭。這樣就使許多半殖民地人民底民族生存權，直接受到威脅，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革命力量底增長。加以受到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偉大歷史勝利的影響，更推

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來做救亡求生的鬭爭，如中國救亡運動的發展，抗日戰爭的發動（東北義勇軍的發起，上海一二八抗戰及長城抗戰等），並隨合生長成爲後來的全面抗戰；阿比西尼亞武裝抵抗意大利的進攻，安南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起義，南美中美各國解放運動強有力的開展，首先就是古巴的革命鬭爭，智利艦隊中的武裝發動，巴西的民族革命運動，荷蘭艦隊在南洋群島的起義，印度工農運動底高漲，菲律賓群島農底武裝鬭爭，高麗罷工運動底增長（如元山罷工），波斯煤油工人底群眾罷工，阿拉伯各國人民武裝鬭爭浪潮底增長，一萬萬黑種人中間革命鬭爭底開展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反帝運動又多半與千百萬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不可分離地聯繫着，這樣就使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帶着更濃厚更深廣的社會性質。

這些革命還在繼續進展，而新的事件又接着發生。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資本主義世界又開始了新的經濟危機。上次危機到一九三三年末轉爲停滯，工業又開始稍許活躍和稍許高漲，然而這個活躍和高漲並不是那種會有在新的更高基礎上發生的工業繁榮接踵而至的活躍和高漲。世界資本主義的工業，甚至還沒有能夠升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它到一九三七年中期祇不過達到這個水平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六。於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未及治好不久以前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創傷，就又陷入新的經濟危機了。這種情形，就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更其加強。因此之故，帝國主義列強想取償於他國，首先是防衛薄弱的半殖民地國家與其他小國來彌補其因國內經濟危機而受到的損失的企圖，也就日益加強起來了。特別是日德意法西斯侵略國，因爲利用着各民主國家不願實力制裁，尤其是英國張伯倫政策的幫忙，而且乘着民衆尚未團結起來，乘着他們尚未統一起來抵抗法西斯的時候，便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急向半殖民地與其他防衛薄弱的小國進攻。在一九三五年，

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並吞併了它。一九三六年夏季，德國和意大利組織了對西班牙的軍事干涉；同時，德國佔據了西班牙的北部及西屬摩洛哥，而意大利則佔據了西班牙的南部及巴利列群島。一九三七年，日本在佔領東北四省之後，又侵入華北，佔據了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一九三八年初，德國吞併了奧地利，一九三八年秋天，又吞併捷克的蘇台德區。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日本佔領了廣州和武漢，在一九三九年初又佔領了海南島。接着德國佔據了全部捷克和米美爾，意大利佔領了阿爾巴尼亞。一直到最近由於德國佔領但澤所引起的德波英法戰爭，於是，早已開始了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過去階段的片面性，便將為戰爭的全面性所代替。

自然，法西斯侵略國家的這種橫行霸道，決不會不受到懲罰。隨着法西斯主義在國際舞台上轉為進攻，於是反法西斯反侵略運動也日益增長，日益擴大，日益具有更大的國際性質。在德國進攻波蘭的戰爭中，由於波蘭統治實行黑暗反動政治，壓迫少數民族與一切進步勢力，將自己民族命運寄託於英法反動派之手，並盲目仇視蘇聯，以致像波蘭這樣一個有三千萬人民，有三十個師團正規軍，有一千架飛機，有相當發展的工業基礎的國家，在外力進攻下，不到一個月便完全崩潰滅亡；而蘇聯却以紅軍實力去幫助了西境烏克蘭與西俄羅斯人民的解放（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同時在短期內完成，為歷史上開一新紀元），並阻止了德國法西斯的東進打擊了張伯倫、達拉第策動反蘇聯戰爭的陰謀。在民族革命戰爭方面，則阿比西尼亞游擊戰爭尚在繼續發展，捷克人民已開始起義，印度罷工運動正在擴大中，國民大會亦公開發表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揭露英國為自由與民主而戰之欺騙，堅持民族解放，實施民主政治，這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都有了進一步的覺醒，在這次戰爭中不能再像第一次大戰時只處於被動被利用的地位，應該主動的積極的去奮鬥努力

，爭取並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來求得自己民族的解放，掙脫自己的奴隸地位，以推動整個人類歷史車輪前進，幫助全人類的解放。而西班牙與中國的雄偉鬪爭則更在事實上已表明了具有深刻的意義。曼努意斯基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報告國際形勢與反法西斯運動時曾特別說到這一點，他說：『被侵略國家的人民對於外國強盜侵略進行武裝抵抗，當以西班牙人民與中國人民最為英勇。從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偉大勝利以後，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歐洲革命運動以後，這種鬪爭是各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最大事變。這個鬪爭（指西班牙與中國的抗戰）底意義是很巨大的。它牽制着侵略者底力量，它阻礙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繼續擴大，它使國際無產階級易於進行反對其剝削者的鬪爭，它給世界各國反法西斯運動以幫助。』堅持兩年以上的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戰爭，是戰爭形式中頗為特殊的一種。西班牙人民的戰爭，是他們反對財政資本的法西斯蒂，爲了民主、自由、和平的政治底繼續和發展，因此，它是進步的、革命的、正義的戰爭。同時由於這一戰爭不僅是反對國內法西斯以佛郎哥爲首的叛亂，而且直接反對德意法西斯強盜侵略的進攻，因此，它帶着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又成爲國際和平陣線鬪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策動叛軍的叛變時，曾指望獲得輕易而迅速的勝利。他們想在西班牙可以來重演一九二二年圍攻羅馬的滑稽劇。他們想：這將也如西班牙歷史上數見不鮮的軍事陰謀一樣，以爲在一個晚間就可由爬上法西斯獨裁者寶座的將軍取得勝利而結束這個冒險。然而西班牙人民以自己的英勇的鬪爭表明出：使法西斯主義能夠輕易勝利的時期，已成過去。在西班牙的武裝干涉，使德意法西斯侵略者耗費了將近十萬萬美金，消耗了大量軍用品，損失了巨量的人力以及自己軍隊中的許多久經訓練的幹部。武裝薄弱的，被那些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出賣的西班牙人民，爲了自己的獨立，爲了整個先進和進步人類底事業而進行實力懸殊的英勇

鬭爭，將近三年。它進行這個鬭爭來反對兩個巨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德意底軍事干涉，以及反對世界反動勢力底暗中干涉。這世界反動勢力，在歐洲是假借『不干涉政策』，這個虛偽口號，在美洲是假借『孤立主義』，這個虛偽口號，來實行對於西班牙共和國和國的封鎖的。在這個時期，西班牙共和國克服了一些不可思議的困難。在共和國方面，本來是沒有軍隊的，在敵人砲火下，它創造了人民軍隊；這個軍隊，在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如在馬德里城郊，在瓜特拉哈拉附近，在哈蘭姆一帶，在索勃羅河上諸戰役中這樣光榮的篇幅。在共和國方面，本來是沒有指揮幹部的，在鬭爭過程中，鍊成了幾千個鐵般的指揮員和光榮的政治委員。在共和國方面，本來是沒有軍事工業的，它在鬭爭進程中把軍事工業建立起來了，老年和青年，西班牙的母親和少女，都以其全副精力貢獻於這個神聖事業。

西班牙人民底鬭爭差不多在三年內，成了全世界注意的中心。這個鬭爭到處都引起千百萬勞動人民的稱頌讚美和世界反動勢力的陰毒仇恨。西班牙人民以身作則，來號召所有其他各國人民去反抗法西斯挑戰調首，促進了所有各資本主義國家裡和平自由勢力底團結。在西班牙共和國周圍，造成了差不多包括全世界各國的廣大的群眾的同情運動。這個運動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從進行募捐，舉行群眾大會的遊行示威，建立西班牙後援委員會起，一直到舉行政治罷工和組織自願軍爲止。在拉丁美洲諸國，舉行着空前偉大的遊行示威，在遙遠的印度進行着同情西班牙的全民日。對西班牙人民的同情運動，還普及到法西斯國家中去。在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者進行秘密募捐，印刷成千份的傳單，夜間在牆壁上面寫着反法西斯的標語，在軍事工廠裡怠工事件，兵士們拒絕開拔去攻打西班牙共和國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同情運動，在全世界各國都轉變爲勞動者反對本國內部法西斯的鬭爭。

將近三年的圍爭，指示出西班牙人民有着多麼偉大的力量。在軍事上——現在他們是暫時失敗了，這是不容諱言的。但是圍爭並未結束，西班牙人民並未被敵人所征服。今日的壓迫者是絕不能長期的唱着勝利之歌的。歷史可以證明，以前每次反動勢力的暫時的勝利，都馬上引起人民力量的產生，直到打敗反動爲止。對齊加運動的血腥和野蠻的壓迫之後，情形是怎樣呢？反動的不祥烏鴉會叫着：罪惡已把民衆的革命運動完全克服了，但是四月十四日的勝利，指出了民衆並未被征服。一九三四年也是如此。在一九三三年選舉中得到了勝利的反動者，以爲它可以穩固的擁有政權，可是勞動群衆的行動，蔓延到幾乎全西班牙的總罷工，尤其是阿斯杜里亞的武裝起義，表示出人民是仍然在站立着，堅決的自衛着，不讓反動勢力把他們束縛起來。就是經過「兩個黑暗年頭」的野蠻恐怖，經過屠殺與搶劫，仍然不能把工農群衆鎮壓得就範，二月六日（一九三六年）的選舉，又一度證明了反動的勝利只是暫時的。這樣的事實已經幾度的重演過了，它向我們證實佛朗哥的勝利也將只是暫時的東西，西班牙人民仍在圍爭着，在抵抗着。一個從來不願作奴隸的民族，而現在却生活在這種可怕的條件下。他們怎願放下武器呢？圍爭是在繼續着，佛朗哥的勝利只是暫時的。在西班牙發生的大事件，沒有一件是反動的逆行勢力所能解決的。法西斯主義連人民初步需要都無法滿足，它不能給人民以麵包和工作，它不能保證和平，不能給人民以自由。相反的，今天的西班牙是一個充滿着罪惡的國家，它是在德意特務機關無恥的統治之下。上千萬的優秀男女不經過法庭審判而秘密的被暗殺，在牢獄和集中營裡被囚閉着幾十萬愛國者，他們被法西斯任意判處死刑，長期的徒刑和罰作苦工，法西斯主義企圖把一切愛國者，自由主義者，同情自由與獨立的人們淹死在血泊裡面，對巴斯克和加泰隆人民的高尚愛國心是以生死的仇恨去迫害着。他們原有的教育被破壞了，民族慣用的語文被禁止了，佛朗哥和侵略者

這種暴虐野蠻的行動，其目的不消說是企圖把西班牙變成德意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在這種條件之下，人民能够忍受嗎？不！人民是不能忍受的。他們以鬪爭去反對法西斯主義，並且繼續鬪爭一直到獲得勝利爲止。『西班牙人民的事業是一切進步和先進人類的事業』，（斯大林）而且帶着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它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的借鏡和學習，正因爲如此，所以這裡才用了較多的篇幅來記載它。

中國人民爲自己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同時也爲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抗戰，也已經進行了兩年以上。這次抗日戰爭不僅在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史上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而且也是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這個戰爭尤其有更大的意義，就是因爲中國人民進行這個戰爭，是反對在遠東扮演全世界反動勢力憲兵作用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民族對外戰爭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這些都是在中國對外戰爭的歷史上幾次較大的戰爭。但是在這些戰爭中都因爲當時中國的政府沒有抗戰的準備，沒有堅持抗戰的決心而遭受了失敗；同時，這些戰爭也都還是局部的對外戰爭，沒有成爲全國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其具體內容與歷史教訓，在本書以後各章中均將有所論列。正因爲在這些戰爭中暴露了中國的懦弱無能，守舊腐敗，更加增長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輕視侮辱，增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貪婪無饜。現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是遠遠的超過了過去中國的一切對外戰爭的記錄，這一次抗戰是全國的大規模的對外的解放戰爭。這次中國抗戰所處的環境與過去中國歷史上一切民族戰爭不同，與歐美各國歷史上的民族解放戰爭也不相同。這裡最基本的特點，就是這次中國抗戰，是以自衛戰爭反對侵略戰爭。

站在戰爭的一方面——戰爭的發動者是日本帝國主義。它所進行的戰爭是野蠻的侵略戰爭，非正

義的戰爭，其目的是在滅亡這個中國，奴役整個中國民族。日寇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的一貫繼續，其目的在把中國由半殖民地的半獨立的國家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完全殖民地，把中國人民變爲日本的奴隸和牛馬。它不僅破壞我們的主權，屠殺我們的同胞，搶奪我們的土地和資源，而且摧殘我們的文化，毒害我們不設防的城市，強姦我們的婦女，抽吸我們同胞的血液。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無論男女老幼都不免要受災難。同時，它所進行的戰爭也違反着日本人民的利益，破壞遠東與世界的和平。其目的是在獨霸東亞，建立它的所謂『東亞新秩序』，排斥列強在遠東的權益。故日寇不僅是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民族公敵，並且是日本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公敵；而且必然要遭受日本人民的反對，世界進步與愛好和平人士的譴責與制裁。

站在戰爭的另一方面——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是中國政府軍隊和全國人民。我們所進行的抗戰是自衛的解放戰爭，非侵略的、正義的戰爭，其目的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自己的人民不受外寇的侵略和奴役，是在搶救遠東與世界的和平。我們所進行的抗戰是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於日本人民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只有在這次抗日戰爭中獲得最後的勝利，才能把中國由半殖民地的半獨立的國家，變爲獨立的統一的國家；把中國由半封建的、不民主的國家，變爲近代的真正民主的新式共和國家。就是說，把中華民國變成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正因現在中國所進行的抗日戰爭是被壓迫民族的自衛解放戰爭，所以必然能够取得全國人民的擁護，世界先進人類與真正愛好和平人士的援助。同時，在這個戰爭中提出『保衛祖國』的口號，也決不是欺騙的口號，而是正義的革命的口號。

中國抗日戰爭的第二個基本特點，就是以弱國反對強國的戰爭。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是

遠東一個帝國主義的強國，具有比較發展的工業和軍事技術，經過長期的準備，並在中國保持有侵略的據點和佈置有間諜網。但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比較起來，日本又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小國，是一個人少兵少，財政困難，資源貧弱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工業發展很低和軍事技術的落後。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土地之廣僅次於蘇聯，人口之多爲世界第一，資源豐富，人多兵多。從這一個特點中，我們就可看到中國有着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力量和必要條件，然而要求得連勝是不可能的。中國抗日戰爭必然是艱苦的持久戰。在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與叛變（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諸逆之通敵賣國，不過是已經公開暴露出來的現象），暫時的局部的妥協等不利情況，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爲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

最後，從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上來說，中日戰爭還有以下的特點：（一）中日戰爭的爆發是與一九三七年下半年開始的資本主義新的經濟危機同時進行。如果說，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能夠從上次經濟危機的打擊之下恢復過來，就已遇到了新的經濟危機；那末日寇則因早已把自己的國民經濟放到戰時經濟的軌道上去，並且爲了這樣而消耗了它的現金準備和原料儲藏，所以更不可避免地要引導到貧困飢餓，以至於破產的邊緣。加以日寇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正在破壞廣大的中國市場，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減少銷路，因而使新的經濟危機更其加深，同時也就加深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矛盾，首先是日美、日英之間的矛盾；（二）中日戰爭的爆發不是在普通的時候，而是在新的世界大戰已經開始的時候，但是新的戰爭的特點，正像斯大林所說：『還沒有成爲全世界的戰爭』，『帶着片面的奇特性』，戰爭是由侵略國開始的，損害非侵略國的利益，首先是英美法的利益，而英美法却逐

步退讓，一再向侵略國妥協，讓日本佔領外國資本在華的中心——上海，讓日本佔領英國在華南的勢力範圍——廣州，讓日本佔領遠東航線的要路——海南島，讓日本包圍和轟擊香港，讓日本佔領斯巴特萊群島，讓日本封鎖天津和漢口的英法租界。這樣就無異於放任侵略，縱容戰爭，使戰爭擴大起來變爲全世界的戰爭，結果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使它們自身遭到嚴重的失敗；（3）中日戰爭的爆發是在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不僅以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爲對象，而且也以歐洲的一些弱小的獨立國家爲對象，因此在這些國家不能不重新發生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戰爭，爲獨立自由的正義戰爭；而且隨着法西斯主義之在個別國家中和在國際舞台上轉爲進攻，於是反法西斯運動也日益增長，日益擴大，日益具有更大的國際性質，這樣也就幫助着中國的反對日本法西斯的解放戰爭；（4）中日戰爭的爆發，是在蘇聯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並且正在開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在勝利了的社會主義與寄生的衛化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更加深了。蘇聯是向前進着，向無產階級社會的高峯，向共產主義前進着；而資本主義世界則往下降落着，向經濟危機，向反動，向戰爭方面降落着。因此，蘇聯力量的強大成爲世界和平的柱石，成爲世界無產階級解放的燈塔，成爲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推進棧的意義和作用，也就更加高度增長着。兩年來的抗戰事實已充分證明，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最可靠最能共患難的朋友，它對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同情和援助，隨着中國抗戰開展而日益增長。

中日戰爭的這些特點，說明中國抗戰是處在一種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的環境之中。這種環境說明中國抗戰有着戰勝日寇的內部的和外部的有利條件，同時也說明在抗戰中難免要遇到許多嚴重的困難；特別是由於中國民族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不只全副武裝，而且是奸險狡猾，它善於分散中國民

族的力量，它善於利用中國內部的一切弱點和鬭爭來實現它掠奪中國的目的，因此困難的因素也就特別複雜。要戰勝這許多困難，要戰勝這樣奸險狡猾的敵人，當然需要我們的長期奮鬥，尤需要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這正如列寧所說：

「反帝國主義強國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能的，不僅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進步的，革命的；雖然爲要保證這種戰爭之勝利，當然要有：或者是被壓迫國內巨大數量的居民之共同努力（例如我們引作例證的印度國內和中國國內數萬萬居民之共同努力），或者是國際形勢中種種條件之特別順利的配合（例如帝國主義列強因其本身勢力之削弱，因其彼此進行戰爭，因其彼此對抗等等，而無法實行干涉）；或者是某一個強大國家裡無產階級同時舉行反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最後舉出一個情況，從無產階級之勝利的觀點上看來，乃是最合希望和最有利的情況）。」

中國抗戰兩年餘的結果，雖然還沒有達到列寧所希望的程度，即國際援助還不够強大有力，日本國內還沒有直接革命的爆發；特別是中國自己力量生長的不够，還沒有普遍地把中國偉大的潛力發揮出來；政治進步的不够，有時候還表示停滯或部分的逆流的現象；團結的不够堅固和充實，甚至煮豆與燃箕之痛，鬩牆當禦侮之時。影響所及，不僅動搖舉國同胞對抗戰勝利的信念，而且降低國際輿論對中華民族的同情。而兵役舞弊，法幣跌價等困難增加，尤使一部分人士發生抗戰有心勝敵乏術之感。凡此種種，均足證明中國全民族共同努力還不够，因此還沒有能够渡過抗戰中艱苦困難的時期。但是我們在抗戰烈火中，舊的阻碍進步和分裂國家的屏障正在被燒燬，團結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爲一個統一力量的過程的民族自強的新生命是在生長着；而敵人方面，則困難日益增加，特別是兵力的不足，

財政的困難，國際地位的孤立，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所以我們現在雖還沒有渡過艱苦困難的時期，但抗戰前途確已日益呈現出勝利的遠景；如果我們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愈堅強，則抗戰勝利的目的也就愈加和我們相接近。同時我們現在抗戰中，不僅有了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與新的抗日政策，而且還有將近一百年來民族解放運動的傳統經驗；在近百年中，一部中國民族的歷史，是一部充滿民族解放鬭爭的歷史，發揚我們民族在解放運動上的光榮歷史傳統，繼承過去許多先烈的英勇鬭爭精神，警戒並避免一些歷史的錯誤和缺點，實爲完成抗戰建國大業基本條件之一。

近百年來中國的發展，在民族解放的意義上說來，是侵略運動與反侵略運動的矛盾的發展。在這發展過程中，反侵略運動將克服侵略運動，使中國由被侵略被奴役狀態飛躍到獨立自由狀態。我中國民族，現正處於這飛躍的大時代。這飛躍的大時代，以這次的革命戰爭爲總的關鍵。而在這次戰爭的目前的第二階段，又是一個轉敗爲勝的大飛躍。這個大飛躍的時期是相當長久的，我們的任務異常艱苦，必須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配合客觀的國內外的有利情勢，以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中途妥協的危險；力求全國團結加強，反對各種分裂陰謀；力求全國向前進步，反對一切反動倒退現象；多方增長力量，切實準備反攻，以期把日寇打回鴨綠江邊，爭得最後勝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來實現這個大飛躍。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第二章 鴉片戰爭

第一節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與鴉片戰爭的起因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資本主義一天天的發達，它們想打開中國門戶的要求就一天天迫切。資本主義的生產特點，是在使用機器，機器具有大生產的能力，於是國內市場就決不足以滿足資本家的慾望，而必須努力爭取外國市場來補償。而且資本主義一發達，即刻就形成和資本家對立的勞動者。這勞動者在資本家無情的剝削之下一天天貧窮起來，而損失原有的購買力，使國內市場縮小，使資本家更有爭取國外市場的必要。不但如此，資本主義生產一定要走入資本集中的過程。這一方面擴大了社會上的生產力，一方面却減少了社會上的購買力（或稱消費力），而使爭取國外市場的必要更其迫切。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乃成爲歐美列強必得而甘心的一塊市場。在中國方面，當時主要的還是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即以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爲其經濟活動的主體。這樣的社會，對於上述那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自然不能了解，即不能了解歐美各國的要求來中國開闢市場是一種不可抗禦的力量，當然也不能了解應當如何來迎接這一個新勢力，才能不使自己的社會受到侵害。同時，農業經濟的社會，本來就帶着很强的排外性，因爲外來的力量一定要破壞它的自給自足的安閑生活。加以那互相競敵，爭取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間的紛爭軋轢，給了滿洲所採行的排外政策一個大的助力，乃是明顯無疑的事實。此外這個新朝因恐外人或將左袒那當中國人民被征服於饑饉的上半世紀間在大多

數華人中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採行排外政策。基於這些顧慮，當時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許與華人交通。」（註一）

有人說，中國與外國通商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例如在漢朝時中國即曾與羅馬通商，中國的出口商品是絲織品，而羅馬的出口商品是珠玉和香料。南北朝時，中國繼續與羅馬通商，出口品是絲、鐵、毛皮，進口品是玻璃製品、棉織品、刺繡品、藥品、染料、金器、寶石。七世紀中葉阿拉伯人經由蘇門答臘、爪哇航行至廣州、泉州、杭州，帶來香料、樟腦、紫檀、藥品與唐朝通商。到元代和明代中葉，中阿貿易關係依然繼續着，當時泉州是世界的大商港。明代中葉以後，歐洲商人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以及英吉利人，也陸續到中國來通商。爲什麼在那時中國可以採用自由通商政策，到後來却要閉關自守？這是因爲過去中外貿易的兩方都是封建國家，交換的東西都是奢侈品居多，商品交換不會影響到社會經濟基礎；但到了十九世紀就一切都不同了，貿易的兩方一是工業國一是農業國，交換的商品一是工業品一是農產品，交換的關係已衝破了中國自然經濟的屏障了，中國政府爲要保存自己封建經濟的基礎，便積極採取鎖國政策。所以乾隆皇帝對於英國再三派遣使節來要求自由通商的回答，便說：『天朝物產豐盛，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了。不過在歐美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十分發達的時候，海外市場的找求，還不十分迫切。雖屢次要求和中國通商，屢次遭受了中國的拒絕，它們還可以在旁的地方得到滿足。而到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的深閉固拒就不爲它們所容許，最後的辦法，勢必至於訴諸武力。是於滿清政府的鎖國政策終於抵抗不住外洋

（註一）馬克思：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資本主義的澎湃怒潮，成爲歐美列強掠奪中國的起點的鴉片戰爭，終於爆發起來了。

當時歐美資本主義雖然以輸出商品爲主，尚未達到今日以資本輸出爲主的財政資本的階段；然而商品生產也已膨脹到要求掠奪和競爭殖民地與市場的廣大範圍。而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得最早的英國，在這時期便自然成了東方諸國最主要的掠奪者。原來在產業革命以前，英國在海外的商業資本就已大爲活躍，自十六世紀以來，英國的海外貿易便逐漸沿着征服農業諸民族的路線發展着。當時英國商業的競爭者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等，爲要組織對落後民族的掠奪，英國在海外設立了許多獨佔的貿易公司。這些公司是以販賣東方諸國的商品與黑奴及銷售英國工業製造品爲主要活動目的，其中最佔勢力而成爲侵略東方諸國之大本營的，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該公司先後戰勝了荷蘭與法國的東印度公司，併吞了印度，並且取得了對華的貿易獨佔權。最初英國商人是以販運中國茶葉爲主要的獨佔貿易。例如一六七七年（清康熙十六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在廈門設立代理公司，經營茶市，以後茶市中心移到廣州，而印度鴉片的輸入中國亦自此發達起來。蓋英人以屢次遣使求中國和它通商不能如願，就改變方針，不惜使用違背人道的鴉片來向中國人誘惑，以圖打破中國堅固的海禁。事實上，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已取得了印度的鴉片專賣權，以中國年銷鴉片甚多，就在印度大種鴉片，就近輸入中國，每年吸去現銀不少。由於鴉片輸入中國的激增，英國勢力便大大地伸入中國。

鴉片本來在唐代就已由阿拉伯輸入中國，鴉片兩字即是阿拉伯語「*Abu*」的傳訛，所以又稱「阿芙蓉」。然初僅充藥劑之用，輸入數量亦不多，每年不過二百箱左右。但其後由印度輸入的鴉片遂與年俱增，吸者亦漸多；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輸入達四千餘箱，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竟

達一萬八千七百六十餘箱，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增至二萬七千餘箱。（註二）這種鴉片輸入驚人的激增乃是由於東印度公司取得了對華貿易的獨佔權，獎勵鴉片的對華輸入。一八三四年英政府雖然取消了該公司的獨佔權，而英商反得由此自由輸運鴉片於中國。據道光開鴻關粵船黃爵滋的奏疏，在鴉片戰爭的前夜，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鴉片輸入閩、浙、魯、天津共數千萬兩，廣東海口共三千餘萬兩。又據外人統計，（註三）一八二一年至二七年間，平均每年輸入九、七〇八箱，消耗價值達八、七二五、六〇〇元；一八二八年至三五年的七年間，平均每年輸入達二一、八八五箱，消耗價值爲一三、四〇三、〇〇〇元；一八三五年至三九年的四年間，每年平均輸入三五、四四五箱。此外還有一個統計，（註四）就是在戰爭前夕（一八三六至三七年間），輸入印烟爲二一、五〇五箱，價值一四、四五〇、一九三元。如果我們就鴉片在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全額中所佔的比例來說，則很明顯的看見鴉片輸入的激增是至足驚人的！例如在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製造品的輸入中國價值爲八、〇二四、六〇六元，鴉片爲六、四〇六、〇〇〇元；到了一八三四年，製造品價值，幾減少一半，即四、八二〇、四五三元，而鴉片價值幾增至一倍，即達一一、六一八、七一六元了。

（註一）見稻葉岩吉著近代支那史三百五十至五十一頁。又夷氛紀聞（惜陰堂主人鈔，載人文雜誌一卷一號）云：『印度之孟阿臘，孟買，皆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來，內地嗜吸者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餘箱，價值逾六千萬兩。』

（註二）H. B. Mo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Vol. 2, P. 21

（註四）*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P. 303.

(註五)鴉片輸入的激增，主要的結果，就是使國內的紋銀外溢，銀價暴騰。道光初年，中國每歲漏銀數百萬兩。一八三八年紋銀每兩易制錢竟達一千六百有零(原易錢七八百)。平民的生活自然受到惡劣的影響，並且由此加強了商人資本及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小手工業者的榨取，這就是外國資本主義最初給予中國國民經濟的禮物。

鴉片在由藥物變成民間的嗜好品以後，便流毒全國。當時清政府一方面受着國內輿論的壓迫，一方面感覺到鴉片的輸入激增，致使國內紋銀外溢，造成嚴重的財政危機。至道光十六年，每年竟漏銀至三千萬兩，於是內地銀荒日甚，朝臣交論其害，禁令屢頒。然而禁者自禁，而販者自販，吸者自吸，加以「奸商作弊，官吏受賄，販吸轉熾」，這是一切封建官僚機關的通病，毋怪其然的。馬克思在中國及歐洲的革命一文裡曾很深刻的說到這一點：「一八三三年以後，銀貨由中國到印度的輸出，幾乎耗竭了這個天朝上國。於是中國皇帝嚴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是它所得到的回答，是對於它的法度與以更強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經濟結果以外，還關聯到鴉片秘密運輸的賄賂公行，將中國南方各省國家官吏的風紀完全爲其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國的父親一樣，皇帝的官吏，亦祇看作是對於各該縣邑的維持親長關係者。但此維繫國家全局唯一的父權的威力和道德紀綱，都逐漸爲以默許鴉片秘密輸自飽私囊的官吏的腐敗所破壞了。此種情形，會多見於發生變亂的南方各省，鴉片遂適如其分以獲得了制馭中國的主權，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僕，乃已喪失其所自有的主權了。這好像歷史在它把中國全民族從其遺傳的愚昧中拯救出來以前，先使它們沉醉一回似的」。

(註五) 見湯象龍著：道光時期的銀貴問題(載社會科學雜誌一卷三號)。

當時最早奏疏鴉片的禍害的是黃中模（道光二年），然他只是要嚴禁漏銀，認爲鴉片只須加以限制。其後許乃濟亦奏疏論及鴉片（道光十六年），但他與其說是禁烟論者，毋寧說是提倡鴉片者，因爲他主張國內種煙，以塞漏卮。這個奏議受到了禁烟派的嚴厲的批評，如袁玉麟、朱嶸、許球、朱成烈等都是反對許氏最力的。同時黃爵滋亦上疏嚴禁鴉片，並主張用死刑來懲治鴉片的吸食者。疏上，有旨中外大臣議，而兩湖總督林則徐覆奏之言，最爲痛切：『如烟不禁，則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練之兵』；並條陳禁烟辦法，但他不贊成黃氏的死刑懲治說，而主張從多方面來禁絕鴉片。宣宗大爲感動，即召則徐來京，面議方略。同年十一月，則徐拜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事件，並節制廣東水師，實行禁烟政策。則徐至粵，先捕殺與英商勾結的華商數名示威，令英商限三日內將所有鴉片全部交出。事先林則徐有諭帖通知英商說：『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回稟，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英人不聽，乃派兵包圍英領館，並用杯葛（Boycott）辦法絕英領館食及婢僕（那時英國領事是義律 Joseph Ballou）。英人不得已，繳出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金六百餘萬元。則徐奏『虎門收繳英吉利環船鴉片已十逾其八』，旋奉旨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銷燬於虎門海岸。這是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的事，所以後來就把這一天定爲禁烟紀念日。英人自義律以下，都怏怏離開廣州，赴澳門。廣州城外原有外國商船二百八十餘艘，至是留者僅二十餘艘。林則徐補授兩廣總督，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清政府亦決心禁烟，定條律嚴懲販烟、種烟、吸煙者。林則徐又佈告各國：『以後凡商船入口者，皆須具有「夾帶鴉片，船貨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結』。各國畏中政府強硬，皆願具結。惟義律抗不遵從。則徐又用杯葛辦法對付，迫令英人離澳門，義律不得已，率同英船

，避居尖沙嘴（香港對岸）的貨船中，轉託葡人說項，聲明須除去「人即正法」四字，始能具結，則徐不許。義律知道此時要強迫中國通商，已非用武力不可。乃詭稱：「中國官員侮辱英領及英國臣民，一般英商受暴力壓迫而蒙損害，非出兵不足以使中國政府賠償損害」（後來英國有議員質問對華開戰的理由，英陸軍大臣約翰·拉沙爾即據此以答），電請英政府出兵。英國會經過一番爭論後，卒以多數（只多九票）通過對華宣戰案，並下令封鎖粵海口。可見鴉片戰爭正像馬克思所說：「乃英國海盜政策之繼續」，並不像許多帝國主義的歷史學家及我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所說那樣，是什麼林則徐禁烟政策所激起（普通的歷史書都抱這種觀點，商務所出大學叢書中國近代史的著者陳恭祿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實實在在是英國強盜見中國政府禁烟堅決，且甚有成效，竭力想破壞中國政府的禁烟政策，用一切方法向中國挑釁。實際上，它們在宣戰之前，即會藉故製造事件，作為向中國開戰之藉口。例如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英國水手酗酒滋事於九龍之尖沙村，殺死中國人林維喜；同年九月四日英領義律帶船至九龍口岸，開槍射擊中國人，中國兵死六人，受傷者六人，強購食物而去。同年十一月二日義律與英兵艦長斯密斯駛往虎門，欲攻虎門在途中川鼻島，與中國水師提督關天培兵船相遇，發生武裝衝突，互有死傷。從這些事實看來，英國強盜欲向中國開戰，強迫與中國做鴉片貿易，以毒害中國人民，並謀擴張其在遠東的非法權益，實甚明顯。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經過與平英國的起義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二月英政府下令動員印度及好望角屯兵一萬五千餘人，大炮五十四尊，軍艦十六艘，神機汽艦四隻及運輸船二十七隻。以義律統率陸軍，以伯麥（Barré）統帥海軍向廣

再進攻。夷氛紀聞記載此事云：『九日晦，義律率其噶喇等貨船三，突攻我師船，參將頓恩砲擊之。』那時林則徐防守甚嚴，『凡夷船可入之海口，皆增駐重兵』。又繕修戰備，日夜使人刺探西事。自虎門至橫當山互以鐵鎖木筏，增購西洋砲二百餘門，列置兩岸。更備戰船火舟募壯丁五千，演習攻戰之法。英軍『見無隙可乘，遂駛船三十一艘赴浙』。（註六）赴浙之船經福建，『駛五船突攻廈門：金廈道劉龍椿就舊砲台畧沙爲壘，率兵駐守，砲兵擊英夷火藥船，沉兵船一，風起，夷（英）船揚帆去』。（註七）其餘的二十六艘駛至定海，定海無備，總兵張朝貴倉卒應戰，英軍遂陷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戰死，張朝貴逃走。英軍更圍攻寧波，時兩江總督伊里布巡視浙江，乃募集鄉勇防守，英軍女軍官被俘，傳聞即是英皇的第三公主。英軍復進窺錢塘，乍浦亦將陷，寧波受封鎖。後知此地非要害，乃移兵向渤海，進白河，直逼天津，清廷大震。英人乃向直督琦善提出和議六條件：（一）償還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涉用平等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夾帶鴉片株連居留英商，（六）廢除華人經手洋商經費。從這裡，完全可以看出英人出兵，其目的是要打開中國的門戶，好發展它們的資本主義，並非簡單地是爲英商出氣。當時的朝臣疆吏，懦於英軍的猛銳，都抱怨林則徐輕舉惹禍，只求那如狼似虎的英軍早早離開畿輔，那裡還敢抗戰。乃一面罷斥林則徐以謝英人，令琦善爲兩廣總督，一面命伊里布在浙江先與英軍議和。英人見有議和希望，即撤兵回澳門。

琦善至廣東，盡反則徐所爲，撤水師，散壯丁，廢一切守備，並允償英人鴉片七百萬兩。英人見

（註六）（註七）均見夷氛紀聞。

琦善怯懦，更求愈苛，於原議六條之外，復要求割讓香港。琦善稍有異色，英人即率艦攻虎門，陷其砲台，琦善大懼，允於烟價外開放廣州，制讓香港，而以歸還兩砲台及定海爲交換條件，十二月二十八日遂議定草約。不料此時清廷見英船退出白河，又覺議和終究是失策了，及聞虎門被攻，更是憤怒，忽又主戰，琦善獲職查辦，詔以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遠將軍，提督揚芳等爲參贊大臣，馳赴廣東，欲一舉殲英軍。這際和戰無定，而且和旣和得專怯可笑，戰又戰得暴燥無策，當然是非吃虧不可的了。英軍聞清廷宣戰，續攻虎門。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遂陷橫當，虎門諸砲台，提督關天培戰死，清軍喪軍器無算。及參贊揚芳率軍至，而印度陸軍司令臥烏古又率援軍長驅直入，盡佔珠江要塞。四月朔奕山命水軍襲英船，旣而又聞領館，皆不克，且誤傷美人。英軍乘勢進攻，滿水師幾全軍覆沒。揚芳束手，厥後屢戰屢敗，英軍進據廣州，總兵鄧永福戰死，城西北之天字砲台，及北山頂之四方砲台，盡爲英奪。奕山倉皇失措，不知所爲，將棄城而遁，又恐爲英軍所執，乃決計乞和，使廣州知府余寶純出城議款，遂訂休戰條約，主要的爲償英軍費六百萬元，將軍隊及外省援軍退屯城外六十里地，以香港之割讓爲未決問題，英軍退出虎門。

約成，奕山大索民財以爲賠款，由藩司、運司、海關三庫撥付四百萬元，由廣州商行認擔二百萬元。這樣，官吏既乘機苛斂敲索，英兵又橫行淫掠，便激起了廣州民衆的憤怒。一八四一年六月十日因英兵在三元里村劫掠姦淫，民衆大憤，樹平英團旗幟，鳴鑼集衆，「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衆（英兵）共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衆可恃，愈集愈衆，增至數萬。」（註八）義律聞變馳救，陷重圍中

（註八）見王廷蘭致會望顏論英夷犯粵書（轉引自太平天國革命）。

不得出，移書告急於廣州知府余寶純，寶純往解圍，挾義律出。賠款既交，英軍退去，大船有在沙灘擱淺的，民衆遂聚議預備縱火燬船，奪回賠款。廣州知府又出示曉諭民衆，不得妄動，解英人之圍。然佛山義勇民軍仍紛起攻擊佔據龜岡砲台的英兵，殺死英兵數十，南海、番禺民衆亦自動集合，晝夜操練，以防英兵再侵。這是中國民衆最初的自發的反侵略與民族自衛運動，同時亦可由此看出統治階級是如何的懼怕民衆運動而甘願作外寇的奴隸。當時余寶純一面向臥烏古行九叩首禮，一面竭力壓迫民衆運動。滿清政府並追論則徐開釁之罪，遣戍伊犁。

但是英軍雖退出虎門，却藉口上年天津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之約，未得清政府正式承諾，不肯罷兵，議復移兵北上，以武力要挾。一面又從印度續調戰艦來粵，與義律會兵，六月同發，會圍風起，英艦受損。兩廣總督克信有神佑，並奏入朝。這時英政府還不以義律所獲得條件爲滿足。撤義律職，而以璞鼎查（Pottinger）代之。於是英國對華的侵略戰爭又繼續發生。璞鼎查先至香港整理商務，佈置防務，然後與臥烏古、伯麥會師。七月九日實行第二次北犯，先後佔領廈門、定海、寧波、鎮海。是役總兵葛雲飛、鄺國鴻、王錫朋皆戰死。清廷忍無可忍，乃詔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都統特依賢爲參贊，進軍浙江。以廣東巡撫怡良爲欽差大臣，駐師福建。以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防禦。一八四二年一月奕經分兵三路圍復寧波、上海：（1）奕經以兵三千，駐紹興之東關，文蔚以二千屯慈谿城北之長溪嶺，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以兵二千屯城西之天寶山，以圖鎮海；（2）提督段永福以兵四千伏寧波城外，余步雲以二千駐奉化，圍寧波；（3）海州知州王用賓駐乍浦，雇漁舟渡岱山，以故總兵鄺國鴻子鼎臣統水勇主攻，圍定海。約日同時進兵，分遣鄉勇伏城中爲內應。惜定海形勢隔絕，佈置不易，鄺鼎臣先期渡海襲擊，無功而還。段永福亦被炮擊，死傷過半。

攻鎮海之劉天保軍，以內應不力，不戰而退。朱桂戰死，天寶山軍潰。文蔚卽夜遁蕭山，奕經亦退走杭州，浙東恢復之師遂告失敗。

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由於軍備不敵，沒有發動全民抗戰；同時亦是由於當時政府裡面妥協投降勢力的牽制。浙東未敗之先，浙江巡撫劉韻珂已力主和議，清政府見浙東恢復之師失敗，亦遂發生動搖，乃命伊里布赴浙主和議，詔諸軍按兵罷攻，惟嚴守以待。英軍見浙東有備，不便深入，便改變策略，轉攻長江，以斷南北交通。四月八日英軍大舉撲攻乍浦，次日卽陷城。五月初英艦達吳淞口，守兵不戰而退，更攻上海，江南提督陳化龍血戰死之，寶山，上海相繼陷落。時英軍新加援兵，聲勢更大，遂溯江而上，先後破福山、江陰、圖山諸要隘，進取鎮江，守將海齡自殺，提督劉元孝退走，於是英軍勢如破竹，直逼南京。自瓜州至儀徵之鹽船估船，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鹽商饋銀五十萬兩免禍。清廷知無力抵禦，乃派耆英、伊里布、牛鑑往南京與英使璞鼎查議和。於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締結中英修好條約十三條，這就是有名的奴役中國的南京條約，或稱江寧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 由清政府納賠款二千一百萬與英政府，先交六百萬，餘限四年內分期繳清，其軍隊俟第一年清款時卽行撤退，惟舟山鼓浪嶼二處，須償金全清五口開放之後，始行撤退。

(二) 香港全島，永遠割讓於英國。

(三) 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爲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並許英國人民帶眷居住及自由來往。

(四) 五口應納進出口貨稅款，均宜秉公議定稅則，由部頒示，以便英商按照交納。英商貨物，

自英港續戰後，勿准由中國商人僱運內地，不得加重課稅。

(五) 以後兩國往來公文，用平等式。

(六) 釋放各地英國商船與罪犯，凡戰役中爲英國服務之華人，一律免罪。

八月清政府交付第一次賠款六百萬兩於英後，英軍遂退出南京、鎮江、上海，駐屯舟山，葉鼎奎以功任香港總督。清廷命伊里布至廣東，與英使交換批准條約，並議五市章程。至道光二十六年，賠款全數交清，南粵均已開放，惟廣州開放之事，延宕二年。總督以『舟山列島水不割讓與他國』爲條件，誓英許之（時英里布已卒），於是先訂舟山永割讓與他國之約，然後撤舟山，鼓浪嶼之屯兵，這就算是鴉片戰爭的結局。

由於清政府及其軍隊的腐敗不堪，鴉片戰爭是慘敗了，然而這戰爭還是表現了中國民族的抵抗九。一般的滿清軍隊固然腐敗，可是英軍除了在廣州遇到軍隊和民衆之頑強的抵抗外，當英軍進攻上海與鎮江的時候，中國守軍亦曾表示了英勇的抵抗，江南提督陳化龍與鎮江守將海齡均會血戰以身殉國。事後很久，恩格斯對鎮江抗戰的敘事會這樣描寫道：『那裡的中國軍隊，總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他們都勇敢拼死地應戰，直至全軍覆沒爲止。在應戰之前，他們好像早已料到戰國的結局，而將自己的妻子兒女殺死或淹死……清軍的屍體，首尾相連已遭失敗，遂焚燒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死了。在這次戰國中，英軍損失了一百八十人。』（註九）在戰爭中，廣東民衆平英國數萬人的組織及各地民衆自衛運動的再發再厲，尤爲當時中華民族不可滅亡的明證。當時中國沒有變成第二印度，並

（註九）見恩格斯所作英人對華新侵略，載馬恩論中國。

不是偶然的。

第三節 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與民族自衛運動的再起

英國既然打開了中國閉關的局面，於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就隨之俱來。南京條約公佈後，法美兩國均實行趁火打劫，謠言在這次戰爭中，法美屢次居間調停，應享利益均沾的權利。因此跟着南京條約而來，又有中美條約與中法條約，其主要精神都是要挾中國在對它們有利的條件之下和它們通商。同時這兩條約又確定了法美兩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所以鴉片戰爭實是歐美資本主義掠奪中國的開端，這一偉奪由英國開始，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接踵效尤。自南京條約締結之後，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顯然受著很大的打擊。英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藉著特權的取得，使它們的侵略成爲合法化，它們可以將侵略的觸角自由地伸展到中國許多地方了。因爲：

第一，南京條約開闢了五個大商埠，而且取消了在廣州、香港的中國商行對外貿易的專利制度，這是使外國資產階級可以任意擴大其在華的貿易的。因爲在此以前，外國商品在廣州市場的出賣，其價格是爲中國商人組合規定的。南京條約既然取消了此等組合，這就使得他們可以在五個大市場自由出賣商品——按照他們自己規定的價格出賣商品。這樣，當然將中國抵抗外國貿易的城堡完全轟碎了。

第二，南京條約使英國奪取了對中國侵略的門戶——香港。這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對於英國的侵略中國都有莫大的意義。因爲英國可以經營這個島爲對華貿易的根據地，同時使英國的統治擴大到了中國的南部，而與英荷印度相呼應著。

第三，南京條約打破了中國關稅對於外貨的限制，英國商品進出口課稅，在「秉公議定稅則」的

名義之下，可以無限制地輸入中國及從中國取得廉價的原料。而且英國的貨物一經在香港按例納稅後，即可在中國內地橫行無阻，不受到關卡的阻礙。這種協定稅則在以後的關稅協定中更加具體化起來了，即：貿易品輸出均從價值百抽五，通商口岸與內地市場間的貿易品，納內地子口稅後，即不能再課他稅，於是外國資產階級可以在中國實行不等價的交換，隨意從中國各地吸取農民勞動者的血汗了。

第四，南京條約及以後所訂的中法、中美諸條約，給予外國商人在中國設立居留地的自由——在以前，外國商人必須經過中國商行的中介，始能與中國官廳接洽，尋覓居住地帶——並且承認了外國商人的領事裁判權，外國領事可以直接要求中國官廳保護他們的利益。此外外國商船在中國內河有航行權，軍艦亦可駛入中國內河，這些都是足以使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深入的。

雖然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為核心）所限制，南京條約後英國對華貿易，沒有像它們所希望的那樣迅速擴大。而且由於鴉片貿易對華輸入之增多，中國白銀外溢，致使中國缺乏現金購買其他普通的工業商品，因而，合法的普通商業貿易一時不能迅速增長，加以當開闢新市場的時候，它們祇求大量輸出商品，並不精確估計到消費者底實際需要和購買能力，以致新市場上商品過於充斥，而『貿易的驟增，接着就是貿易的驟減。』（馬克思）以此，『一八四二年的條約，不會擴大美國和英國的對華輸出，反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一八四七年的商業危機。』然而無論如何，鴉片戰爭後英國對華貿易比之過去總是增長的。這裡，大宗的進口當然還是鴉片，在南京條約簽訂後數年，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每年約值三千萬元以上，英國政府在鴉片壟斷貿易上所得到的利益，竟佔國家總收入六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棉織品之類輸入的增長，當然遠比鴉片為少，然而比之鴉片戰爭

以前，也無疑是在增長着。在一八一三年英國的棉織品還沒有輸入中國，到了一八二八年才有二十萬元輸入，到一八三八年即鴉片戰爭的前兩年祇增加到七十九萬元，但在鴉片戰爭後一八四四年便激增到五百五十九萬元。可見鴉片戰爭確實擴大了列強對華的侵略網，它們常以劫掠奴役等方法取得的財寶，使之流到母國，轉化為資本，於是中國市場的開闢便成了促進它們貿易與航業成長的溫室，成了它們資本累積的强有力的槓桿。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的原始累積的要素時，曾提及鴉片戰爭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剝削，被奴隸化，被埋於鑛坑內部；東印度的征服與劫掠之開始，非洲之被轉化為商業的黑人獵場這等等事實，都表示了資本主義時代的曙光。這些牧歌的過程，就是原始累積的主要原素。緊隨此等過程而起的，是歐洲諸國以地球為舞臺而展開的商業戰。那種商業戰是以尼德蘭對西班牙的叛亂開始，在英國反雅各賓黨戰爭中取得廣大的範圍，並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向前進展着。』（註十）

但是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却不祇這些，還引起了許多更重大的變化，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使中國白銀外溢，這樣，中國原來的封建經濟開始崩潰，而民族資本的原始蓄積却又無從開闢，這就阻礙了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此在我國便開始了兩條道路的鬭爭：或是由獨立的封建滿清帝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以至變為完全殖民地國家；或是由封建的國家過渡到近代資產階級的獨立的民主國家。這一鬭爭，雖然在當時統治階級的主觀意識上，還未被清楚認識出來，然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在客觀上已經開始了。

（註十）見資本論第一卷，讀書出版社出版，郭王中譯本，六百四十一頁。

第二，在鴉片戰爭前，我國主要是一個封建社會，內部階級矛盾主要是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鴉片戰爭以後，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仍佔主要地位，然而，已開始產生大批的買辦階級，爲後來民族資產階級的前身。同時，因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也開始產生在外國企業內做工的工人，爲後來我國產業無產階級的前身。在國內各民族的關係上，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在戰前滿族爲統治的壓迫民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爲被統治的被壓迫民族，滿族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爲主要的矛盾，在戰後這仍爲主要的矛盾；但是，除了這個內部的民族矛盾與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外，開始發生了國內各民族和國內各階級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民族與外部矛盾。這後一種矛盾在當時還不佔主要的地位，然而，自鴉片戰爭以後，這種矛盾便逐漸增長起來。

第三，在政治上也開始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因滿清政府對外戰爭的失敗，使滿清皇統的權威掃地無遺，統治發生動搖。另一方面，因爲英國在南京條約中得到了許多利益，開始與封建的滿清勢力相勾結，直接幫助滿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這種顯明的表示：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不是起了和起着進步的革命的作用，而是援助了和幫助着舊的封建勢力，並與之勾結，共同反對革命和進步的力量。這當然不是說滿清政府與英國沒有矛盾，這種矛盾，會是有有的，滿清政府並會企圖用戰爭去抵抗英國的侵入；然而，終究是不徹底的，不堅決的，沒有抗戰到底，中途向英國妥協屈服了。這也就是說，在鴉片戰爭中已看出：在謀中國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問題上，已開始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一條是對外交協的，不堅決的，即滿清政府走的道路；另一條是民衆的堅決抗戰道路。不過在鴉片戰爭時，人民反英的直接行動，主要只表現於廣東的平英團，以及在戰後不久所發生的太平天國的革命，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當時還不甚明顯，然而，確實已經開始了。

第四，在我國文化思想上也開始起了變化。一方面開始打破過去的閉關自守的舊的封建思想，開始打破過去自高自大的狹隘的孤獨思想，新的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主要是用傳教的方式開始滲入到中國來了，並因英國之侵入，打破了兩百多年的和平生活，開始了第一次的民族覺醒，這是積極的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却由自高自大的思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怕洋人』的民族失敗主義的思想，也開始發生了。在戰爭中還有民族的敗類分子，變為公開的漢奸。而在南京條約中竟公開規定了對於通英的漢奸分子，中國政府不得追究，是為喪失民族道德之始。

總之，鴉片戰爭是我國現代史的開端，對於我國內外關係的變化和影響，是一個很大的關鍵，為若研究目前我國現狀和嚴重國難之由來，不能不自鴉片戰爭始。同時，我們從上面分析中也已經可以明白看到，鴉片戰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引起了國際關係的變動，也引起了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它有積極的方面，也有積極的方面。在當時，這許多影響裡面最直接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英國取得了鴉片戰爭的勝利，便加緊掠奪中國。它利用大工業與商業來壓倒中國土著的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及家庭工業，而中國農村由於外國商品的侵入，與由此而加強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活躍，便更加劇其破壞與衰落的程度。同時由於英國強盜對中國政府的苛索（鉅大的賠款等），又更加緊了統治階級對於平民的剝削。馬克思說：『中國在一八四〇年不幸的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鉅額的不生產的消費的鴉片，隨著鴉片貿易而產生的資金流的流出，外國競爭對於本地製造品的破壞的影響，公共行政的腐敗情形，產生了兩件事情：蓄稅益加繁累，苛稅又見增設』，這樣當然使中國國民經濟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在客觀上不能不喚起民族的覺醒。廣東平英團的反英運動雖在當局高壓之下，依然繼續活動。自南京條約締結之後，廣東屬為商港，於是到中國來發洋財的英人也就一天天增多。一

方肆意劫掠，一方爲生存自衛，於是粵民與英人衝突之事便日有發生。至一八四二年冬反英輿情益趨激昂，民衆不約而集者萬餘人，並實行圍攻英國領事館，要求英人退出廣州城，當時因官府彈壓，雖未達到目的，但此後民衆力量益趨強大，官府也就轉而利用並結合民衆力量，竟暫時達到了『英人不得入城』的目的，薛福成在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中對於這一事件曾有所記載，他說：『寧波、上海、廈門領事館雖不在城中，常與道府以下官相見。福州城市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粵人聞而誣病之，合辭赴大府（即今日之請願），請毋許洋人入城，不省。乃大起團練，傳檄遠近，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嚴嚴與官爲仇矣。是時署英總督兩廣，英人復以入城請，納之懼激變，拒之實啓釁。密告英人粵人驚悍，請往圍之，期以二年後踐約。既而鹿邑徐廣縉爲總督，漢陽葉名琛爲巡撫，英人以兵輪闖入粵河，中前約，總督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逾十萬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衆怒不可犯……英酋方謀總督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酋懼，不復言入城事』。（註十一）

廣州民衆更請阻英人通商，於是巡撫徐廣縉與英人更定粵東商約，而以『英人不得入城』之語載諸約中，英領文翰亦終於簽約。事聞，清廷封廣縉一等子爵，名琛一等男爵，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清政府以爲是廣縉交涉之功，殊不知這正是當時有廣東民氣足爲政府外交後盾的緣故。

廣東民衆反英運動的激昂決不是偶然的。廣東是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最早的地方，英人在平時假手於洋商、官吏，對廣東民衆施行無畏的榨取，在戰時又肆行殘酷的淫掠與屠殺。自南京條約締結之後，英人挾戰勝的餘威，更加緊其對中國的侵略，這時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廣州次第開放爲商埠

（註十一）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一文，見庸齋文集。

，英國派遣領事於各港，管理商務，對於中國人民常施欺壓。廣東民衆得風氣之先，身受外國強盜各種欺凌壓榨，並憤恨清政府的怯懦昏庸，媚洋欺民，所以就自發地揭竿而起。這次如火如荼的民族自衛戰爭乃是鴉片戰爭後反英運動（平英國等）的繼續與擴大。雖然這種民族自衛運動在當時還只是初期的自發的，還沒有得到正確的領導，因此也還沒有能夠提出真正民族解放的綱領；但是它的力量也竟衝破了官府的壓迫和約束，於是官府亦不得不利用群眾的反英情緒來暫時和緩英人的進攻，而英國侵華的勢力因為受到中國民衆的反抗，亦會受到很大的打擊。所以馬克思說：「在一八四〇年英國砲火之下，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靈，強迫了這天朝上國與俗野的世界相接觸。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國保存的原狀，那個孤立，必須依賴英國的媒介來一個強制的終結。分解必定隨之而起，這與謹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論何時，一與空氣相接，立即分解，一樣是確然的。現在呢，英國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問題是那中國的革命怎樣的遲早將其反響及於英國，經由英國而及於歐洲，這問題是不難解決的。」（註十二）

（註十二）見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第四節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

英法聯軍之役爲鴉片戰爭之續，故西洋史家常稱之爲第二次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締結後，英人屢欲入廣州城，爲廣東民衆所拒，英領事復憤粵督葉名琛之傲慢自負，思有以報復之。是時適值洪秀全起義，東南半壁盡皆響應。清廷忙於調兵籌餉，政令廢弛，鴉片貿易復盛，禁令早等虛設。當時廣東

農民與貧民已不斷地發生叛亂與暴動，如三點會就是一種民間的秘密結社，曾一度圍攻廣州，按察使沈懋德督官紳練兵力戰，始得免。葉名琛下令各州、縣嚴治「匪類」，「有通匪者許吏民格殺勿論」，於是到處發生仇殺的事件，前後死者十餘萬人，悍民皆從匪不敢歸，一部分竄擾廣西、江西，一部分遷居沿海群島，英人以火輪開河除之，想利用這批無出路的遊民來與中國官府爲仇。但因鑒於粵民的強悍，又以師出無名，不敢輕舉，惟日夜練兵，準備再戰。那時中國一般奸商常倚仗英人保護來做鴉片生意，常借英國旗與護照，出入各港，以圖減稅，而免留難，與英人狼狽爲奸。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九月有中國船亞羅（*Arrow*）號自廈門來廣東，桅張英旗，上載英人二，華人十三，適值水師千總梁國定巡河，見亞羅船入，知爲奸商藉英旗掩護者，遂登艇大索，拔其旗投甲板上，執華人十三，拘繫入省。巴夏禮（*H. S. Parker*，當時英國駐廣東領事）聞訊，認爲機會已到，即向清政府提出嚴軍抗議，要求送還擄虜，並對毀旗事道歉。名琛遣一微員送被捕十三人於領事船，巴夏禮認爲不滿意，是時英人意在入城通商，巴夏禮因與港督包林（*Bowring*）密謀，欲乘機推翻前約，請求入城，乃發出哀的美敦書，要求履行具狀請單條件，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名琛置之不理，也不爲戰備。於是港督遣駐港英船開入珠江，攻黃埔，炮虎門砲台，砲擊廣州，名琛逃，城遂陷。然英軍以兵數甚少，難得廣州不易佔領，加以粵民仇英甚烈，屢起暴動，以擾英軍。會印度亦起抗英運動，須兵助鎮壓，遂退出。廣東反英民衆見英兵退，便施行報復，暴動蔓延全城，火燒英美法商館及十三洋行，這時英兵亦在城外縱火焚燒沿途居民數千家。

英政府得知粵變消息，首相巴爾摩登（*Palmerston*）極力主戰，一八五七年二月巴氏向國會歷舉中國於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七年侮辱外人的事件凡十八端，提議增軍費援助遠東英軍。下議院頗反對

，巴氏乃下令解散國會，召集新國會，結果決議對中國備戰，先遣使向中國政府要求訂條約，賠償損失，否則即訴諸武力解決。英政府並以合縱之利，德意法美發諸國聯軍會攻中國，美法因與英衝突，未允。法國止值軍國主義的拿破崙第三執政，勝於鴉片戰爭中英國獲利甚巨，頗願與英國聯合。恰巧這時有法國教士乍伯倫 (Chaplain) 在廣西被殺，法國遂引爲口實，與英國聯軍。於是英以額爾金 (Elgin) 爲全權大使，法以葛羅爲全權大使，先後率海軍抵香港。致最後通牒於名琛，限四十八小時內獻城投降。名琛迷信亂語，既不答覆，亦不爲備。聯軍乃於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進攻廣州，左右勸他速定對策，名琛答稱『過十五日彼必自退』，不許水師應戰。因名琛信父志誦亂語，謂『過十五日可以無事』，而廣州卒於十四日再陷。廣州既陷，奕名琛被俘去，英人挾至香港，其後（一八五八年）又挾至印度之加爾加答，一八五九年病死。時人爲之歌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輕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詞雖諷刺，然對於清室官吏的昏庸腐敗，尙未能形容於萬一。聯軍陷城後搜括督署財貨及藩庫銀二十萬兩，將軍督撫與各司道都避居佛山鎮，城中空無人，從此廣州便被英法軍佔領了三年之久。聯軍既得廣州，即乘勢迫清政府改訂約章。俄美亦趁火打劫，要求增改通商條件，四國公使會聯名致書大學士裕誠，由兩江總督何桂清轉達。清廷答以（大學士本職參贊內政，向無預聞外交之例，外交事當由邊臣議之。英法美三國事，已委黃宗漢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會議；俄事委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一時英使額爾金，法使葛羅，已集上海，得獲書謂無誠意，乃決議北上。英法俄美四國軍艦二十餘艘，於三月初雲集白河口。投書直督譚廷襄，仍請轉達清廷，急派全權議和，廷襄奏聞，詔戶部侍郎崇倫，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往會廷襄議款，英法謂無全權資格，拒絕不見，惟俄美二使略與周旋而已。大沽口原有砲台，爲天津門戶，外有積沙一道，船舶至此，往

往擱淺不能行。當四國投書時，廷襄遣武弁駕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英法聯軍遂常以小汽船及舢板探水，中國以時方議款，不之禁，亦不設備。四月八日（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突以小輪數十艘闖入大沽口，砲台遂陷，清廷大懼。急命科爾沁王僧格林沁馳赴天津，防敵深入；一面即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媾和全權大臣。英使所持擬新約五十六款，法使所持擬新約四十二款，要求照約簽字，桂、花據情入奏，清廷雖覺過苛，然以戰守皆無備，即無談判照所擬條款簽字，是爲天津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

中英天津條約：

- (一) 南京條約繼續有效；
 - (二) 兩國得互派公使駐京都；
 - (三) 中國官府須優待基督教徒，英人得入內地遊歷；
 - (四) 增開牛莊、廣州、台灣、潮州、瓊州五處及鎮江、九江、漢口爲商埠；
 - (五) 在華英人不受中國法律制裁；
 - (六) 減輕英貨入口稅；
 - (七) 賠償四百萬兩。
- 、 中法天津條約：
- (一) 兩國得互派公使駐京都；
 - (二) 增開瓊州、潮州、台灣、淡水、登州、江寧爲商埠；
 - (三) 得派領事駐各商埠，商人得自由租地建屋，並得派兵船泊內地遊弋各商埠；

(四) 中國官府須厚待天主教徒，法人得往內地遊歷；

(五) 中國官吏不得過問法人犯法事件；

(六) 法貨依最惠國待遇納入口稅；

(七) 賠款二百萬兩。

約既定，桂、花兩全權復和兩江總督何桂清同赴上海，會英法代表訂通商約章十條，這就是所謂協定稅則。其重要內容爲：(一) 進出口貨物不能免稅者，均納值百抽五之正稅；(二) 洋貨除正稅外納值百抽二·五的子口稅，即可運銷內地無阻；(三) 鴉片進口以洋藥之名課稅，每百斤納稅三十兩。這樣，不但中國稅則由人協定，且定稅則不分貨物品類，甚至連鴉片也索性當做正式進口貨了！中國國民經濟從此將受到怎樣的損害，實在是不堪想像的。

天津條約是南京條約的繼續和擴大，因爲第一，它們創立了列強在華的領事裁判權，中國司法從此完全喪失自主權；第二，它們更擴大了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門路，增加通商口岸，就是這種擴大的具體表現；第三，它們容許列強藉宗教的宣傳來擴大商品的銷路，因爲傳教士可以藉傳教深入中國內地，充當最優良的經濟視察員，偵察外國商品的銷路，等到獲得中國的信徒時，外國資本家就又在本地得到它的中國代理人了；第四，它們創立了中國對外的協定稅則，從此時起，外國資本主義衝倒了中國限制國際貿易的壁壘，中國完全喪失了關稅自主權。自英法藉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取得了侵略中國的特權以後，其他列強亦都先後援例要求利益均沾，這樣，中國便逐漸由獨立國淪爲列強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了。

天津條約簽字後，規定次年在京批准換約。英法軍艦方退出白河，駛抵上海，又強行探測長江水道。那時正是太平天國席捲長江流域的時候。英國正欲藉此撲滅太平天國的革命勢力，所以會上溯

至漢口停駐多日。測量形勢而回上海。當四國軍艦離津返滬時，粵東佛山鎮的民衆又起反英運動，而且形勢甚爲洶湧，他們實行武裝自衛，並出示懸賞購已夏禮首級，可見當時廣東民衆怨恨巴夏禮之深。英人甚感恐慌，乃要求總議大臣杜良解散廣東民團，撤粵督黃宗漢職，這顯然是干涉中國內政，桂良也部一一答應照辦。但是滿清政府對於天津條約卻實在有些不願實行，而且以爲洋人敢於如此跋扈，皆由於中國武備不足。於是詹格林沁到天津，一面彈劾直督譚廷襄，一面即佈置防禦工事，於白河兩岸築堡壘，建砲台，河中置堅固三柵，橫斷河道，以爲防禦敵人入寇之計。列強對於這種情形當然也不會不知道，所以當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二月，英以卜魯斯（*Thorne*）爲公使，法以布爾布隆（*Boulton*）爲公使，至中國換約時，英政府即訓令卜魯斯：『中國政府原忌外國公使至北京，如遇任何妨礙，須不顧一切，完全達到北京換約的目的。』同時電令東洋海軍艦隊長柯布以軍艦伴送卜魯斯至白河。英法二國公使抵白河，柯布堅欲大沽守將撤除白河武備，放公使進口，直督請共由北塘登岸，卜魯斯不肯，柯布且指揮艦隊攻砲台，破三柵。不料攻至第二柵後，兩岸砲發，彈如雨下，聯軍將卒被擊，英艦隊長傷足，法艦隊長亦負傷，上陸兵士則多沒於陷阱，共死亡四百五十左右，砲艦沉沒四艘，後得美國艦隊之助，始得脫險。聯軍在白河失敗的消息傳到倫敦、巴黎，一部分進步輿論多謂非批准條約後，英法兵艦實無航行白河之權，卜魯斯、柯布輕舉妄動，至被擊潰，實咎由自取。然英法政府仍極力主戰，因又增兵調將，英以額爾金爲全權公使，克隆特（*Grant*）爲海陸兩軍總督，率兵七千二百東來。一時空氣緊張，中外商人均驚惶相告。聯軍到上海，首探舟山列島虛實，至定海灣，見毫無兵備，心乃大定。急回上海整戰備，向渤海進發。懲前敗，不由大沽進軍，派士官偵探北塘防

禦，至則河口堡壘無一守兵，聯軍遂由此全部上陸。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僧格林沁經營防務，僅此一口，已用費百餘萬兩。忽有人建議應該讓敵人登陸以便襲擊它，僧格林沁狂於前次之捷，竟輕信撤防，致有此大錯。聯軍既登陸，先攻陷塘沽，繼又取大沽南北岸各砲台。壁壘已撤，白河成坦途，聯軍軍艦逕抵天津。英軍據左岸，法軍據右岸，城市遍翻英法旗。清政府見事至此，又祇得遣使求和。巴夏禮要求增開天津為商埠，增償英法軍費八百萬兩，並准英法兩使各帶隨員入京換約。清廷未接受，英法聯軍即於七月二十一日大舉北侵，其間巴夏禮雖為僧格林沁設計誘擒，解送北京，拘於刑部獄，然英法聯軍仍於八月七日攻陷張家灣，進佔通州。僧格林沁、端麟軍皆大敗。清帝見北京難守，決意北狩熱河，時正值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南軍不能北上馳援。英法聯軍遂陷北京，巴夏禮釋出，更縱火焚燒圓明園以洩憤，盡劫金器以去，兩國平分戰利品。俄公使伊格拉地也夫出任調停，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九月親王奕沂與英法議和，先付英法銀五十萬兩，訂立和約，是為北京條約。其主要內容：（一）天津條約繼續有效，（二）增開天津為商埠；（三）割九龍半島為英領地；（四）賠款增至八百萬兩，俟總督付清後，英法始撤兵。九月十一日奕沂與英使換約，十二日與法使換約，清廷完全屈服，英法聯軍始氣高趾揚地退出北京。

當英法聯軍之役發生的時候，馬克思正在倫敦，對於英國政府的侵略陰謀探悉甚詳，曾一連寫了四篇論文，於一八五九年九月十月間陸續寄往紐約每日論壇發表，題為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在論文中指出英國政府對於這兩次侵略戰爭應負完全責任，正因為新的對華戰爭是英國政府的預定計劃，所以滿清政府雖在天津條約中多方讓步，亦並不能鞏固和平，而使戰爭必然重起，事變的進程，完全證實了這個觀點。馬克思根據當時歐洲大陸的郵電傳來的消息，就會指出：『中國政府當時並不反對外交

使節前往北京，可是反對英國軍艦護送公使由白河西進，中國政府曾請卜魯斯由陸路入京，無須用兵力護送。中國人民因為清清楚楚地記得不久以前砲擊廣州的事件，所以認為這種兵力是實行侵略的工具。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與法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侵入太晤士河的權利嗎？所以英國這樣解釋英國公使前往北京的權利是極其奇怪的。在上一次對華戰爭發生時，英人曾有了一個發明，說砲擊中國的一個城市，這不是與中國本身作戰，而祇是與中國一個省份發生地方性的衝突。前種解釋與後種發明是同樣奇怪的。據英人自己的記載，英人曾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必要時用武力進攻北京，就是說統率威武十足的艦隊由白河西進，那末華人抵抗英人底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是有理的。華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壞條約，而祇是破壞了英人的侵略企圖。然而當英國公使自己破壞條約受到致訓時，英國政府機關報每日電訊却大肆咆哮起來，極力鼓吹「大不列顛應該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佔領京城，並應於奪取北京之後永遠佔據廣州」，並且露出極頂兇暴的侵略者面目，公然說：「我們（英國）應該鞭打每一個穿蟒袍而敢於侮辱我國國徽的官吏，應該把這些抗英的華人都當作海盜和兇手，吊在英國軍艦底桅桿上，應該教訓華人重視英人，英人高出於華人之上，英人應為華人底主人翁。」馬克思又指出英法聯軍之役有兩個特點，就是：（一）這次衝突帶有「全國的」性質，而不是「地方的」性質；第二，在開始的時候，華人對於歐洲的武力獲得「很大的勝利」。雖然這種「勝利」後來又終於被英法人砲所轟碎，然而仍有中國民族自衛戰爭的意義。

第五節 帝俄的侵入——中俄交涉

俄國與中國接壤，與中國發生關係很早，惟在外交上發生正式的關係，則自尼布楚條約始。俄皇

布明萬曆年間即注意於西比利亞的經營，崇禎時更進窺黑龍江。至清順治初年，侵佔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諸地，自此以後，就屢與中國兵起衝突。當時俄羅斯尚未發達產業資本主義，整個的國民經濟是建築在農奴制度上。雖一方向西方波羅的海區諸民族施行無饜的榨取，尋求通西方的門戶；一方企圖向東方發展，侵入滿洲邊境，這些活動後來都成爲俄國資本主義的原始蓄積的重要關鍵。但封建國家究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堅強性，它那時在軍事上，技術和戰鬥力都不見得比中國怎樣優越，所以一六五〇年（清順治八年）時，俄國築城於雅克薩河口，俄軍竟爲清軍擊退。三年後俄將史特巴羅又引兵下黑龍江，更爲清軍所破。又四年俄軍再侵邊疆，復敗於清軍，史特巴羅戰死。俄皇見武力不敵，乃以請互市爲名，兩度遣使臣朝貢於中國，實際是要窺探中國的虛實。清政府素以天朝自居，見俄使來朝，更傲慢自大，清帝致俄皇書皆自稱「朕」。（註十三）一六七四年（康熙十四年），俄又遣使來北京要求與清政府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復爲清廷所拒。俄人乃積極經營雅克薩，仍圖以武力侵入黑龍江。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廷在黑龍江亦大修軍備，次年清政府有征俄之舉，在愛輝附近將俄軍擊敗，俘其全軍。二年後清水陸軍又大破俄軍於雅克薩城。適俄皇有內亂，無力東顧，急欲與中國議和。一六八八年中俄兩國遂以荷蘭使臣的介紹，會議於尼布楚。中國大臣索額圖以康熙二十七年出發，與俄國全權公使費約多羅於一六八八年八月會於尼布楚，清聖祖命都統郎坦

（註十三）清帝會賂書俄皇云：『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通中國，今爾誠心向化，遣使貢納方物，朕實嘉之。特賜禮物，即使爾使賚去，以明朕柔遠之意。爾其欽承，永效忠順，以世恩寵』。

發兵一萬，自愛輝水陸並進，以爲外交後盾。俄欲以黑龍江爲國界，中國欲以貝加爾湖沿外興安嶺爲國界。經兩次會議，中國稍讓步，以額爾古納河與外興安嶺爲國界，俄使初仍堅拒，後見中國兵力強盛，卒從中國之意，訂尼布楚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一）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三）拆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雜物，聽遷往俄境；（四）兩國穢戶人等不許擅越國界；（五）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六）行旅有官許文票者，得貿易不禁。

尼布楚條約訂立之後，清政府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爲守備兵。自是，中俄國界既明，東北邊境之紛議遂定，兩國相安無事者垂六十餘年。一六九三年由俄國請求，中國又與訂北京通商條約，規定俄國商隊三年至北京一次，每隊限二百人，駐留八十日，貿易免稅。康熙末，俄遣使至北京，請改商約，未得要領而返。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俄女皇加德琳一世再遣使臣來中國，要求如前，且請會議蒙古、西比利亞國界。清政府乃遣使與俄使薩瓦會議於布拉河，訂立恰克圖條約（或稱布拉條約）。主要內容如下：（一）以恰克圖爲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達齊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二）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捕送本國；（三）以烏得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此約訂後，中俄邊界暫無糾紛。恰克圖變成漠北一重要貿易市場，中俄貿易日盛。但中間曾因細故停止貿易，恰克圖市場封閉了三次。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兩國復增訂新約，是爲恰克圖新約。

沙皇俄國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比其他國家遲些。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在俄國境內，工廠還是很少的。貴族地主的農奴制經濟佔最主要地位。在農奴制度之下，工業不能真正發展起

來。一八六一年廢止農奴法之後，俄國工業資本主義才開始比較迅速的發展。（註十四）這必然促進俄國向國外發展的活動。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列強開始分割在中國的影響力，又大刺激起俄國資本主義向中國的侵略。俄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於是乘機加入與列強的競爭。這種競爭是以雙管齊下的形勢表示出來的，即一方面藉着商業活動與外交活動，乘英法等向中國侵略時，要求與英法美平分春色；一方面藉着地理的接近，向着中國東北邊境進行領土的侵略，並取得通往太平洋的出路。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俄皇授權於穆拉維夫（Murav'ev），任命他爲東西比利亞總督，使經營遠東。穆氏主張佔領黑龍江口及海岸附近，利用黑龍江的航路以開發西比利亞，那時俄人早已私移外興安嶺界碑，並暗在黑龍江北岸佔守，據爲殖民地。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俄皇續派業維爾斯基（Nevel'ky）率軍艦來東方，與穆氏合力經營。一八四九五月穆氏由伊爾庫次克出發，過鄂霍次克海至堪察加半島觀察地勢，因定彼得帕夫羅夫斯克（Petropavlovsk）爲俄國的東方軍港，而業維爾斯基更探測黑龍江口，過庫頁島向北航行，發現庫頁島是一個脫離大陸的大島，證明以前地理學家認庫頁島爲半島之說不確。因得知船行至此便可由韃靼海直接到達黑龍江口，不必經過長期凍冰的鄂霍次克海，爲之喜出望外。即與穆氏商量，於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上溯黑龍江，佔領下游之地，建尼古拉維斯克（Nikolayevsk，——即廟街）於黑龍江南岸，而將彼得帕夫羅夫斯克的軍隊移至新軍港。穆氏又編成一萬餘人的哥薩克軍隊，佔領庫頁島，經營黑龍江口一帶地方。一八五四年（清咸豐四年）俄國正在與英法土耳其爲爭巴爾幹半島的霸權而發生戰爭，即是有名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註十四）詳見列寧所著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爲着要保護俄國在東方的商業及抵抗英法的擾害，穆拉維夫主張由黑龍江運兵往江口佈置防務，同時奪取中國的領土，當時中國內部正是清軍與太平軍決鬪的時期，加之又有英法聯軍之役，清廷無暇北顧。是年俄軍即由黑龍江輸集江口，並沿途測量地勢。等到軍隊輸送完畢，穆拉維夫即要求中國劃界。清廷命黑龍江將軍奕山與穆拉維夫會議於愛琿，穆氏預擬條約六款，要求以黑龍江與烏蘇里河爲兩國國境，江南歸中國，江北歸俄。奕山據尼布楚條約拒之，會議遂決裂。一八五六年俄政府任命海軍少將普查清爲全權大使，自黑龍江航行至天津，要求定界，清政府婉却之。一八五七年俄政府乘英法聯軍之役派公使布恬庭（Patinon）與英法美三國公使聯名致書清政府，請派全權大臣到上海會議各國善後事宜，清廷藉口俄事交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該公使不得要領，惟靜候英法聯軍的動靜。一八五八年穆拉維夫屯兵萬餘於黑龍江口，迫奕山答覆定界事件。清廷既屈於實力，又未能事先預防，乃命奕山與穆氏會議，約遂定，是爲愛琿條約。約凡三條，大要是：（一）黑龍江以北全爲俄國領地，但原住精奇里江的滿人，仍可永居原地，歸中國保護；（二）自烏蘇里江至東海岸之地爲中俄共管地；（三）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只准中俄兩國船舶通航及兩國人民貿易。

愛琿條約根本推翻了以前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的平等原則，中國喪失了領土百數十萬里，斷送了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的航權。於是俄國資本主義得伸其觸角於東方，找着了通太平洋最便利的出路。俄國在北滿的資本主義經營，就是從此時起打下基礎的。

愛琿條約既使中國失地無算，不旋踵間，又有天津條約之訂立。蓋當英法聯軍軍艦抵津與清臣議和時，俄使布恬庭亦同時抵津。等到英法的天津條約締結後，布恬庭亦援例另訂中俄天津條約十二條，主要的是：（一）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逕行清軍機

大臣或特派大學士，往來照會平等；（二）除兩國陸路於原定邊境通商外，會議決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七處通商，若別國再在沿海增設商埠，准俄國一律照辦；（三）俄國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再派兵船在各口岸停泊，以資維護，自此俄國就成爲中國的最惠國了。

二年後（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陷北京，恭親王不敢當和局，俄使伊格那地也夫乘機出任調人，以身保恭親王勸其出主和議。和議既成，俄人遂藉口要報酬。是年十二月中俄遂訂北京條約。重要條款爲：（一）兩國沿烏蘇里江、松阿、察河、興凱湖、白含湖、呼布圖河、及圖們江爲界，以東屬俄，以西屬中國；（二）新疆未勘定之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定界爲標。自雍正五年所定沙濱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達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特穆圖爾淖爾南至浩罕邊境爲界；（三）恰克圖與北京間由俄貿易，並許俄國在庫倫設領事一人；（四）開新疆之喀什噶爾爲商埠；（五）俄國在中國通商地域可以設立領事。北京條約締結後，俄人遂於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建阿穆爾州、沿海州更經營海參崴以爲軍港——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這樣，俄國不但在經濟上取得了與中國通商的出路，在軍事上亦足以控制東方了，這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史上乃是佔着異常重要的地位的。

第六節 鴉片戰爭的性質和教訓

十九世紀中葉，西歐資本主義正在向上發展，積極尋找銷售商品的市場與爭奪殖民地。中國領土的廣大，人口的衆多，天然物產的豐富，就成爲西歐資本主義侵略的最好對象。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

就開始輸出商品至中國銷售，積極要求與中國通商。可是，當時滿清政府，却處處拒絕與外國通商，固執其閉關自守的政策。這種閉關自守的政策，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國的封建經濟結構對於大工業生產品的頑抗；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推動這個政策的主要原因，『就是清朝害怕外國人會扶助大部分中國人在十七世紀前半期或大約在這個時期內所有過的那種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馬克思）但是，外國資本主義，就以槍炮來粉碎中國的鎖國政策，打開中國的萬里長城了，首先就是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

這一戰爭的性質，在英國方面是帝國主義性的侵略戰爭，亦即是非正義的戰爭。這裡任何藉口都不能為英國強盜辯護。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記載英國國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辯論時，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英人爲要辯護砲擊廣州的野蠻舉動，而究竟加中國政府以什麼罪名呢？他們說中國政府破壞一八四三年善後條約第九條，該條約說，留居香港的英國兵艦和商船上的中國犯人，中國官廳不得逮捕，而中國官吏却不經英國領事同意，在航行珠江的亞羅船上逮捕了中國海盜。因此就發生了亞羅船是不是英國輪船的問題。據德爾比（英國議員）說，亞羅船是中國人建造的，是中國人依法沒收的，是賣給中國人的，是中國人所買的，船上水手是中國人，船是中國人所有的。這隻中國商船到底怎樣會變成了英國商船呢？他們說因爲他們在香港購買了英商通航證或航行執照。這種證書的法律根據就是一八五五年三月香港地方官廳所頒佈的命令，可是這個命令不但破壞了中英間的現有條約，而且還取消英國法權的本身；因此它是不發生效力的。但就是依照這個無效的文件，亞羅船也不得藉它來辯護，因爲亞羅船不合該文件所規定的條件，而且它的執照已滿了期。這一點，連包林爵士自己都承認了。可是，有人說，亞羅船是不是英國船，這都沒有關係，但船上豎的是英國旗子，而這

面旗子却受了侮辱。第一，要是真的豎了旗子，那是豎得不合法的；第二，究竟是否豎了旗子，這還是問題。關於這一點，英國方面所說的與中國方面所說的情形互有出入，然而中國方面所說的情形，有葡萄牙八十三號船上掌帆和水手經過領事所寄出的供詞可以證明。如此，法律理由既無根據，國家體面問題也不能成立。」（註十五）如果我們再借用德爾比的話，那末當時的英國侵略者真是所謂「朝相思，暮相思，夜裡醒來也相思，他們祇要進得廣州城，獲得巨大利益，則任何犧牲不爲大，任何流血不足惜」。所以馬克思又說，英國這種侵略行爲，「實際上是大规模的海盜搶劫」。並且更憤慨地說：「這段歷史自始至終只能令人厭惡。」然而許多帝國主義的歷史學家及我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却都認爲：英國當時對華戰爭不是帝國主義的強盜侵略戰爭，而是進行了進步的戰爭。他們所舉出的理由和根據，大都以爲：滿清朝廷是反動的封建政府，執行了閉關自守的政策，反對與外人自由通商，而英國正是要自由通商，鴉片戰爭正打破了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或者認爲：列寧會說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的產物，而英國進行鴉片戰爭的時候，却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當時還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因此，當時英國對華戰爭也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甚至像日本佐野袞蓑美這樣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學家，也說：「鴉片戰爭不外是英國以開拓工業商品市場爲目的的戰爭，決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註十六）但是，我們如果能够更深刻地觀察問題，那就不難證明上述理由都是不能存立的。

（註十五）見馬恩論中國五十至五十二頁。

（註十六）見佐野袞蓑美所著中國歷史教程中譯本，二百九十七頁。

因爲鴉片戰爭時中英所爭論的問題，並非一般的高業貿易自由問題，而是禁止或准許鴉片貿易的問題，這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十八世紀當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之間的鬭爭所具有的性質，和外國商人與中國海關之間的一般爭執所具有的性質相同，而從十九世紀初葉起，這個鬭爭就具有完全特別的性質。」（註十七）這特別性質的主要內容就是英國強迫賣鴉片到中國，以毒害中國人民，而中國政府則表示反對。能够說英國強賣鴉片是合理，而中國政府反對鴉片反而不合正義嗎？顯然是不能的。當時滿清政府雖是反動的封建政府，但是它們會起來反對英國的毒害中國政策，它們所進行的反對英國侵華戰爭，在客觀上減弱了當時侵略者英國的統治力量，因此，當時滿清政府所進行的自衛戰爭也正是合乎正義的戰爭。這正如一八二二年拿破崙從莫斯科驅逐出去，仍不失爲正義的保衛俄國的戰爭，但是，當他爲保衛俄國不受法國的奴役，把拿破崙從莫斯科驅逐出去，仍不失爲正義的保衛俄國的戰爭。又如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國王塞拉西沒有民主主義的思想，他是一個封建國王，但是，他所進行的反對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也是進步的正義的戰爭一樣。

況且滿清政府及其軍隊雖然腐敗反動，然而在戰爭中還是表現了中國民族的抵抗力。在戰爭中，廣東民衆平英國數萬人的組織及各地民衆自衛運動的再接再起，都可作爲當時中國人民有反抗外寇侵略的要求和力量。可惜受着當時各種條件的限制，這類豐厚的民族潛力還沒有能够充分發揚。然而鴉片戰爭及戰後，廣東民衆反英運動的興起，還是給了外寇以重創。南京條約雖已訂立，但英人仍不得進入廣州，因爲民衆仍是積極地而且狂熱地參加民族自衛的鬭爭。一八五六年英國藉口亞羅船事件，

（註十七）見馬恩論中國五十八頁。

攻陷廣州，但終因廣東民衆之反英鬥爭壓迫，旋又退出廣州。當時這種民族自衛鬥爭，大都是採用那種原始的行動。這種原始的行動，正像恩格斯所說：『我們最好是不要像英國的貴族報紙那樣去斥責華人可怕的殘暴行動，而應承認這是爭取自己生存的鬥爭，也是謀保存中華民族的民族戰爭……對於奮起的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採取的手段，不應根據通常進行戰爭的公認法則的觀點，或者根據某種抽象的標準在估計，而應根據這個奮起的人民已達到的那種文明程度的觀點及對於侵略者的實際打擊去估計。』（註十八）問題已經這樣明白，中國所進行的是民族自衛戰爭，而英國當時所進行的戰爭，已經就是帝國主義性質的侵略戰爭，如果當時英國所進行的不是侵略戰爭，那末中國當時所進行的民族自衛的鬥爭，豈不成了無的放矢嗎？

至於說列寧會說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產物，而英國進行鴉片戰爭的時候，却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當時還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因此就認為當時英國對華戰爭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這也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列寧只說過大體上帝國主義是成熟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即係指的這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最高的最後的階段，並沒有說帝國主義是完全等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才一齊成熟的。事實上，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得最早的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即已發展到帝國主義的初步；自然，那時候的英國帝國主義和二十世紀的完全成熟的帝國主義，有着質上的不同，然而絕不能因此就說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還沒有變成帝國主義。列寧會說：『在英國有首要作用的是它那種殖民地的佔有』，而當時英國以掠奪形式來開拓市場，使中國殖民地化的行爲，正是帝國主義

（註十八）見馬恩論中國八十二頁。

的行爲，因此，鴉片戰爭也正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戰爭，佐野袈婆美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機械的觀點。好像列寧在寫帝國主義論的時候，就已預料到會發生這種錯誤一樣，所以他在說到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的時候，會特別指明這一點：『怎樣從數量轉變爲質量，怎樣從成熟的資本主義變爲帝國主義。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裡面的一切界線，當然是有條件的，並且是活動的。所以爭論帝國主義之完全成立究竟在何年何代，那就愚不可及了』。（註十九）

確定了鴉片戰爭的性質，我們可以再來研究一下鴉片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及其對於目前中國抗戰的教訓，鴉片戰爭不是兩個階段的戰爭，也不是三個階段的戰爭，而是一個階段。這個戰爭自始至終只是英國方面的戰略進攻，中國方面之戰略防禦，以至失敗，被迫而訂城下之盟。中國方面既未能在當時集中兵力，進行戰略的反攻，以戰勝英國；也未能堅持反英的長期民族解放戰爭，經過相持階段，然後實行戰略的反攻。這種情形是由當時的特種歷史條件與主觀能力優劣所決定的。由於當時英國是一個強國，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弱國，由於英國主觀能力強些，我國指揮戰爭的主觀能力差些。加以當時中國政府沒有抗戰決心，政治上的黑暗，不敢動員全民抗戰，以及缺乏正確的外交政策等，所以不免於失敗。現在我們的抗戰和一百年前的歷史條件與國際條件都已大不相同，然而爲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仍應牢記着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不要重複過去歷史上的錯誤。

（註十九）見列寧選集，第八卷，解放社版，一百二十三頁。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發生的背景

鴉片戰爭後的第八年，發生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一運動，很明白的是鴉片戰爭的結果。資本主義列強自十八世紀以來，藉着通商將其勢力逐漸由都市而伸入農村。特別是在鴉片戰爭後，英法美諸國取得了侵略中國的種種便利與工具，如開闢商埠，協定稅則等，因此也就更容易佔領中國的市場。在最初列強輸入中國的商品以棉花鴉片爲大宗，這表明那時歐洲資本主義尚未十分發達，還沒有大量的機製工業品流入東方市場。但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英法美等國對中國的輸出品日益增多者，爲棉布、五金與金屬品，這樣就使中國的手工業漸次爲歐美的機器工業所壓倒。資本主義列強不僅自己伸展其血手來侵略中國，還利用中國的「洋商」來幫助它們的商業經營。例如在鴉片戰爭的前夜，廣州就有十三商行的設立，這種洋商就是中國實辦資產階級的起源。加以外貨輸入的日益增加，中國紋銀的大量外溢，其結果就是國內的銀價高漲，物價騰貴。同時，鉅大的戰敗賠款實際是由剝削民衆來負擔，外國資本家和中國高利貸者更乘機放出高利貸來盤剝貧民，中國民衆本已負擔不了那樣大的賠款，現在又要受到這種高利貸盤剝，自然更要弄得民不聊生了！特別是南方沿海諸省——如兩廣、福建等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最烈，太平天國運動發源於兩廣和這實有很大的關係。不但如此，自鴉片戰爭英國以武力掠奪中國以後，推進了中國各地的民族自衛運動，如平

英國的反英鬭爭，就是這種運動最顯著的實例。這種偉大的反對外寇的民族自衛運動刺戟了中國民衆的政治覺醒，使他們認識非推翻昏庸腐敗喪權辱國的滿清政府，建立一個新的革命的政府，是不足以抵抗列強的侵略的。這時候，在中國整個政治與經濟生活中顯然已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方面是滿清政府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屈服投降，逐漸走向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來支持其反動統治的趨勢；另一方面，就是廣大的民衆在外國資本主義與滿清統治的壓迫剝削下，開展着廣大的反對滿清統治，同時也就是反對外族侵略的群衆運動。

然而太平天國革命的產生還有它更深刻的社會根源。自滿族入主中國以後，在中國原已形成了一種變重的封建剝削關係。一方面農民大眾被地主階級以租役等方式榨取得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廣大的漢族民衆受着忍無可忍的專制的壓迫，使全國充滿了憤懣不平之氣。因此繼續不斷的農民暴動曾經不止一次地動搖了清室的統治。當時國內的商業資本已大爲活躍，但它不曾促進中國生產方法的轉變，正是相反，全國的商業資產階級都和土地的剝削關係結了不解之緣，地主豪紳、高利貸者與商業資本在農村構成了剝削貧農、中農與手工業者的三位一體。斯大林對於中國社會的這一特點，曾有很深刻的分析，他說：『在榨取農民膏血這一點上，商業資本的存在，並不讓於一切封建代表。這種原始蓄積形式的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與封建統治及地主統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商業資本借用封建制度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中世紀方法』。這只要在撲滅太平天國的反革命戰爭中，中國的商業資產階級與地主及資本主義列強聯成一氣也就知道了。當時商業資本既因陳腐的生產關係之桎梏，不能轉化爲產業資本，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於是大量的財富積聚除了供官僚富豪的揮霍享樂以外，一部分轉化爲高利貸資本（如典當業的發展），更擴大對於城市貧民與農民的榨取；

一部分流入海外，使中國資本家在南洋群島等地佔着相當的優勢；還有一部分則投入土地中，形成巨大的土地集中運動。而由於官僚制度的發達，使這種土地集中過程更日益膨脹迅速起來。滿清皇帝就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地主，它自入關後即以圈爲標幟（圈地）直接搶奪漢族土地，將所搶奪的土地一部分歸自己直接管轄，稱爲皇室莊田。一部分分給皇族王公，是爲宗室莊田（或稱封地）。另一部分分給滿洲軍隊（滿洲八旗），謂之旗地。此外尚有所謂駐防莊田、屯田、官田、寺廟地等。顯然的，貴族、官僚、商業資本家與高利貸者在當時也都成了事實上的地主，兼併土地極爲流行。這樣，就使廣大的農民日益走入喪失土地或無地化的過程中。例如當時湖南巡撫楊錫綬奏書中就會說到這一層：『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註一）地主與統治階級利用土地的壟斷來剝削農民。農民向地主貴族租口耕種，須以收穫的半數或半數以上繳納地主，以額外禮物孝敬地主。當地主家中有事或農忙時，佃戶須替地主進行無償勞動。而統治階級更實行徭役制度，當戰爭或皇室需要時，徵調無數農民進行無償的強迫勞動，因此而死亡的農戶往往以千萬計。如此，農民是在啼飢號寒的苦境中，在殘酷的剝削下喘息着。而由吸取農民勞動大衆的血汗而致富的地主、官僚、高利貸者、商業資本家則『積銀如邱』『揮金似土』，窮奢極慾，頤指氣使。農民若有不滿，則壓迫隨之。當時地主階級在農村擁有種種壓榨農民的工具和機關，他們有供其驅使的武裝，有監禁農民的牢獄，並且與官府相勾結，將農民的自由剝奪得乾乾淨淨。種種殘酷的屠殺壓制情形，比之於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無不及。於是日益貧困化的農民大衆

（註一）見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

於喪失土地之外，又呻吟於地主豪紳的刀口鯁之下。於是他們的實生活，使他們要痛恨貧富的不均，起來要求財產的再分配，要求廢止財產的私有。

在另一方面，我們還不要忘記了當時滿族對於漢民的壓迫亦是誘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直接原因之一。滿清政府爲着要鎮壓漢人的反抗，曾經施行極殘酷而又廣大的屠戮，所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不過是傳聞至今的兩個較大的流血慘劇。其實，有清一代，類似這樣大規模的虐殺正不知有多少。清帝的寶座就是用漢人殷紅的腥血染成的。不僅如此，滿清政府在征服漢族之後，奪取了廣大的農民的土地，以豢養它的爪牙，組織了雄厚的彈壓漢人反抗的武裝勢力，即所謂滿洲八旗軍，分駐於通都重鎮，以控制全中國。此外尚有蒙古八旗，漢人八旗與綠營之編制，約六十六萬人，分駐於各地關隘。所有這些軍隊的給養與軍備，無不取給於榨取農民的租稅。而軍隊紀律則腐敗不堪，隨處掠奪百姓。據說調赴廣州之軍隊，『沿途劫奪，捶撻貧民』，鮮有例外。（註二）統治階級傾全力於虐殺與對民衆的殘酷榨取，更使國防空虛，外寇易於侵入，造成外患頻仍與水旱疫癘等災害易於流行，常將千百萬農民捲入於飢饉、流亡、貧困與死亡中，至少亦陷於半飢餓的狀態中。這樣，要想消滅他們的民族仇恨與階級仇恨，不要他們起來革命，當然是萬不可能的了。

歸結起來，我們可以知道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在於滿清的專制政治與殘酷的封建剝削聯結起來，使廣大的農民與城市貧民做了犧牲，抑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更在日益破壞中國的國民經濟，激起了中國民族解放的鬪爭，所有這些成因匯合起來，就釀成了

（註二）見王鈞宰金壺浪墨第三，引羊城日報語。

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代橫掃全國的農民革命戰爭。這一農民戰爭不僅是一個反滿清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且有很濃厚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意義。這一戰爭是在鴉片戰爭後，在那首先和西洋資本主義接觸的南方爆發起來的。而經過英法聯軍之役清朝可恥的喪權辱國，這個運動就更加磅礴和瀾漫。在一八五八年，恩格斯這樣寫過：「一些動搖不定的亞洲帝國，一個一個地變成歐人營業精神的犧牲品。我們這裡可看到這樣的一個亞洲帝國，這個帝國，已極其腐化，它未必能够在什麼地方約束本國民衆或抵抗外國的侵入。」（註三）是的，中國人民經過歐人的打擊，已在開始覺悟腐化不堪的滿洲朝廷不能成爲自己民族的保衛者，他們已開始覺悟自救更生的必要，太平天國運動，就是用原始形式表現出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自救更生運動。

第二節 太平天國革命首的中國農民戰爭

滿清政府入關時，曾用殘暴的手段屠殺反抗滿清統治的漢族，以鞏固其異族統治。但在滿清政府殘暴的壓迫下，中國農民反對滿清和地主的鬪爭，遠在太平天國以前就已興起，並發展成爲連綿不斷的農民戰爭，這些農民戰爭，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先驅。

這些農民戰爭較早的有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的臨清事件。那年山東兗州貧民數千舉行起義，攻陷壽張、堂邑、陽穀各縣，圍攻臨清，領導者爲王倫。到一七八一年甘肅回民在馬明心的領導下企圖起義，結果領導者爲統治階級捕之下獄。於是回民群起圍攻蘭州劫獄，與滿清軍隊血戰數日，未

（註三）見恩格斯所作俄國在遠東之成功。

得勝，馬明心被害。一七八三年甘肅回民以『爲馬明心復仇』相號召，又起義於通渭之石峯堡。越五年又有台灣之變。是年台灣之林爽文領導黎民起義於鳳山，攻陷彰化、諸羅、淡水等縣，曾與統治階級搏戰數次。一七九五年湘黔邊之苗民因反對統治階級之強佔土地亦奮起鬪爭，陷乾州，攻保靖、秀山、松桃、銅仁等地，前後與滿清軍隊抗戰十餘年。這些起義後來都被滿清政府鎮壓下去了，可是繼之而起的，就是一七九三年至一八〇二年北方五省著名的白蓮教暴動。

白蓮教本是元末漢族志士假借佛教迷信以驅逐胡元爲宗旨的一種秘密結社，創立者爲樂城的韓山童等。元滅後，其勢漸衰。但當明朝的官僚、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加劇的時候，白蓮教的聲勢又浩大起來。如蘄州王森、山東徐鴻儒等都會聚衆揭竿起事，雖然被統治階級鎮壓下去，但它在民間的潛勢力極大，受其影響與參加其組織的農民、貧民，多至二三百萬人。等到滿清入主中原，白蓮教更在『反清復明』的旗幟之下暗中進行反對滿清政府的民族獨立運動，一時附從者極衆。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河南教首劉松以謀亂被捕，遣戍甘肅。白蓮教遂以劉松之徒劉之協、宋之清等爲領袖，而擁一王姓童子，僞稱明裔朱姓，以號召群衆，倡言滿清劫運將至，密謀起事。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事發，教徒多被捕殺，惟劉之協漏網，清廷下令窮索。鄂豫皖三省官府乃輾轉搜究，一般貪官污吏更乘機敲榨搜括，如武昌同知常丹葵在荊宜治理教衆，被株連者達數千人，於是燃起了廣大的農民群衆反滿的怒火。恰巧此時清室大興征苗之師，調兵轉餉，牽動七省，農民的血汗被敲吸殆盡。浩大的白蓮教暴動遂在『官逼民反』的口號之下一發而不可復遏了。當各省官府窮索劉之協時，荊宜等地教徒就揭竿而起，未及數月，暴動的群衆在各地沒收地主、官僚、旗人、富豪的財產，對於反對暴動的富家官吏都加以殺戮。於是七省的地主豪紳與商業資產階級組織了雄厚的武裝——所謂『鄉勇』等的

助滿清軍隊來征剿。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川楚的暴動始剿平，二年後陝甘的殘餘鬪爭亦被撲滅。自起事起至滅亡爲止，白蓮教的戰爭前後凡歷八年之久。經過了四十餘年後，遂有太平天國之興起。

當白蓮教的暴動行將消滅的時候，在東南沿海諸省又有海寇之亂，所謂海寇都是由當時受地主、官僚、商人剝削壓迫得無出路的農民和城市失業貧民轉變而來的。先是安南王阮光平（乾隆末）以兵力經營得國，因財政困難，乃招集沿海亡命之徒，命劫近海船舶佐國用。最初海盜的活動範圍是在粵海，以後漸侵入閩浙，有鳳尾幫、水澳幫等名。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海盜集艇百餘艘進犯台州失敗，其後安南易主，杜絕海盜入境，海盜驟失憑依，乃以閩海爲根據地，劫掠商船。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年），海盜蔡牽兩股犯浙境，復爲清軍所敗。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清將李長庚與蔡牽戰於粵海黑水洋中，長庚戰死。但蔡牽所率的海寇亦敗走安南。次年三月蔡牽與廣東海盜朱濱部聯合，在浙海游弋。朱濱死，弟溼代領其衆，旋降於清軍，蔡牽勢益孤。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年）蔡牽爲清軍擊敗，死之。餘衆悉降，閩海遂平。後來粵海張保股海盜萬餘亦爲清政府招撫，粵海亦平。海寇之亂，無疑的亦是十九世紀東南諸省貧苦民衆的鬪爭，只是沒有固定的政治目標和堅強的領導幹部，所以不能轉變爲革命戰爭。

自白蓮教暴動與海寇叛亂相繼撲滅以後，清室以爲從此可以安然無事的加緊對民衆的掠奪了，誰料不久又有天理教的暴動爆發。天理教原是白蓮教的支派，其流布畿南一帶者，有八卦、榮華、紅洋、白易諸名。八卦教群眾尤多，旋改名爲天理教，遍布於山西、河南、山東等省，而以李文成、文清等爲領袖，附從群眾達數萬，以貧農、手工業者居多。其目的與白蓮教一樣，都是要反對滿清與地主

、富豪，而建立漢族的農民政府。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天理教領袖李文成被捕下獄，暴動遂因以誘發起來，參加群眾三四千人，攻破了滑縣縣城，將文成奪出牢獄，並殺死滑縣知縣強克捷全家。同時文清在京師發動暴動，旋失敗，文清爲清政府所捕殺。但李文成一部的暴動，却在直隸、山東、河南擴大起來，與清政府及地主富豪聯合的武裝勢力會實行過許多英勇的鬪爭，亦因力量不敵卒被消滅，暴動領袖李文成並因而殉難。暴動失敗的時候，統治階級照例來一次大屠殺大流血的恐怖：「除教匪殲除外，良民被殺者二萬餘人」（註四）這筆血債留待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時候償還了。

除了上述的三大農民暴動外，寫在太平天國革命史的前面者，還有許多零碎的地方的鬪爭和暴動。如嘉慶十八年陝西三才峽的箱工（統治階級稱爲「箱賊」）暴動，江西胡秉輝之亂，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八月河南教民的暴動，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山西趙城的教民暴動，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湖南武岡教民的暴動，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貴州謝法真的暴動，湖北崇陽的農民暴動，湖南荊陽的農民暴動等，都是貧農及城市貧民手工業者反官僚、地主、富豪的鬪爭，此等鬪爭由於不能彼此匯合起來，而缺乏中心的政治領導，都相繼爲官府、豪紳、地主鎮壓下去了。

上述各種農民戰爭雖然此起彼伏的綿延了五六十年，雖然戰爭的區域普及至南方與北方各省，可是結果都失敗了。這是因爲它們主觀上包含着各種弱點，諸如各個起義隊伍中本身極其渙散，而各個起義隊伍間又毫無聯繫，更沒有統一的指揮。因爲「農民的散漫，很使他們共同的合作發生困難」，同時又無明確的政治綱領，所謂「反清復明」僅是一種籠統的鬪爭目標，而沒有明確的具體的能動員

（註四）見國史第十一冊。

群衆參加鬪爭的行動爲領。這些弱點都是由於當時中國沒有先進的階級與革命的政黨領導的關係。也正因存在着這些弱點，就使滿清統治階級易於用各個擊破的策略來撲滅起義。此外，上述農民戰爭還帶着一種共同的特性，即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與原始暴動形式的特性。不論是白蓮教或是天理教，都以迷信去圖聚群衆，暴動後群衆很多發展成爲一種搶掠的行爲，並盡其破壞之能事以洩憤，這是當時社會歷史條件與農民落後意識的反映。有時候『這種情形與其說是鬪爭，不如說是拼命和報仇的表現』；然而這種『原始的騷動也已經表顯了一些覺悟性底激發，他們已經不復堅信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之堅固而不可動搖，他們已開始感覺得（不說他們已經開始明瞭）必須要共同起來反抗，他們已經拒絕向統治者作奴隸式的服從了』。（列寧）失敗原因除主觀弱點外，在客觀上還是由於滿清政府的兇殘的鎮壓。當時統治階級除調動正規軍隊外，更組織豪紳地主的武裝（鄉勇）協剿農民的暴動，用殘酷的屠殺對付起義農民，所謂『不問首從都立斬』，就是他們對付革命民衆的律例。然而屠殺不能解決農民戰爭興起的根本原因的，因此接踵而來的就是更廣泛的強有力的農民戰爭——太平天國。

這裡，當然不能把這次太平天國起義和上述各種農民戰爭一樣看待。問題是中國已不是簡單閉關自守的中國了。海禁已開放，中國農民的敵人，已不限於舊的剝削者，而且有新來的民族敵人。這新來的民族敵人既然挾着鴉片、聖經、商品以俱來，既然用砲艦政策打開了中國的門戶，開闢了中國的市場；就必然要把中國捲入世界經濟的漩渦，因而中國社會也就不得不醞釀着新的變動。在這時候，農民戰爭就不僅演着反封建反滿清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作用，而必然被賦與着民族自救更生的意義。這裡，我們正可以看到中國過去歷史，幾乎每二百年一週緊接着農業大饑荒（在太平天國革命發動以後，即一八四六至一八五〇年全中國人也正爆發着大災荒）所形成的政治大恐慌——農民大起義，

在這時候，也正以更新穎的內容和形態再顯現出來。

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勃興和戰爭

和中外歷史上許多農民暴動總是帶着濃厚的宗教氣味一樣，太平天國的興起亦是假託於宗教：「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洪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事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後以傳教遊廣西，居鵬化山」。(註五)洪秀全於一八一二年生於廣東花縣，家貧而幼失父母，曾身親農牧，因不滿當時社會，遂有志革命。見上帝會(又名三點會)可以號召群眾，遂與馮雲山同往加入。後被推爲教主，便把基督教解釋成爲他自己的宗教。以耶和華爲天父，基督爲其長子，自稱爲耶和華的次子，並吸取其基督教的原始教義，主張一切人類都應平等，後來太平天國所倡的宗教公產主義，就是導源於此。這時和秀全、雲山共同圖謀革命的，有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秦日綱等，依附群眾也日益增多，上帝會在廣西就佔着很大的勢力。當時南方諸省的破產農民與失業游民正在各地發生騷動，其勢洶洶，如慶雲的張家福股，柳州的山豬羊股，武寧的劉宮方股，象州的區振組股，潯州的謝紅股，都是其中最有力量的。清兵到處剿討，疲於奔命，上帝會就乘機活動。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官府捕洪秀全甚急，一八五〇年復因鵬運山(桂平屬)燒炭工人(上帝會群眾)反抗官府勒索，遂直接引起金田村的起義。楊秀清、石達開、秦日綱等亦皆起兵會金田。革命的怒潮使反動的清軍無法攻剿，而清軍內部復因衝突起分裂，這給革命以絕好的發展機會。洪秀全率衆由金田陷貴

(註五)見國史第十一冊。

謀，楊秀清領兵萬餘攻鬱林，轉陷北流，興業諸城，殺官吏數十人，聲勢大振。一八五一年二月洪秀全率衆打敗清軍向榮之部，東出大黃江（桂平東北），自稱太平軍。後又折回，復擊敗清軍於平南，乃東出佔永安州（今蒙山縣）。革命的新政權——太平天國就於此時開始建立起來，在中國遂開始有兩個政權的對立。秀全自稱天王，而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日綱、胡以晃等亦都任丞相軍師等職。

清政府見太平軍聲勢擴大，知不可輕侮，乃調集軍隊數萬實行圍剿。太平軍因此時尙不利與清軍作陣地決戰，即於太平元年二月衝出重圍，北趨陽朔，大破清軍，逕趨桂陽，清將烏蘭泰戰死。但洪大全亦於此時被擒送北京，以不屈被磔死，大全從容就義，這是太平天國幹部爲革命犧牲的第一人。太平軍進逼桂林，出興安陷全州，入湖南境，進攻長沙未克，馮雲山陣亡，太平軍損失了一個戰鬥的領袖。於是太平軍在戰略上不能不改攻道州，連陷江華、永明，而以柳州、茶陵爲根據地。蕭朝貴率李開芳、林鳳翔攻長沙，不久秀全亦率全軍會攻長沙，三月不能陷城。清將向榮、賽尚阿自外線圍攻甚急，蕭朝貴中砲死，軍糧幾盡。太平軍乃造浮橋渡江退師，轉陷益陽，得民船千餘艘，攻破岳州。清軍在革命威勢壓迫之下，望風披靡，且多不願戰，於是湖北的重鎮漢陽、武昌亦相繼攻下，這時一方面摧毀了反革命的重要堡壘，一方面擴大了革命在羣衆中的影響，加入戰鬥的羣衆多至五十萬，滿奴奴謂五十萬男婦盡是俘虜，這簡直是將太平軍神話化了。武漢既陷，清廷大震，於是清軍雲集，以太平軍爲攻擊之目的。太平軍未及組織武漢的革命民衆，即乘武昌東下，沿途發出奉天誅妖檄，諭救世人檄文，奉天討胡檄文，以號召羣衆。那時候，農民和平民中高漲的騷動性，使太平軍的宣傳任務得以順利進行，故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太平，不久遂進逼江寧，連營二十四座，水陸號百萬，

日夜攻城。江寧商業資產階級協助清軍抗拒太平軍，但不數日南京終爲太平軍所攻破，時值一八五三年一月。計自金田起義到攻陷南京的差不多只化了三年的工夫。

太平天國於是建首都於南京，制定了種種新的法令和制度。（參看下面第五節）在軍事上則繼續遣兵北伐，分兩路出師：第一路爲林鳳翔、李開芳所統率，先後攻陷鎮江、瓜州、揚州，即留會立昌部據守揚州，林李自己則率北伐軍於三月由臨淮進逼潁州，四月陷鳳陽，入河南取歸德。五月攻開封不下，北渡黃河攻進懷德，爲清軍納爾經額部所敗，喪大將吉文元。林鳳翔部轉戰入山西，陷平陽府，由平陽入直隸，攻陷深州，距京師只有六百里。旣而爲清將勝保擊退，林李乃改襲天津，不到半年工夫，攻陷大小城池二十六個。鳳翔攻天津失敗，退據靜海，更分兵屯駐獨流、楊柳青等處，以爲犄角之勢。時值大雪，兩兵不習寒，耳鼻凍裂，又因軍糧不足，不幸爲清軍僧格林沁部擊敗，鳳翔遭擒殺。當鳳翔敗退連鎮時，命李開芳率馬步隊萬餘攻佔高唐州。及鳳翔死，清軍僧格林沁與勝保兩部遂攻李開芳。開芳退走馮官屯，僧格林沁決黃河水淹其軍，開芳亦終壯烈被害。於是黃河以北的太平軍全被反革命撲滅，這是太平天國受到的第一次大打擊。

林李北伐師出發後，太平天國更分遣胡以晃等西攻皖贛，以爭長江上游。以晃與賴漢英等率師由江蘇入安徽，下桐城，破集賢關，安慶旋亦重入太平軍手。於是以晃分兵江南進逼南昌，圍攻十日不能克，乃由湖口攻陷九江，侵入湖北省境，水陸並進，陷黃州、漢陽，江西除南昌一帶外，南北都爲太平天國的暴動與戰爭所瀰漫。是時太平軍秦日綱部更由安徽的桐城進逼廬州，胡以晃復率軍會攻，與清軍大戰，清軍健將安徽巡撫江忠源戰死，廬州遂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陷落。而湖北的黃州亦有大戰，太平軍大破清軍，鄂督吳文燾死於亂軍之中。次年二月太平軍陷德安，六

月復破武昌。武昌鎗殺江漢要衝，太平軍凡三克之，韋志俊無役不在，軍中遂有「韋國宗三打湖北」之稱，以功加右軍主將。於是太平軍的勢力，又復屹立楚中，湖北諸重要州縣都相繼陷落，這是太平軍最盛的時期。那時太平軍的勁將如翼王石達開、英王陳玉成等，都匯集在贛皖間，江西外江而內湖，湘軍孤懸其間，太平軍乘舟艦乘夜往襲，火燒數十百艘，曾國藩所率水師一敗塗地，國藩無面目見人，欲自殺，羅澤南止之得免。

當太平軍攻佔南京時，清政府賴以和太平軍抗戰的革命武裝勢力，就是江南大營與江北大營。所謂江南大營是由向榮統率的。向榮軍是長於太平軍作戰的，當太平軍出永安州時，向榮由廣西追蹙到武昌，受清廷命爲欽差大臣，等到太平軍攻陷了南京，向榮復率師尾追。但當向榮率軍抵江寧時，而太平天國已定都十日了。向軍乃在東孝陵衛紮營，是爲江南大營。而同時琦善亦受命爲欽差大臣，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直達揚州，當時揚州已爲林鳳翔所陷。琦善遂與內閣學士勝保，提督陳金綬分營揚州城外，是爲江北大營。這樣革命軍就與反革命嚴陣對峙着，太平軍雖兩面受攻，而往來衝突自如。因清軍遇到太平軍，多不願作戰，而清軍的腐敗亦遠不能當新興的太平革命軍的鋒銳。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太平軍爲着要剪除心腹之患，先遣兵攻下揚州（第二次攻克），遂陷江北大營。太平軍李秀成部戰勝了清軍吉爾杭阿部，乃分兵兩路，由李秀成、陳玉成統率，進攻江南大營。同時石達開又率軍與李秀成會攻清軍，江南大營亦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五月陷，其後清軍張國梁部雖恢復瓜州、鎮江，進軍秣陵關，復立江南大營，卒爲太平軍再陷，太平軍遂由丹陽攻下常州、蘇州，松江以至浙江嘉興，各地民衆影響者甚衆，東南的革命聲勢遂愈益浩大起來，而天京無圍師者二年。

但這時偏安享樂的太平觀念也就發展起來，太平天國領袖也日趨墮落腐化了！他們奮鬥的意志已逐漸消沉，而「爲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對於自己所頒行的法令政策也沒有切實執行，開始走向「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在領袖間則「往日倚爲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註六）於是太平天國就發生內訌，爆發楊堂之變。終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洪秀全即深居簡出，軍政事宜均取決於楊秀清，於是秀清大權在手，威壓全朝，引起秀全之猜疑。一八五六年七月，秀全與韋昌輝合謀，殺害秀清及其全家與徒衆。石達開在安慶聞訊潛歸，責昌輝殘殺過甚，昌輝又欲謀殺石達開，事洩，達開乘夜出走，昌輝乃殺達開全家。達開至安慶，召兵靖難，師次寧國，秀全大恐，乃殺昌輝以謝達開。達開至京後，秀全對達開又起猜疑之心，乃用其兄以挾制達開，達開被迫，遂逃出南京，別圖發展。至是太平天國已露崩潰之象，後起的李秀成、陳玉成，雖則忠勇無雙，雄才大略，不斷地戰勝過敵人，企圖挽救太平天國的命运，然而竟歸無效了。

第四節 反革命的崛起與太平天國之衰亡

太平天國的勃興不獨使得反動的滿清政府惶急無措，所有的地主、豪紳、商人資產階級乃至於資本主義列強亦都因此震駭起來。太平天國的革命在土地政策、經濟政策乃至社會政策上給予一切反對的集團勢力以絕大的打擊，並且隨着革命浪潮的發展，更促進了廣大的貧農與城市手工業者、貧民對

（註六）見賊情彙編卷六。

於革命政權的激烈要求，此等要求都逐漸部分的反映到太平天國的政策上來。同時千百萬的革命群眾在各地已自發地起來和他們的壓迫者，剝削者作殊死戰，這使得一切的貴族，官僚，地主，紳士，商人由絕大的恐慌中，要求對革命群眾及其政權，組織一强有力的反攻，於是地主階級為中心的反革命運動就在尖銳的鬭爭中出現了，其中以湘軍淮軍為主。在此以前，新寧的舉人江忠源已經有了一種反太平天國的武裝組織，是由團練——地主富農的武裝——發展而成的，當時號稱『楚勇』。其後江忠源被太平軍擊斃，楚勇因而瓦解，而湘鄉羅澤南、王鑫等繼辦團練，湘撫張亮基另各募一營助戰守，號曰『湘勇』。曾國藩即以這些湘勇為基礎，成立湘軍於長沙。曾國藩不獨組織了陸上的湘勇，而且創立了水師，在衡州、湘潭設立了兩個造船廠，製造砲船，結果造成了大小戰艦二百四十艘，水陸軍共有萬餘人。陸軍由塔齊布、羅澤南率領，水師由楊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統率，統名之曰湘軍。湘軍最初在長江湘境與太平軍作戰，水陸皆不利，但不久即轉敗為勝。先後克復了湘潭、岳州，水陸會師金口。不久又恢復了漢陽、武昌。至一八五八年四月湘軍佔領九江，兩湖與江西遂入湘軍之手。這時太平軍在長江下游雖仍著着勝利，但總的形勢已被迫而為退守的局面了。

反太平天國的反動武裝的主力除湘軍，尚有淮軍，其主要人物為李鴻章。早在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李鴻章即曾與呂賢基奉旨回籍辦團練。後來皖北的太平軍勢力發展，呂賢基戰死於舒城，這團練才一蹶不振。其後太平軍在江浙大為發展，江蘇的紳士來安慶請援師，曾國藩遂又奏遣李鴻章募淮軍赴上海，於是淮軍在外國資本主義援助之下，就成為東南一支反太平天國最有力的軍隊，而與上游的湘軍彼此呼應，夾攻太平軍。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同時也威脅着列強，於是英法美等國在天津條約締結後，便與滿清政

府合作，共同進攻革命了。當太平軍進攻淞滬一帶時，蘇淞道尹吳煦以厚餉募勇數千，以美人董德（*Dora*）統率，名曰『常勝軍』，又名『洋槍隊』。董德死後，美人白齊文（*White*）代之，最後由英人戈登（*Gordon*）統率。一八六二年，李鴻章率淮軍抵上海時，更擴大洋槍隊的組織，而與英法聯軍合起來，共同防守淞滬。自是洋槍隊常參加江浙一帶的戰爭，常破太平軍。如一八六二年上海外國聯軍五千五百人，以大砲四十尊進攻嘉定，就是列強幫助清軍最得力的戰役。後來李鴻章恢復蘇淞，亦完全得力於『常勝軍』。

太平軍自楊韋雜作，達開遠行，國力已凋。而頻年饑兵，清軍胡林翼、李續賓崛起於上游，和春、張國樑再振於蘇省，其勢遂益發。然危而復安者又七八年，則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實支持之。二人皆廣西藤縣人，起小卒封王，縱橫盪決大江南北，清軍畏之如虎。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三月和春、張國樑進逼南京，江南大營勢復振。是年四月，李續賓克九江，八月曾國荃克吉安，太平軍在江西之勢力又墮。時湘軍作戰計劃：陸軍渡江，先皖北而後江南，水師先安徽而後南京。而以圍皖之事，屬之李續賓。自五月至十月，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進取三河，距廬州僅五十里。兩方血戰，殺傷相當。而秀成、玉成等自廬州至，連營數十里，抄湘軍後路，續賓敗死，而太平軍之勢力一振。自江南大營再振後，南京復被圍。秀成乃與李世賢、陳玉成、黃文金、楊輔清、劉官芳等百餘上將會於桐城縣東南之楓陽鎮，商討攻守方略，決定先取杭州，以斷張國樑餉道，使其分兵來攻，再返師出其不意襲之。秀成既破揚州、六合，防堵浦口，遂以咸豐十年二月，出寧國，趨廣德，倍道搗杭州，由清波門穴地道，三日破之，巡撫羅遵殿自縊死。國樑使張玉良統援浙軍至，見城上偏搖秀成旗幟不敢近，駐離城四十里之塘棲鎮。秀成遂全師撤回，檄諸鎮分撲圍城師，國樑不能禦，退守

丹陽，追兵踵至，國荃拒戰，馬蹶死亂流中，和春亦嘔血死。江南圍師三百餘營，悉夷爲平地，連下常州、蘇州，而太平軍之勢力又一振。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時反太平天國的運動在長江上游已大爲活躍，而資本主義列強亦開始援助清軍的反攻。時會國藩總督兩江，自赴祁門督師，而以圍攻安慶之責，委之國荃。一八六〇年十月，陳玉成督十萬衆來援，國荃擊走之。多隆阿又敗之於桐城西南之掛車河，鮑超再敗之於安慶北境之集賢關，玉成驍將劉瑄林被擒，精銳損失殆盡。一八六一年八月，國荃以地雷破安慶，守將葉芸來以下戰死者一萬六千人。玉成全軍焚死，乃退走廬州，又爲多隆阿所敗，因此時太平軍東西兩方軍事的連鎖已被截斷，陳玉成卒壯烈被殺。

這時太平軍在安徽、湖北、江西皆失利，反革命勢力異常猖獗。所謂「會國荃有直搗南京之師，李鴻章有援剿蘇滬之師，彭玉麟楊岳斌有肅清長江下游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圍攻廬州之師，李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超有進攻寧國之師，張運蘭有防剿徽州之師，左宗棠有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而李左曾三路尤爲得力」。（註七）咸豐末年，英人戈登率常勝軍三千（有英法美軍官）馳赴太倉，截斷太平軍的聯絡。太倉陷，常勝軍與程學啓軍合圍崑山，駐蘇州太平軍往援，大敗。而是時南京又爲湘軍所圍，蘇州處於孤立地位。一八六四年四月戈登助李鴻章軍在常州擊破李秀成軍。常州陷，李秀成部向南京退却。在浙江方面，則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六月，左宗棠進軍衢州，時太平軍李世賢在金華，值南京被圍急，秀全飛召世賢回援。世賢請擊退衢州之敵乃往，七月宗棠進軍龍游，會國藩又從廣西增調蔣益澧軍往助，世賢遣兵赴援助退。宗棠築長濠以僵龍游，而令益

（註七）見羅元鯤編中國近百年史卷上八十三頁。

邊攻湯溪，二年正月下之。於是浙浙水而下，攻富陽久不克，乃求法國總兵德克牌率洋槍隊助戰，陷之，遂逼杭州。是時清軍程學啟部調至浙境，佔領嘉興，與攻杭清軍呼應。杭州遂爲清軍攻陷，清軍入城後，卽大肆屠殺。

這時南京的外翼屏障，如武昌、九江、安慶、杭州、蘇、常等皆不守，其勢遂孤。李秀成見蘇浙一失，卽知不能持久，曾勸秀全『親征鄂贛，據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江浙以利餉源』，不聽。南京被圍日久，城中糧絕，軍民皆疲困不能耐，秀全知大勢已去，乃仰藥死。死之前，秀全預言日後必有繼太平天國而爲同胞爭自由者。於是太子福瑱嗣位，秀成輔國。時湘軍已佔領南京城外雨花台，旋佔江東橋的堡壘。一八六四年一月曾國荃陷鍾山，湘軍遂得下瞰南京城。清軍在山下以巨炮轟擊南京城，又在城根掘地道，實火柴而轟之，城崩，清軍潮湧而入，南京陷。秀成挾福瑱出，於是太平天國的政權沒落。秀成未及逃出，亦被清軍所捕殺。受刑前，秀成曾親書供詞數萬言，敘述太平天國起義原委甚詳，歷十日而竣。因內容對清廷及曾李輩大不利，故被曾國藩所刪改。南京居民聞秀成死，追悼者達萬戶，且曾相率罷市，李秀成之得民衆愛戴，於此可見。侍王世賢奉幼主福瑛至廣德，轉奔湖州，倚黃文金軍。後文金戰死，餘軍爲左宗棠擊破。福瑛至徽州，清軍掩至，敗太平軍李榮發部，榮發遭槍殺。福瑛乃輾轉至福建之延平府，殘兵僅二千，卒爲清席寶田軍所獲，被殺於江西。

太平軍的另一支康王汪海洋部自杭州陷後，突圍走安徽，入江西，侵入閩邊。旋又敗入粵之嘉應州，一八六五年爲清廷消滅。太平軍李世賢部，一八六五年敗入福建，據漳州後亦爲清軍撲滅。在北方尙有陳得才、賴汝光兩軍，陳得才舊屬翼王石達開部，太平十一年得才聯合捻黨，入陝西武關。進逼長安，戰不利。後又轉入河南，圍南陽，復敗於清軍，乃解圍入洛陽。復入陝西，明年破興安。爲

與安地主武裝所擊敗，乃攻破漢中府而據之。太平十三年得才率軍救天京，至英霍，聞天京已陷。乃欲取道江西入浙江救幼主，復爲清軍挫敗於麻城。得才欲回軍漢中，途中爲變軍所殺。賴汝光督屬陳玉成部，曾出潼關，在漢中與陳得才軍合。得才既被殺，汝光率軍入汴，尙有兵數十萬，大敗清軍僧格林沁，既而天京被圍急，汝光率軍南下馳救，中途聞天京陷，遂入山東，與捻黨聯合，轉戰於濟、青、汴、海之間。後爲清軍所破，汝光被擒殺。

在西部還有翼王石達開一部，最後亦須敘述其起滅。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內訌時（即楊韋之變）出南京，別樹一幟，由安徽率衆數十萬人入江西，趨吉安，與曾國藩軍鏖戰甚烈。旋率兵入浙，迭陷各城。圍衢州不克，解圍入福建，後又入江西甯贛州。太平八年（一八五九年）達開入湖南，侵黔邊。復向廣西渡紅河而入貴州，所至苗人紛起響應，自是轉戰於湖南、貴州、廣西之間。太平十一年（一八六二年）閏八月達開自綦江大舉入貴州，有衆十餘萬人，清軍尾追之，達開由普安入雲南境。十月復入四川，爲清駱秉章所敗，復入滇。十二年（一八六三年）二月達開遣騎軍入漢中，破興安，以牽制清軍。繼又輾轉自滇入川，中旗（石軍分爲前中右三旗）在寧遠被圍，達開自率前旗援之。爲川軍及土司所圍，途窮食盡，至大渡河，達開卒被擒殺，軍潰。時在太平十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即南京陷落的頭一年。至南京陷落時，太平天國已遭受決定的失敗。至此，十五年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竟被血葬了。

第五節

太平天國革命中的三合會暴動和捻黨叛亂

清代農民的鬪爭與暴動在道咸之間甚爲普遍，各地零星的自發鬪爭漸漸有匯合爲全國的革命高潮

之形勢。太平天國不過是這無數的浪花中的一個巨濤。當太平天國的革命戰爭震盪全國的時候，許多地方已不絕爆發農民與城市貧民反抗官府地主的叛亂，其中比較佔勢力且與太平天國相呼應的鬪爭組織，在東南有三合會，在北方有捻黨。

太平軍佔領南京後，資本主義列強不僅幫助滿清、地主、商人進攻革命，而且利用各種機會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如擴張租界權力，攫奪關稅管理權與司法權等。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三合會的支派乙首黨（清室呼爲紅巾賊）首領劉麗川（粵人）陳阿連（閩人）謀襲上海城。事發，官府捕三合會領袖八人。三合會人大憤，集合萬餘人攻入上海縣署，殺知縣，蘇淞道尹吳健章受英美保護，逃入租界。乙首黨人既佔上海縣城，又連破松江的川沙廳、青浦、南匯及太倉、嘉定、寶山諸縣。上海既陷，清軍迭次圍攻，不能得手，乃請求英美諸國援助，始破乙首黨人於陳家木橋。十二月二十日大陸並進，法軍同時助攻，暴動群眾抗戰甚烈，更分兵謀襲清軍營壘，清法聯軍大敗，死亡甚衆。後來乙首黨人卒因糧盡援絕，在清法聯軍猛烈的炮火壓迫之下，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咸豐五年元旦）退出上海，領袖劉麗川亦被擒殺，這一插話式的英勇的貧民暴動遂告失敗了。乙首黨佔領上海縣城時，外人與滿清政府均極惶恐。各國在滬商人表面宣言居留地中立，實際則使海軍陸戰隊登陸助戰，同時並組織所謂萬國義勇隊，以保護外僑生命財產爲名，實際上是借此擴大列強對於華人的統治權。不但如此，當乙首黨奪取上海時，清室官吏多被殺或逃亡，於是各國領事乘機獲得管理上海的行政權。而且這時管理關稅無人，各國領事乃協議舉英人瓦得（Wade）及其他各國二人，暫司其事。亂平後，中國官府竟使外人繼續管理上海及其他各地稅關，由是開外人管理中國稅關之端。英美法各國領事又乘乙首黨之亂操裁判之權，以後遂沿爲定例，列強且公然設立會審公堂，受理及審判居留地中

國人被告的一切民刑案件，規定除原被告均爲華人的民事外，凡民刑各案件，都須由外國官員陪審。至一八六九年訂立上海洋涇浜會審章程後，即租界內純粹華人案件，不問民刑，亦由各國領事輪流會審了，於是會審公廳漸次變成了上海的最高法院。

捻黨起源於清康熙時，據說最初是農民行儺逐疫，捻紙燃脂爲龍戲，謂之拜捻。以後就聚捻成隊，報仇嚇財，遂呼爲捻子。或謂皖東人呼一聚爲一捻，捻者卽組織黨徒之謂。這很顯然的是當時農民被地主、官府殘酷的剝削，逼迫爲亂，所謂捻隊只是借迷信的習慣所結成的一種團聚群衆的組織。起初這種組織僅以掠奪富豪，對剝削壓迫者施行一種報復爲目的，以後漸具有政治的意識。自嘉慶至道光，加入捻黨的群衆日益增加，山東的兗、沂、曹，河南的南、汝、汝、光、歸，江蘇的徐淮，直隸的大名，安徽的廬、鳳、穎壽等地，皆爲捻黨活動的區域，於是引起統治階級的注意。嘉慶中，河南巡撫始奏定豫捻結夥三人以上，比照回民例加等科罪。而山東亦規定結捻結幅（幅亦是與捻同類的秘密結社）之案，依照人數多寡，定罪名輕重。後來安徽亦仿行此法，凡帶有武裝的會衆，皆斬首，僅結捻劫掠者，或絞或流，清廷更下令各地嚴拿。可是殘酷的壓迫反是助燃群衆反抗的怒火，捻黨的活動更因此日益蔓延，各地拒捕抵抗官府的暴動層出不窮，於是捻黨叛亂遂在北方如火燎原了。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已在廣西起事，豫皖捻黨就乘機活動，南陽、壽州都有捻黨的踪跡。咸豐三年太平天國攻陷安慶，奪取南京，並由林鳳翔、李開芳、吉文元等率軍北伐，捻黨益形活動，到處發動武裝暴動響應太平軍。其重要領袖有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魏瞎子等，而張樂刑實爲群衆中的黨魁。是時清政府慮捻黨與太平軍合流，命周天爵駐徐益塔剿，不久又以給事中袁甲三代之，駐潁毫，前總督牛鑾駐陳州，更以河南巡撫莫桂爲軍事上的總指揮者，負責攻剿。當

時李兆受一支在霍邱起事，掠商、固光州，與安徽的捻黨響應。咸豐四年，莫桂遺兵捕兆受不得，兆受率數千人圍攻商城。安徽巡撫福濟久攻廬州不克，命團練樂圩寨防守，但不久兆受即聯絡太平軍攻陷六安、霍邱，圍壽州，陷正陽，自光固、息商至南南三千里，都在捻黨勢力之下。

咸豐七年冬，捻黨游擊騎隊已抵開州，東明入直隸境。咸豐八年捻黨圍攻臨淮，勝保往援，李兆受投降。但捻黨攻入山東境，游擊河南，陷周家口，聲勢益趨浩大。次年竟大破清軍於舞陽、鳳陽，臨淮時得時失。咸豐十年捻黨更攻入清江，河南捻黨則趨鞏固洛陽，陝西、山西爲之震動。是年秋僧格林沁移師山東討捻，連失利。捻黨又由曹州趨鄆城，攻泰安，圍青州，而河南省二十餘縣爲捻所佔，有一支捻軍且侵入畿輔。九月叛變的團練長苗沛霖（原爲勝保招降，至此復叛）攻陷壽州，執巡撫翁同龢，受太平天國封爲平北王。同治元年二月苗沛霖與太平軍、捻黨會攻潁州，爲湘軍擊退，不久廬州亦爲清軍恢復，於是皖北的捻黨勢稍挫。而河南捻黨已入商州，與太平軍聯絡，連陷鎮安、孝義，並入陝西之渭南、華州，後爲勝保，多隆阿擊走，退走河南，由宛郡趨襄陽，連陷隨州、應山、東山。同時山東宋景詩（原投降清軍）復叛，與張錫珠合，於是直東一帶的捻亂又熾。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攻克捻黨的大本營雒河集，擒殺捻黨領袖張樂刑、姜台凌等。樂刑之子張總愚領殘部與陳大澂合。是時捻黨的活動以豫鄂爲最烈，張總愚率軍犯南陽、襄陽，同治三年河南捻黨進攻隨山、應山，僧格林沁抵禦甚力，但大將舒保爲捻軍伏兵所殺。

這時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爲清軍攻陷，侵入陝境的太平軍（如陳得才、賴汝光等部）回軍南援，至漢中，乃與捻黨合。捻黨與太平軍的聯軍在鄂豫間遂分兩支進攻，一支是陳得才，自麻城攻羅田，一支是賴汝光與張總愚的一部攻黃安，同時河南的捻黨任柱、牛老洪、李允等復與總愚部聯合

。同治四年捻黨侵至黃河邊，轉入山東境，當時如曹州、定陶、荷澤、鄆城、鉅野等地皆爲捻黨暴動所瀕漫，直隸邊境亦有捻黨踪跡，以前被鎮壓下去的農民暴動至此又死灰復燃了。捻軍佔領了曲阜，又東南走滕嶧，逼近了贛榆、青口，頗有大軍南下之勢。清廷乃詔曾國藩、李鴻章備淮揚防務，捻軍又退走山東，黃河以北均爲捻黨出沒之地。捻軍採取游擊戰術，不與官軍正式接戰，僧格林沁軍追捻於曹州，捻伴敗渡河，結亂兵數十萬以待，僧軍追至，伏軍齊出，將僧軍重重包圍，僧格林沁突圍而出，在森林中爲捻黨所殺。是時捻黨游擊於豫魯鄂皖蘇之間，總愚有衆三四萬，任柱、陳大濬、賴汝光、牛老洪亦有馬步兵六七萬，後來任賴等軍與總愚會合，不久又分爲二支，賴汝光走魯山，張總愚走唐縣。未幾賴汝光進犯信陽，湖北又爆發巨大的兵變，響應捻軍，黃岡、黃安、黃陂、孝感諸地都變成捻黨の游擊區。

同治五年捻黨在河南大敗清軍，與清軍轉戰於山東間，運河、黃河防守皆報警。於是曾國藩奏請以李鴻章駐徐州，兼指揮山東剿捻事，以曾國荃駐南陽，兼顧河南，國藩則自駐周家口扼其中，兼顧皖豫，又請飭直隸、山東砲船巡黃河，屏蔽畿輔。是年九月，捻黨分爲東西二支，西捻入陝西，以張總愚爲首；東捻出入於河南、湖北、山東、江蘇，以任柱、賴汝光爲首。而東捻又分爲二部：一部由任柱統率，向北進；一部由賴汝光統率，向東南走，及爲劉銘傳所敗，復合軍走沛縣，走曹縣，復走信陽，陷靈夢、應城，攻德安。同治六年東捻屯戶隴河，敗清軍劉銘傳，後鮑超往援，始將捻軍擊敗，捻復走河南，其另一支隊則犯麻城，游擊於蕪水、廣濟、黃梅之間，游騎達宿松，在鄂東大敗湘軍。入山東支隊則游擊濟寧、泰安間，復走淄川、長山、章邱，將由齊河渡黃河北上，阻於水，乃折而東南，走濰縣。任柱股被劉銘傳所追，奔贛榆爲其部下所殺，捻黨又損失一重要領袖，及賴汝光死，東

捻遂被消滅。西捻入陝西後，大敗陝軍，西安戒嚴，曾國溝檄劉松山往援，捻繼續北進，犯西安，在霸橋以馬隊大破清軍，清軍三十營皆潰，西捻遂圍省城，清廷乃詔以左宗棠督軍討西捻。同治五年三月劉松山大破西捻於西安，張總愚遂與暴動的回民合，勢甚熾。後由壺口入山西。七年捻軍侵入直隸，復由直南入豫北，轉趨山東，沿運河而抵天津，保定。後在沙河爲清軍所敗，捻軍遂被圍於徒駭河，黃河、運河之間，糧食又盡，軍疲不能戰，張總愚爲清兵窮追，投水死。其子張葵兒爲清軍擒殺，從子張正江走南鎮，亦被追獲。清軍俘老捻四千餘人，餘捻爲善慶、溫德克勒西所平。

捻黨叛亂維持了十六年，蔓延十省之多，乃是當時中國農民戰爭一大支流。它與太平天國不同的地方，就是太平天國的參加分子，除了極廣大的貧農與城市貧民而外，還有許多破產的手工業工人和知識分子，而捻黨則是以貧農及流氓無產階級爲主幹的；太平天國會較固定的政權之建立，並且佔領了許多重要的工商業城市，而捻黨在作戰上多採取游擊戰略，飄忽不定，不能有較長久的政權，以指導暴動及執行新的革命綱領，且未長久佔領過重要城市；太平天國會發動了廣大的土地革命，摧毀了一部分封建勢力所依附的剝削基礎，而捻黨叛亂在這一方面所進行的鬭爭是比較不深入的。正因爲有這些弱點，以及其他的原因，尤其是太平天國沒落後，捻黨陷於孤立地位，反革命階級則反可結集（湘淮合軍）及抽調重要的武力進攻捻黨，於是在一般的革命浪潮低落之下，捻黨也就不能支持了。

第六節 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

太平天國是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戰爭。雖然領導人物爲知識分子（如洪秀全、馮雲山、秦日

網等），且有富農分子（如石達開、胡以冕等）與商人（如韋昌輝等）的參加領導，然而參加這一革命運動的基本群眾却爲農民。李秀成供狀曾說：『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告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從，或十家八家肯從。也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窮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後來太平軍進入長江流域等地，參加太平軍的廣大群眾，還是因天災人禍而凍餓流離的農民。有一個記載當時安徽的情形說：『皖省賊匪（反動勢力稱太平軍爲賊匪）因年荒糧盡，裹脅飢民數十萬，由黃梅……等處間道上竄。』（註八）太平天國之所以能够支持十五年，也就是廣大農民不斷的參加鬪爭。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主要的也就是農民要求的反映。

太平天國是反對滿族壓迫，爭取漢族獨立解放的民族性的農民戰爭，這在奉天討胡檄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慨自滿洲肆虐，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洲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燬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民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爲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均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狐騷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污舌，是令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令中國之男兒而尊

（註八）見賊情彙編卷六。

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偽造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殍流離，暴密如莽，是欲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復興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餘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受制於十萬之衆，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從這一檄文中以及太平軍的行動中，都說明了由於當時外國勢力的侵入，更促成了中國人民對於反抗滿族壓迫的覺醒，而新的更大的民族危機的到來，像上面已提到的，也使中國人民覺醒到需要首先推翻滿清的壓迫，以謀民族的自救。這樣，就使這一農民戰爭塗上了濃厚的民族色彩，正由於太平天國帶上了濃厚的民族色彩，就使這種運動更爲廣泛。

太平天國運動既是一個反封建勢力的革命鬥爭，在這個新的政權確立以後，自然要興起許多適應廣大的被壓迫群眾的要求之制度與政策。太平天國的鬥爭愈是擴大，群眾的要求反映到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上的也就愈豐富。成爲此等要求的中心問題的，就是土地問題。我們知道一切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都以解決土地問題剷除封建勢力爲首要的目標。因爲封建的生產關係主要的就是依存於土地的佔有關係上，不推翻地主對於土地的獨佔，是根本說不上民主革命的。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中國的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同時已指出許多農民由於喪失土地，而日趨於貧困化，這正是釀成太平天國

運動主要的原因。太平天國雖然以打倒滿清政府恢復漢族人的自由和獨立爲主要口號，但成爲革命運動骨幹的貧農群眾主要地是要解決土地問題；而事實上，不廢除封建的土地關係，是無法推翻建築在此種土地佔有關係上的滿清政權的。自太平天國成立以後，爲貧農手工業者所組織成的太平軍便極力地破壞舊的土地關係——如焚燬地契借據等。這種土地革命運動，特別在太平軍佔領武漢和南京以後更是擴大着。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即頒布了一種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廢除舊的土地私有關係，而以新的土地制度來代替。這種新制度的要點如下：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處。務使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天朝田畝制度又將土地分爲九等，即由上上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穀一千二百斤者），上中田（出一千一百斤者），上下田（出一千斤者）；中上田（出九百斤者），中中田（出八百斤者），中下田（出七百斤者），……一直到下下田（出四百斤者）。上上田當上中田一畝一分，當上下田一畝二分，當中上田一畝三分五，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當下上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當下下田三畝。這種依據土地的質量來劃分土地的數量之辦法，主要地是用於分配土地之上的。太平天國是按勞動人口的多寡來分配土地的：十六歲以上的國民都有受全份土地的資格，十五歲以下則減半分。例如十六歲以上分給上上田一畝，十五歲以下就只能分得上上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上分給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就只能分得下下田一畝五分。這種分配土地的制度正是土地革命的具體政綱。太平天國不僅主張沒收地主的地產，並且對於豪紳地主所佔有的寺廟田產亦規定爲國家所

有。

這種廢除土地私有制度的政策是與當時太平天國的宗教的農業公社理想相聯繫的，例如在天朝田畝制度中又這樣規定着：『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藝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這雖然是一種農村集產生活的幻想，然而這種幻想正是當時農民群衆痛恨貧富不均的反映。

太平天國假託宗教而起義，所以在它定都南京後，教堂的建立與宗教宣傳的擴大，成爲與軍事發展同樣重要的任務。例如發行新遺詔聖書（即新約中的福音）、三字經（以宗教詞句編成的）、幼學詩以擴大宣傳。太平軍所到之處：『每二十五家，須設一教堂，各家兒童每日須到教堂讀聖書，禮拜日則人民均須祈禱。』又『太平軍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習兵衆或百姓，於何日何時何處聽講道理。』這不外是要使宗教與農民生活發生聯繫，以擴大太平天國革命在民間的影響，鞏固人民對於新的政權之信仰，並訓練兵士和民衆，以統一其革命步調。

在軍事組織上，太平軍是以軍爲作戰單位的，每一軍領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以軍帥統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帥，各分領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分領五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每兩司馬領伍長一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戰鬥員是由民間派出的，行徵兵制，凡三四口以上的家庭各出一人爲兵。所以軍隊的組織就是由『家』集成的，即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如設軍以後，人家添多，則每添多五家，即另設一卒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以上類推。太平天國的全部軍事組織系統，可以說是相當建立在軍民合一之原則上的。

太平天國的外交政策，在開始時，在某種程度上，會和外國保持了友好的關係，准許外人自由通商。太平天國會通告各國：『彼此通商，理所應然。將來事定，只有洋煙（鴉片）再勿來吾中國，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又『方秀全之定都南京也，英美各國，以太平規制，頗能尊重自由平等，深表贊同。皆願遣使通好，儼然以新中國目之。秀全亦遣其弟于王洪仁玕使美優答。法蘭西初雖以太平軍採用基督新教，與彼國所信仰者不同，及至南京，見太平天國之秩序與訓練爲之一驚，亦願保守局外中立。此可見太平建國之初，足以得外人之同情也。』（註九）加以列強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與滿清政府發生衝突，這樣就使外國最初對太平天國採取中立態度。一直到天津條約締結後，列強爲着保持，實現與擴大其從滿清政府手中取得的各種利益與特權，而且鑒於太平天國勢力的勝利發展，結果會破壞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的特權，於是他們便與滿清政府聯成一氣，來向太平天國進攻了。

在一般社會政策上，則太平天國主張：『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以爲口食。』後者類於現在的所謂計口授糧的辦法，前者則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雛形。在財政政策上則太平天國所實施的辦法，係一面依舊徵收錢糧，一面則實行徵募與打土豪，但對『民間則絲毫無擾。』據說：『太平軍由長沙陷武漢，軍衆糧缺，間亦劫掠，美其名曰收入。然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每以搜取得之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註十）此外，太平天國確立了男女平等，禁止買賣婚姻，禁止蓄婢納妾

（註九）見羅元鯤編中國近百年史卷上八十九頁。

（註十）見太平天國野史。

，禁止鴉片，廢除奴隸制度，廢除黑暗的刑法制度，禁絕鴉片等，都是進步意識的表現。

太平天國的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說明太平天國不簡單是和過去一樣的農民戰爭，而正是近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序幕的農民戰爭。在太平天國的政策中帶有不少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特別是平分土地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太平天國人物主觀上是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但客觀上却正是要求民族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這一思想裡面包含着沒收地主土地，肅清封建勢力的內容，因而有可能在客觀上替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掃清道路。太平天國的這些進步的政策與制度，特別是土地政策，因為當時戰爭環境的影響，以及缺乏執行土地政策的堅強決心，使土地政策一般說來還沒有實行，以致各地還是『照依舊規，投誠捐糧。』（註十一）但它與過去的原始的農民戰爭有許多不同之處。這種不同，不僅僅是在地域上普及到中國各主要區域，不僅因為運動本身吸收了最廣大的群眾來參加；而還在於它有比較明確的主張，它有較嚴密的組織和各種較進步的政策，也就是說它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特點。這種不同，是由於太平天國所處時代的不同所致。

第七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其歷史意義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支持了十五年之久（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蔓延了十七省，而結果是失敗了，其原因可分客觀的與主觀的兩方面來說：

客觀的原因，主要的是在革命擴大和深入之後，商業資產階級起來幫助地主貴族，一致起來反攻

（註十一）見青岩遇寇錄。

革命，形成一條巨大的地主、商人、富農、紳士、官僚、貴族和滿清政府及資本主義列强的反革命戰線。太平軍初起時，對於滿清軍隊作戰，簡直有如摧枯拉朽，橫掃長江，攻取南京，滿清軍隊幾無招架之力。後因得到地主、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與資本主義列强的援助，才逐漸增加了反革命戰線的力量，組織戰略的反攻以擊敗太平軍。如以江忠源爲首領的楚軍，以曾國藩爲首領的湘軍，以李鴻章爲首領的淮軍，就是撲滅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武力。至於列强的援助，則正如矢野仁一氏在近世支那史中所說：「江蘇的恢復，英美人很有功；同樣，英法人於浙江的恢復也很有功。」（註十

二）

在主觀方面，則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中心的堅強的領導階級，這是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所致。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在轉化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同時也在孕育着資本主義的種子，但當時還沒有新興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組織與形成一個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政黨來領導太平天國。而農民則基本上還是落後的，保守的，散漫的，無組織的。農民戰爭要取得勝利，要在資產階級（如在過去的法國）或無產階級（如在俄國）領導下才有可能。農民要取得徹底解放，則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達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就使太平天國沒有那樣一個革命階級和政黨領導而走到失敗。從這一失敗的基本原因出發，也就使太平天國產生出其他許多的錯誤。第二，因爲沒有那樣一個革命階級和政黨的領導，所以太平天國就沒有能够去團結匯合統一當時所有的農民運動。當時中國各地的農民鬪爭到處風起雲湧，特別是北方捻子的鬪爭和南方三合會運動的發展，太平天國都不能

（註十二）轉引自佐野袈婆美中國歷史教程。

進一步地去結合這些運動，以增強革命的力量，以摧毀反動統治，反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甚至三合會在上海暴動佔領縣城時，其領袖劉麗川曾派代表至南京要求與太平天國合作，亦被拒絕，這更是太平天國一個絕大的失策。第三，在戰略上的錯誤是沒有集中主力去摧毀敵人的最後堡壘——北京，沒有乘敵人慘敗之際，迅速殲滅敵人（當時僅僅派出一部分兵力去北伐，結果遭受失敗，反而保守南京，使敵人能够從容整理與組織反革命力量對革命施行反攻。同時又犯了分散兵力、疲勞兵力的錯誤，使自己常處於被動的地位。特別是後半期的戰爭，太平軍多半採取被動的防禦戰，造成東援西救南奔北走的戰局，常處於不利條件之下。應該退却時，又不曾組織適當的退却。例如最後南京被困，警處籠中，以待食絕』時，洪秀全仍不肯採納李秀成『親征鞏轅，握上游以號令天下』的建議，結果死守南京，爲敵人撲滅。第四，沒有能够更明確地去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深入群眾的鬪爭，特別是土地鬪爭；沒有認真建立強固而有力的政權，創立許多更鞏固的革命根據地，而形成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結果雖然佔領了許多通都大邑，却不能鞏固起來，造成隨得隨失的現象，形成流動式的活動。第五，太平天國領導者內部不團結，互相猜疑，互相殘殺。沒有能够以領導者內部的團結形成整個革命運動領導的核心。在定都南京後，便日益脫離群眾，逐漸失去原來的面目，不能繼續爲群眾利益奮鬥的共同目標下，緊密團結起來；反而爲隱色貨利所迷，走向墮落腐化，一直發展到自相殘殺。而石達開的率師西行（大部是太平軍的精銳），更影響到太平軍的失敗。

總之，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正如這一革命的發生一樣，絕對不是偶然的。當時下層民衆的痛苦，統治階級的腐敗，群眾鬪爭情緒的高漲，正是利於革命發展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上述的客觀環境的困難與革命領導幹部之主觀的弱點和錯誤，就使革命浪潮漸次由高漲而趨於低落，最後以至於

失敗。然而太平天國革命雖不幸失敗，但它在中國革命史上還是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它的意義對於我們今天依然是存在的，絕不能因為太平天國的失敗而過分斥責它，並廢滅其光榮的意義。當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太平天國革命曾經表示了很大的關切，並說過一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話：『我們要提起一件事情，即剛巧全世界似乎都處在沉靜狀態的時候，中國和桌子却開始跳舞起來鼓勵大家了。』在中國及歐洲的革命這一篇有名的文章裡面，馬克思又說：『在中國，起義連綿不斷，已有十年之久，而且現在已匯合成爲一種强有力的革命，不管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不管這些起義帶有何種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式，而起義爆發底本身，毫無疑義地是由英國的大炮引起的。』在另一個地方，馬克思對於這一點說得更具體，他認爲：『太平天國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顯然是：歐洲人的干涉，鴉片戰爭，因鴉片戰爭所引起的現時國家制度之震動，銀子外溢，因外貨輸入而引起的經濟平衡性之破壞以及其他等等。結果，鴉片不會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這是很矛盾的。』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國際概況中又說道：『就讓中國的社會主義（指太平天國當時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與歐洲的社會主義相差，像中國的哲學與黑格爾的哲學之相差一樣罷，可是有一件事情終究是值得我們高興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國資本家紡織品的影響，八年來已處於社會革新的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於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果。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到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這個最保守的堡壘底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裡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呢！』（註十三）

（註十三）見馬恩論中國二百零六至零七頁。

事實上，太平天國就正是創造這中華共和國的先聲，他們已開始在寫着：『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了，但太平天國先烈所流的血，却在開始渲染着中國歷史的新篇幅。

第四章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

·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列強侵略中國的新姿態

太平天國——這個偉大的農民民族革命軍的失敗，列強利用中國的弱點，侵略中國就更變本加厲起來了。當時滿清政府也進一步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前面表示讓步，屈服與投降，特別在列強幫助滿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中，使滿清統治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形成更密切的關係，各國就利用滿清政府來實施進一步向中國的掠奪。同時由於當時中國國家內在的脆弱和矛盾，也使滿清政府無法團結內部鞏固國力。前章已經說過，滿清統治階級所實行的民族政策，是以壓迫奴役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為特徵的。太平天國與捻黨的起義不但燃起了漢族被壓迫民衆反抗滿清的怒火，住居在中國境內的回民亦受到了這種反清鬥爭的影響，他們時常在準備着和清政府作流血的鬪爭。而且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與捻黨的革命與叛亂的時候，受着屠戮之慘的，不光是有無數的漢民，即與漢民雜居的回民亦不能倖免。加以漢滿的地主、豪紳、貴族時常和官府相勾結，對回民壓迫敲榨，無所不用其極。那時的回民和現今的漂泊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猶太人一樣，受到的歧視與欺凌簡直是難以形容的，於是便又激起了回民暴動的爆發。這種回民暴動在當時曾經蔓延到很大的範圍，而且如像雲南的回民暴動還會吸收了苗民（亦是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來參加，武裝鬪爭的劇烈則竟至迫近雲南省城，陝、甘、新疆的回民暴動亦會與清廷相持十餘年之久。這些回民暴動因為不能與漢族貧民農民取得密切的聯繫，加以暴

動的領袖多不健全，容易與敵人妥協或動搖，因此終於被滿清政府所撲滅，然而滿清政權內在的脆弱和矛盾，却亦因此充分暴露，這也就更容易招致外患的侵入。

這時候資本主義列強已逐漸向獨佔階段發展，它們相互間的衝突也比以前劇烈起來，侵略也就更為強暴，它們都不以爭得市場為滿足，而想進一步來獨佔所得的市場。所以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對於中國侵略的新姿態，首先就是割據中國的邊疆，使中國的藩籬全部喪失，使中國原有的藩屬淪為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首先是日本吞併琉球，琉球原是中國的藩屬，中英鴉片戰爭後，歐美各國在東方的貿易日益發達，琉球亦開始與歐美各國通商，並先後與美法荷締結通商條約。及至明治維新後，日本既迅速發展着資本主義，遂伸其犄角於鄰邦，而琉球即首當其衝。適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有琉球船載六十餘人，遇颶風，漂至台灣，為台灣生番殺斃數十人，僅剩十二人，由台灣地方官護送歸國，日本知機會已到，遂一面封琉球王為藩王，照會各國公使，申明琉球已歸日本，將琉球與美法荷所訂商約，改為日本與各國的商約，一面決定向台灣發兵，征討生番，藉名為琉球人雪仇，實乘機侵略台灣。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二月日本使副島種臣至天津與直督交換前年中日修好通商條約，四月種臣至北京，向總理衙門提出台番殺害琉民事件，質問台灣是否隸中國版圖？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答以琉球係清國屬邦，琉民被害，毋煩日本。台番為化外之民，其劫殺行為與中國政府無干。種臣遂向本國政府報告台灣生番不隸中國統治。日本政府乃於一八七四年發兵征台灣，台番諸社次第為日本暴力壓服，先後降日。日軍即在台灣之龜山建築營寨，為永久佔領之計。當日本與兵征台時，清政府詰責日本『生番係中國版圖之地，何故不照會即遣兵』，並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由閩省發兵一萬人往援台番，向日本要求撤兵。日本不應，兩國國交日益危急，既而以英使威妥瑪居間調停，締結中

日條約：（一）日本征台爲保民義舉，中國不認爲不是；（二）由中國給琉球難民卹金十萬兩，賠償日本建築費四十萬兩；（三）約束台灣生番此後不得加害航民。自此約締後，日本遂從中國攫奪了琉球，在琉球經營不遺餘力，並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廢琉球王，設沖繩縣。

當中日爲了台灣事件發生嚴重交涉時，中英亦因雲南事件而有烟台之約。自中英條約締結後，英國對中國的貿易逐年增加。但英國在沿海一帶的各埠商業，尙不能滿足其侵略中國的慾望，更欲從緬甸伸其勢力於中國內地，開闢陸上的通商路。乃遣測量隊至雲南測地，至雲南騰越，書記官瑪加里及隨從數人爲當地土人所殺。英人以爲雲貴總督岑毓英所主使，事報於北京，英公使威妥瑪向總理衙門要求大賠償及速行處分。清政府飭湖廣總督李瀚章赴雲南調查，英公使亦派隨員三人同行。是年末，查明瑪加里之死狀，捕土人兇犯十餘人處死刑，並處官吏數名革職留任。而英公使竟不滿足，強請清政府嚴懲不加保護的地方官，並賠償英人損失。清政府不理，英使遂往烟台，命艦隊進逼直隸灣，施行恫嚇。昏庸無能的清政府深恐引起第三次中英戰爭，遂派李鴻章爲全權委員，與英使在烟台會議，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締結中英條約，是爲烟台條約（又名芝罘條約）。其要點如下：（一）中政府賠償卹款及用費銀二十萬兩；（二）派大使往英國謝罪；（三）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爲通商口岸，並許設立英國領事駐紮處，在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起卸貨物；（四）雲南邊境通商事宜，由英國特派員與雲南巡撫會同商訂之；（五）因兩國法律不同，各口岸審判事件，祇依被告人爲何國人，即由何國官吏審判。此外又有專款一條，規定英擬派員由中國京師啓行，循歷甘肅、青海一帶，或由四川等處入西藏抵印度，探訪路程，中國應發護照，並知會沿途地方官吏保護，這就成爲日後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張本。

帝俄由西比利亞略取滿洲的情形，在第二章中已有所敘述。現在它看到英日勢力的擴張，也積極由中央亞細亞侵入新疆。適當時回亂在新疆擴大，俄國遂於一八七一年以維持邊境治安爲名，發軍佔領伊犁，並乘勢欲奪烏魯木齊，爲清軍在綏來擊退。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平定回亂，清政府遂於光緒四年派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赴俄交涉歸還伊犁。崇厚昏庸，毫無外交知識，以爲只要收回伊犁就得了，不顧其他，竟與俄締約十八條，主要的有：（一）俄歸伊犁，由中國償銀五百萬盧布；（二）伊犁既歸還中國，應將可西河以西，及壘山以南之地，以至底克斯河盡讓於俄；（三）除喀什噶爾及庫倫兩地已照前約由俄設立領事外，俄國得再於嘉峪關、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庫車各地設立領事；（四）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俄商貨物往來，概行免稅；（五）凡俄商販運貨物至張家口、嘉峪關、天津、漢口等處者，可通過同州、西安、漢中各路；其將中國貨物運往俄國，亦經此路。這樣，中國雖可收回伊犁，但是伊犁附近各要地却反因此送給帝俄了，這是何等可笑的外交。難怪當時朝野大加反對，一時如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洗馬張之洞等都先後交章論劾，尤以之洞反對最烈，甚至主處崇厚死刑。當時分主戰與主和兩派，如張之洞等即主戰者，郭嵩燾即主和者。清廷詔權崇厚職，並定斬罪。俄國聞訊大怒，各國亦不以爲然。清廷不得已，將崇厚免死，仍行監禁，俄國派艦隊向黃海進發，清廷命直隸總督嚴守天津海防，中俄戰爭在此時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後改派會紀澤爲使俄欽差大臣，經過幾番交涉，始於一八八一年與俄改訂新伊犁條約：（一）中國賠償俄國代守伊犁之軍政費九百萬盧布；（二）中俄二國之境界，從別珍島山，沿霍爾果斯河過伊犁河，南至烏宗島山；（三）同治三年塔城界約規定齋桑湖之國境，尙有不妥，應自奎洞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劃一直線爲中俄國界；（四）俄國除照舊約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

外，並得在嘉陵關、吐魯番兩城設立領事；（五）兩國人民，在中國貿易等事，苟生事端，由領事官及地方官會同審辦。這新伊犁條約比前此崇厚所訂，雖較勝一籌，但中國亦已吃虧不少。同時在伊犁問題上還反映了英俄兩國的衝突，當會紀澤澤抵俄時，俄外務大臣吉爾斯會說：『英國在張家口通商，不但貴國（中國）商民受累，即我（俄國）恰克圖商情亦日見消滅，實因英美南南洋茶貨，由西海侵入，以至我兩國陸商受累。必使陸路之暢行，方敵南洋水路之勢，願兩國彼此明定互惠章程，庶我兩國商業不致爲水路所奪。』又說：『回疆之亂，喀什噶爾庫伯克自立爲國，常要求我國（俄）承認，我國仍視爲中國之叛亂者，而英國則由北印度相通，認爲獨立國，欲將中國茶貨由此路行於西域，實與我國情形有礙。』所以伊犁條約之締結不但使俄國對中國獲得勝利，而且使俄國得到和英國競爭的武器，以後英俄在遠東的矛盾和鬭爭，就是由此加深和擴大的。

第二節 法國掠奪安南與中法戰爭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列強對於中國的這種新侵略，除上節所述以外，還有法國對安南的掠奪，所不同的，就是這一掠奪竟然引起了中國的武裝抵抗。

安南是中國古史上的交趾，由秦到唐，都爲中國藩國。法國之侵略安南，遠在十八世紀末，法人假傳教爲名，陰構成安南內亂，嘗助舊阮以滅新阮。及舊阮握政，法人見不能鑿所愁，乃以武力征安南，先後結西貢條約與順化條約，安南遂儼然成爲法之保護國。西貢條約既結，法國政府命駐華法公使以條約全文通告總理衙門，雖經清政提出抗議數次，而法國竟不顧，着着實行西貢條約並於一八八〇年在安南之河內、海防、順化、廣南設立守兵，且派遣測量隊分赴各地測量。安南政府至是恐懼，覺

督西貢條約不利於安南，有排法親華傾向。一面遣使至北京，仍請爲中國保護國，一面暗助黑旗黨人進行驅逐法人。一八八三年黑旗黨人與法軍宣戰，法軍統領黎威爾戰死。消息傳達巴黎後，法議會遂通過對越宣戰案，命西貢司令官波耶急赴東京，指揮陸軍。五月法國大軍抵河內，中國政府主戰主和之說不一，結果僅僅派少數兵援助黑旗兵，不敢公然對法宣戰。其後清政府得雲貴總督岑毓英報告，知東京法兵不多，乃命李鴻章督辦越南事務，兼節制兩廣雲貴四省軍務，有對法備戰意。然不久主和之說又忽佔優勢，於是法國便完全掠奪了安南的主權。清政府聞訊大憤，命會紀澤與法外相交涉，竟不得要領。然清政府除任命了一批將官而外，並不敢正式宣戰。而法國却從容布置一切，準備宰割安南。到後來法軍再度進攻，始有巡撫徐延旭總督岑毓英之參戰。

一八八三年安南發生政變，排法黨廢王，而另立阮福吳爲王，是爲建福王。建福王不承認順化條約，下令逐法人。法政府接報，遂要求議會增軍費援助安南法軍。法軍續與安南黑旗兵及清軍戰，先後陷山西、北寧、太原與興化鎮，於是紅江下游一帶都爲法軍所佔。是時李鴻章力主和議，清廷以爲所謀甚穩，令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法使在天津締結預定媾和草約五款，主要的爲：（一）法國不侵犯中國之邊境；（二）中國承認法安前後互締一切條約，中國在北安南之駐軍撤歸本國；（三）中國許南境一帶通商。這無異是承認了法國在安南所行的掠奪與侵佔之合法，安南已全爲法國所有了。這當然要引起主戰派的反對，於是交章論劾李鴻章者數十起，但條約是已經簽訂了，現在所爭者爲中國軍隊撤退的時間問題，李鴻章謂以三個月爲期，而法國則堅持三星期撤軍之說。安南法軍欲實行三星期撤軍之約，先佔宣光府，次即進軍諒山，駐諒山的中國軍隊尚未接得撤軍命令，不肯退，遂與法軍衝突，中法戰爭就以此爲導火線爆發了。

法政府得諒山衝突消息，憤中國之不能履約，要求清政府賠償軍費一千萬鎊。命駐華法使與中國全權委員會國奎在上海迭開談判，不得要領。於是法政府訓令駐華公使巴特納佔領中國一要地以威脅之。法艦遂於一八八四年六月定砲擊福州佔領台灣之計略，七月法軍率艦三艘至台灣，砲擊基隆港，清軍迎擊之。法軍大敗，因開艦返上海。法公使接基隆事件之報，即向總理衙門發出哀的美敦書，要求賠償金三百二十萬鎊，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否則即認爲國交破裂，同時並宣言拒絕列國調停。清政府呢，却只發出一希望列國秉公調停的乞憐宣言，亦不積極備戰。而法政府未接到中國的答覆，即電命駐華公使下旗回國，又通知中國駐法公使退去巴黎。六月法軍率艦艇十餘艘停泊閩江口，準備進攻福州。中國數萬兵士在它這種橫蠻示威下，無不切齒憤恨，欲拚死一戰。而清政府可恥的不抵抗主義依然持之如故，閩浙總督何璟向各艦隊各砲台發令：『祇准防禦，不准進擊。』李鴻章致欽差大臣張佩綸總督何璟的電報，亦復如是。在清廷之意，以爲這樣可以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然而帝國主義却不和你客氣，一見要挾不遂，即分海陸兩路來犯。海軍由孤拔率領，於一八八四年六月進攻台北，劉銘傳擊却之。七月蘭入馬江，擊沉楊武等軍艦七艘，燬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砲台。參將高騰雲，管駕陳英，學生王連，守備許壽山等皆戰死，船政大臣何璋，會辦海疆欽差大臣張佩綸等則畏死潛逃。佩綸素以敢諫聞，尤好言兵事，至是身敗名裂，爲天下笑。十二月法艦來攻浙江鎮海海口，爲提督歐陽利見所却，孤拔受傷，不久即死。明年法艦駛揚子江口，封鎖寧波，擊破鎮海砲台。而在台灣方面的法軍又大舉進攻，佔領基隆之壘壘與淡水河上之要地，不久復佔據澎湖島。法人羨基隆煤礦之富，要求清政府割基隆以和，被拒。陸軍由納克列耳率領，於一八八四年冬即在越邊與清軍發生接觸，明年一月，法軍大舉攻諒山，蘇元春，潘鼎新等力戰不能守。法軍進攻鎮南關，楊玉科中砲死

，隨將睿裕明畜死爲玉科復仇，亦中傷敗退。時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年七十，老於家，以國難復起率兵防邊，屯鎮南關，法人來攻，子材與總兵王孝祺部大破之，時法人前後受逼，子材與蘇元春、王德榜諸軍，乘勝窮追，斬獲無算，斃法軍官數十，長驅二百餘里，克復諒山。這時粵統英軍亦大破法軍於臨洮，克廣威、承洋二府，逼興化府，安南民衆紛起響應。馮軍正待繼續進攻，忽接朝廷停戰撤兵之旨，將士無不憤極流淚。蓋法國正當普法戰後，元氣未復，此次敗挫，人心動搖，內外交責，增兵籌餉之策，又爲國會所否決，此時已暗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及駐京英使巴夏禮出面調停，清廷亦厭戰，見法國求和即表示接受，派李鴻章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與法使巴特納成立天津和約，其要項如下：

(一) 中國承認安南爲法國保護國；

(二) 中國擇勞開以上，諒山以北二處爲通商口岸，

(三) 法軍由基隆澎湖撤退；

(四) 中國於南方諸省修築鐵道，聘用法人；

(五) 兩國另派員勘定邊境，協定通商稅則。

這明明是中國軍隊打了勝仗，却讓法國佔了便宜。清室的昏憤固然曠世罕見，而法帝國主義的毒辣却亦足可和英日美相媲美了。一八八七年五月清政府又與法國締結中越界務專約五款與商務續約十款。從此，安南成了法帝國主義合法的殖民地，廣西之龍州，雲南之蒙自與蠻耗，陸續開爲通商口岸。在商務續約中並進一步規定：(一) 輸入稅照海關稅則減十分之三徵收，輸出稅減十分之四徵收；(二) 解鴉片貿易之禁；(三) 異日中國南境與西南境與他國締結通商條約時，法國得享受爲他國獲得之一切利益，從此法國對於中國的侵略亦就深入堂奧了。

當法帝國主義積極掠奪安南和中國發生戰爭時，英帝國主義亦在努力經略緬甸，法國從中國的藩屬中攫取了安南，英國亦照樣攫取了緬甸。緬甸爲印度支那半島的一個小國，在安南之西，亦爲中國藩屬。一八八一年間緬甸發生政變，有排英運動，英印總督發兵赴仰光，要求緬王答覆賠償謝罪事，緬兵發砲擊之。英人大怒，全軍上陸激戰，遂佔仰光及附近城市，緬兵敗走上緬甸。是時緬甸又發生政變，新王即位，遂向英人請和，是年九月結和約於仰光，割擺古州爲英國領土，自此南緬全爲英領。英國佔了南緬甸以後，經營不遺餘力，遂引起了英法帝國主義的衝突。當時英法二國在印度支那互爭雄長，法政府欲扶植法國在緬勢力，於一八八二年遣使來緬，其目的是想在馬來半島克刺峽開鑿運河，事爲英國所阻。一八八四年緬王與法結攻守同盟秘約，法國代緬王維持王位，緬王以湄公河以東之領土割讓於法。明年法政府竟將該約公布，英政府大駭，遂決併吞緬甸。適緬王與緬甸商業會社發生爭議，英印總督達華林出任調停，緬王不應。達華林遂致哀的美敦書於緬王，限時答覆是否受英國保護，緬王七一波爲消極之答覆，達華林乃宣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英軍攻緬，盡佔緬甸諸要地，緬王向仰光退，後被禁於印度之麻打拉薩。英政府以布達達加德駐緬，監督緬甸官吏。一八八六年一月英國遂併上緬甸，二月合併上下緬甸，五月以緬甸劃爲英屬印度之一部，緬甸遂完全淪爲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了。同時，一八八七年葡萄牙割據澳門。一八九〇年，英國又吞併中國之藩屬哲孟雄。

第三節 朝鮮獨立問題與中日甲午戰爭

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加緊對中國侵略的過程中，接着中法戰爭之後，又有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戰爭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是英法資本主義膨脹的必然結果一樣

。甲午戰爭前數十年，日本也和中國一樣，受着不平等條約的壓迫，關稅沒有自主權，並有治外法權的束縛，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不僅積極侵略中國，同時也向日本染指，當時日本的鎖國政策，終敵不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勢力的侵入，結果就引起了日本民族的覺醒，於一八六八年實行明治維新，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維新後，新的機械產業在日本亦漸次發展了，股份公司與銀行資本亦迅速地興起來了。可是，明治維新並不是澈底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是地主與資產階級共同自上而下的一種改革。以此，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便產生了如下的特點：（一）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封建勢力不但沒有剷除，而且還相當有力。特別是鄉村農民受地主階級封建的剝削，極為貧困，以致國內市場非常狹小。（二）日本工業的發展偏重於輕工業，重工業還很落後，而且日本國內缺乏資本主義的發展上所必要的資源，所以日本迫切需要國外原料的出產地與國外市場，特別要求殖民地。（三）日本資本主義很快地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這是一種封建的軍事的帝國主義，特別富於侵略性。中國和日本只有一海之隔，而且日本資本主義的萌芽，係在歐美各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及至它將次成熟的時候，全世界的市場，差不多已經宰割分配無餘，只有中國這塊肥大的禁嚮，雖然已在英法俄美等帝國主義列強包圍掠奪之中，但尚有容納更廣大的商品之餘地，所以新興日本帝國主義第一個進攻目標就是中國，並且進攻的手段亦更為猛烈。既得琉球，又想謀取朝鮮，因朝鮮土地肥沃，所產米、麥、荳、棉，都甚豐盈，正是日本所迫需，且朝鮮地勢險要，可築軍港，更是日本欲得而甘心。『新興的日本很切望使朝鮮脫離了他國的支配和干涉，使它和日本發生密切的關係，並且把它拿來做大陸政策的基點』。但朝鮮自立國以來，即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在歷史上，在血統上，在文化上都未曾和中國脫離過宗屬關係。日本要攫取朝鮮，除了和中國開戰外，很少有其他辦法，甲午一役就是日本製造得來以奪取朝

鮮的。

中日戰爭的焦點爲朝鮮獨立問題，蓋日本須使朝鮮先脫離中韓宗屬關係，方能進一步佔爲己有。鴉片戰爭後，太平洋風雲變色，日本首先維新，中國則依然老大，朝鮮有志之士相率東傾，冀有以自拔。日本乃利用此機，培植韓國內部親日勢力；於是朝鮮內部形成兩大派：一爲維新黨，亦名日本黨；一爲守舊黨，亦名中國黨，兩相傾軋，積不相容。中國此時，既不能允許朝鮮民族自決，助其獨立解放，復不能刷新內政以領導藩屬，堅決排除日本之干涉朝鮮內政。只一味頑守故舊，壓制屬國不使進取，對日本在朝鮮之製造內亂，非惟不給以辭嚴義正的詰責，反採取日本同樣方法與之爭在韓優勢，這在客觀上恰好幫助日本製造韓國之內亂。朝鮮新舊兩派既成對立之勢，日本乃百端煽惑，使用各種卑鄙手段，掀起韓國政潮，一以糜爛韓國，顯示韓人在中國保護之下毫無出路；二以製造種種口實，使自已可以藉此侵入。先是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明治八年）日本測量朝鮮沿海及中國牛莊等處之軍艦，在朝鮮江華灣爲炮台守兵炮擊，日軍艦應戰奪其砲台，並遣黑田清龍、井上馨爲正副使，率軍赴韓問罪。朝鮮畏其強，遂於次年遣大臣申樞、副官尹滋承，與訂江華條約，其要項如下：（一）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有平等之權；（二）朝鮮除釜山外，加開沿海二處爲通商口岸（後開元山津、仁川兩處）；（三）朝鮮沿海，任日本人自由測量。這個條約的目的，很顯然的是要使朝鮮脫離中國的隸屬關係，而移於日本的支配之下。從此朝鮮日本黨逐漸得勢，建立新政府，日本人被聘爲朝鮮軍教練官者甚衆。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兵士暴動，失勢的大院君利用亂兵顛覆新政府（以閔族爲中心之政府），亂兵殺日本軍官，襲擊日本公使館，日使花房義質等走免，被害者四人，是爲壬午之亂。日本政府見機會到來，又遣使問罪，並提出要求三件，交涉不得要領。時清廷已發兵赴朝鮮，鎮壓暴

動，捕變亂主使人大陸君及其黨羽。於是經清政府的斡旋，日韓在濟物浦訂約，即懲兇、賠款、謝罪及日本派軍駐於韓京護衛日本使館等。從此日本得派兵駐朝鮮，其勢力更不可侮。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維新黨之金玉均、朴泳孝等勾結日使縱火刺殺舊黨首領閔泳翔等，日軍馳赴宮庭應變，一時舊黨諸廷臣多被殺，金、朴等入內閣主政。是時中國全權委員袁世凱亦率兵討亂，擊退新黨及日軍，新黨內閣瓦解，舊黨得重握政權。日本政府遣使至朝鮮，要求郵費及軍費，修書謝罪，朝鮮政府一一照條履行。一八八五年日本政府復遣伊藤博文來中國，商議中日共同保護朝鮮辦法，與李鴻章締結天津條約，要款如下：（一）中日兩國駐朝鮮軍隊盡數撤退；（二）朝鮮練兵，中日皆可派員教練；（三）將來中日兩國，如派兵往朝鮮，須互相照會。此約一締，朝鮮遂變成中日二國的共同保護國，而予日本以攫奪朝鮮的良機。厥後，東學黨起，終結中韓宗屬關係的中日戰爭就因此而爆發。加之，我們知道，一八九一年是日本自己紡造的棉紗開始向外輸出之年，從這時起，日本自然要極力向海外尋求棉製品的市場，而首先就要向近水樓台的朝鮮和中國開刀了。

東學黨是朝鮮人民因國政腐敗，民生苦痛，起來鋤孽貪污，反對秕政的。一八九四年東學黨在羅道古阜縣起事，擊敗官軍，陷全州，韓京大震，朝鮮政府乞援於中國，清政府發兵助朝鮮官軍剿討。當出兵時，且依照天津條約照會日本。日本見有機可乘，亦派重兵至朝鮮，一方助其創亂，一方更派大批浪人混入。後東學事平，中國政府照會日本公使中日兩國同時撤兵。日本政府不應，並提出對韓協同改革案，且更以兵力迫朝鮮京城。日公使大島又面謁韓王，詰問韓王是否承認中國對朝鮮之藩屬關係，日本勸告朝鮮的改革案韓政府是否實行，朝鮮王室不能答，中國駐韓全權袁世凱令韓政府取消大島改革案，並堅持日本撤兵案。這時與中日韓有關係的各國，如俄英美諸國都出而調停或干涉，俄國且對

日提出嚴重質問，日本政府答以『若中國政府願與日本政府協同改革朝鮮之內政，或中國承認由日本獨力擔任對朝鮮的改革案之施行，而不加以妨害，則贊成撤兵。』自然，日本這個提案，並非真的爲朝鮮改革政治着想，因明知中國不能同意此案，故意用此爲中日戰爭之開端。不久日本即用強迫手段威脅朝鮮政府，向朝鮮政府提出照會，宣稱中國既不同意共同改革韓政，日本決獨力進行。又稱日本將自行架設京城、釜山間的軍用電信，朝鮮政府應速爲日本建設兵營，速令撤退駐牙山的中國軍隊，廢棄一切中韓條約，限朝鮮政府在二十日內答覆，接着又以兵力威脅之，日本於六月間向朝鮮王宮進發。朝鮮政府不得已，遂依大島要求，將中韓歷年所訂一切條約全部廢除，又託日軍驅逐中國駐牙山軍隊。日本軍隊在豐島擊沉中國軍艦，中日甲午戰爭遂由此啓幕。

當日本陸海軍並進時，中國援軍亦由大沽向牙山進發。日方一面下令向牙山攻擊，一面命艦隊游擊於黃海方面及豐島方面。中國軍艦爲日本擊沉，中日海陸軍在牙山之成觀發生激戰，清軍敗績。清政府乃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下宣戰詔勅，日本亦於同日宣戰，英美諸國皆宣告中立。七月二十日日本又強迫朝鮮政府締結日韓新約與日韓攻守同盟條約。是年六月清政府更遣大軍由大連灣向北韓進發，七月達平壤，築壘守之，日軍實行包圍平壤清軍之策，分三路進攻。八月平壤城破，清軍死傷二千人，乃退鴨綠江西岸九連、鳳凰一帶。同時在黃海上中日海軍亦發生激戰，日本海軍處處對清軍佔優勢，因爲中國軍艦的噸數、速力與砲的命中都遠不及日軍，而海軍士卒平日復少訓練，臨戰時異常慌亂。結果中國軍艦有四隻被擊沉，死傷士兵千餘人，提督丁汝昌受重傷。於是中國的北洋艦隊不敢復出，日本奪取了黃海的制海權，在奉天南部黃海西岸，日軍可以自由進出。

日本佔領平壤後，更增軍進攻，一軍由義州渡鴨綠江，一軍窺大連、旅順，由山縣有朋和大山岩

分頭統率，長驅直進。清軍則由宋慶、劉盛休和依克唐阿統率，合之平壤敗歸各軍，尚有七十一營，然皆節節退讓，九連城、鳳凰城、岫岩州、全州等皆不守。至是奉天都悉爲日軍佔領，全州既陷，日軍續攻大連，不戰而克。十月二十四日日軍又攻陷旅順，入城後，屠殺中國平民四日，婦孺死者甚衆，於是東方第一要塞變爲日本海軍的根據地。旅順陷後，中國海軍北洋艦隊殘部潛伏威海衛不出。日軍由榮城灣登陸，先後佔領諸要塞及砲台。一八九五年二月日軍進窺威海衛，守兵早遁，日軍唾手而佔據之。未幾，日軍又由威海衛北岸開炮轟擊劉公島，島內陸兵潰亂，不能戰，提督丁汝昌自殺。清軍對日軍投降，自是北洋海軍完全覆滅，渤海南北港口，皆爲日軍所佔。遼東方面的清軍亦爲日軍所逼，潰退甚衆。是時湖南巡撫吳大澂率湘軍抵牛莊，軍心爲之一振，大軍於二月間攻擊海城之敵。日軍見牛莊防疎，分兩路夾攻牛莊，清軍被圍，牛莊遂陷。日軍續攻營口、田莊台，悉陷之，不久兩國在北方遂入於休戰狀態。北洋海軍覆滅後，日本更欲消滅中國的南洋水師，奪取台灣與澎湖島。後果另編一艦隊向澎湖進發，砲台爲日軍艦破壞殆盡，於是澎湖全島亦全爲日軍佔領。

當日軍攻陷旅順時，李鴻章請各國出爲調停。英國以各國擔保朝鮮獨立與中國賠償日本軍費二條件，勸日本停戰，爲日本政府所拒。清政府復遣天津海關稅務司德人德璀琳（G. DeLaurie）爲媾和使，攜照會往日本議和，復遭日本政府拒絕。於是美國政府的出任調停，美國政府在當時惡戰的延長，妨礙商務，兼欲示惠中國，乘機提高自己在中國的地位，如英法聯軍之役時俄國之所爲。首先命駐日美公使向日本外務省表示調停之意，日本示意須中國直接向日本乞和。清廷得訊，即派侍郎張蔭桓及湖廣總督邵友濂赴日本廣島議和，日政府以張邵資望太淺，無專決之權，拒不納，張邵不得已返國。清廷乃改派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鴻章子經芳爲參贊，以一八九五年二月東渡。日本則以首相伊藤博

文，外相陸奧宗光爲議和大臣，兩方全權會議於馬關。日方最初提出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爲休戰條件，談判不得要領。適有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者刺李鴻章於出會議所回營邸之歸途，重傷左頰，事聞中外，各國輿論交相詰責，日政府懼列強非難，一方優禮李全權，一方允許無條件停戰，於三月三日成立中日兩國休戰條約。然後日本方面提出媾和條約案，李鴻章提出修正案，兩方屢經磋商，始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成立馬關條約，其要款如下：

- (一) 中國承認朝鮮爲獨立國，廢除朝貢；
- (二) 割遼東半島（由鴨綠江至鳳凰城、漢城及營口爲止）台灣全島及澎湖群島於日本；
- (三)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
- (四)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設立領事於各商埠；
- (五) 爲擔保本條約實行，日本暫以軍隊佔領威海衛，軍費由中國支付。

同年六月間中日又續訂中日通商航船章程二十九條，規定准許日本汽船在宜昌至重慶，上海至蘇州，杭州各航路自由通行；日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所用各種機器僅納進口稅即得裝運各地，所製各貨亦只照輸入貨納稅。同時在這個條約中，日本又取得了對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及與其他列強在中國同等的權利。

馬關條約確立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的支配權，使朝鮮亦如安南、緬甸之成爲英法殖民地一樣，變成了日本獨佔的殖民地。而且使日本取得了對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及與其他列強在中國同等的權利，以及在南滿的軍事、經濟根據地，雖然以後經俄法德之干涉，歸還了遼東與中國，然大連、旅順諸要

港都爲日本所得，這就爲日本帝國主義日後侵略滿蒙開闢了門戶。至於奪取台灣、澎湖，亦使日本帝國主義得以在中國南面建立海軍根據地。不但如此，馬關條約及通商章程既規定日人在中國境內有從事製造業之權利，即等於給了日本資本家以投資中國之法律的根據，此後外國就可以在中國開工廠，以雄厚的資本作後盾，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來直接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了。日本利用這種權利，遂實現並加強了對於中國的侵略計劃，而由此更推進了日本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發展。所以中日甲午戰爭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又是日本資本主義更向前擴展的造因。馬關和局之成，英國實居間介紹，美人依違其間，頗陰袒日，而俄法德三國表不滿。法忌其索台灣，俄則怒其據遼東，尤引爲大害，必欲阻之。（註一）德雖爲後起之國，亦欲乘機干預東方，爲將來發展計。故三國抗議，於四月一日，同時提出。而俄人即作最後準備，命在遼東之海陸全軍，準備待命出發。當時日人以軍隊悉在國外，又新戰勝中國，掇得許多意外權利，須有相當時間消化，不願

（註一）俄國自與中國結黑龍江條約以後，就積極經營西比利亞，謀於太平洋尋覓一條自由通路。而海參崴長期結冰，在軍事上頗易爲日本海軍所制。若遼東爲日本獨佔，則俄國向極東發展的計劃，不免化爲泡影。所以當馬關條約締結後，俄國政府聞遼東半島已割爲日有，大起惶恐。是年（一八九五年）四月間開海陸軍委員會，決定聯絡法國軍力制服日本。那時法國正與俄國爲同盟國（用以對抗德意奧三角同盟者），且欲在遼東投資，不喜日本的獨佔，所以與俄國聯成一氣。詳見李鼎聲編中國近代史一百八十一頁。

立刻與俄開戰。伊藤即往廣島，開御前會議。最後決定依從三國之請，退還遼東半島於中國。又恐中國乘此不批准馬關條約，乃主張對三國讓步，對中國則毫不放鬆。且同時以好意向英法俄諸國，聲明其意旨。然各國皆從本國利益上着眼，（註二）不肯爲日人援助。俄人且拒絕要求，嚴整軍備以待。日人不得已，乃照會俄國『日本除保留金州外，其餘遼東半島，概依俄國意見，放棄其佔有權，但日本得向中國索取其相當報償』云。俄人以日本此項照會，等於不肯交還遼東半島，不允其請，日本乃又照會，謂『日本悉依三國政府友誼上之忠告，願將遼東半島佔有權永久拋棄。』於是中國政府加給銀三千萬兩，時中日換約全權大臣，已至烟台，遂如期換約，而中日甲午戰爭乃告結束。

第四節 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的教訓

太平天國失敗後，列強利用中國的弱點，更進一步侵略中國，且都不以爭奪市場爲滿足，而想獨佔所得的市場，割據中國的邊疆，如日本吞併琉球，朝鮮，俄佔伊犁，英併緬甸，法奪安南是。其中法日兩國因見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利甚巨，也就製造事端，實行侵華戰爭，因此而有中法戰爭與中日甲午戰爭的發生。這時滿清政府已十分腐敗無能，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屈服投降，祇想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來支持其反動統治，已根本無所謂對抗外寇之國策，雖有廣大兵士之英勇抵抗，政府也不願加以組織支持，甚至

（註二）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佔據遼東，並不是替中國打不平，而是爲了它們自己的利益，

這正如後來美國以開放門戶政策干涉日本對華的獨佔，是爲了要擴展它們自己在中國的利益與特權一樣。

打了勝仗，也還是讓外人佔去便宜，如中法戰爭之結果即其顯例。這種情況就是當時稍有見識之官吏也公認不諱，如中法戰爭喪權辱國之後，曾紀澤即會說過是『始誤於柔，繼誤於忍，終誤於讓』之可悲結果。事實也確是如此，當法軍已佔領紅江下游，而李鴻章尚力主和議；等到法軍已率艦艇十餘艘停泊閩江口，準備進攻福州，中國數萬兵士在帝國主義橫蠻示威下，無不切齒憤恨，欲拼死一戰，而清政府可恥的不抵抗政策依然如故，命各砲台只准防禦，不准進擊。』後來馮子材、王孝祺大敗法軍，竟忽然接到清廷停戰撤兵之旨，將士無不憤極流淚。甚至打了勝仗之後，而李鴻章與法國所訂媾和條約，依然是喪權辱國，這簡直是古今中外罕有的昏憤。而且馮子材、王孝祺諸軍之勝績，證明中國雖弱，猶可自衛。如果政府有堅定的禦侮國策，則以當時之士氣，實大有振奮自強之可能。且當時法國正值普法戰後，元氣未復，故一聞敗挫，人心動搖，內外交責，增兵籌餉之案，又爲國會所否決，這只要看它暗中懇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及駐京英使巴夏禮趕快出來調停，就可知其色厲內荏之一斑。其實當時法國用意，亦無非是知難而退，想不到清廷竟這樣昏憤，打了勝仗反而讓它佔去這樣大的便宜。當時李鴻章輩如稍有謀國之誠，無論如何訂一個平等的媾和條約總是做得到的。在當時形勢，如果能够訂一個平等條約，也就可以制止一下外寇侵略之念，對中國開闢一個振奮自強的機會，然而這一點生機也被他們斷送了！在清廷之意，以爲這樣謙和禮讓，一定可以得到外人的贊美，然而事後法國竟宣言此次戰爭係『出於法國之膺懲，討伐野蠻國使悟文明國之價值，是文明國之責任所宜然』，這與今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亞的口吻，簡直如出一轍，這本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廬山真面目，沒有什麼奇怪。所可憐的，就是本想以犧牲國脈去邀寵外人的清廷，而結果還是逃不了『野蠻國』的雅號。一個不能自衛和自救的民族和國家，一個對於自己人民肆意壓迫而對外寇侵

略表示管轄責任，而政府，必定要遭受人們的輕視和鄙棄，並且必然不會得到歷史的寬恕，這是千古不滅的真理，也是中法戰爭的最大教訓。

正因爲滿清政府採取了這樣不能饒恕的錯誤政策，所以更招致了外人的輕視，不但不能發揮而且巨而屢殺了自強自衛自救的民族潛力，所以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便遭受了慘敗。在這次戰爭中，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與國防軍事的空虛落後，可以說已充分敗露出來。加以滿清政府根本沒有一個堅定的禦侮國策，在中日戰爭形勢緊急時，滿清政府內部也就更陷於混亂，翁同龢等極力主戰，而李鴻章則企圖以妥協政策來求得中日間衝突的緩和。統治階級表現猶豫不決，對於戰爭毫無準備。甚至袁世凱報告日本決戰電請海陸軍增援時，而李鴻章却置之不問。以致戰爭開始時，中國方面表現措手不及，處處陷於被動地位，這在基本政策上已決定了中國方面的失敗。其次，在軍事上沒有集中優勢的兵力與日本決戰，形成陸續增派隊伍作戰的形勢，以致當北方的隊伍已遭慘敗時，而湖南、四川等地隊伍才開始趕赴前線，結果就不能挽回戰爭失敗的形勢。此外，在軍事指揮上也極不統一，形成各自爲戰的局面，給予日軍以各個擊破的機會。第三，是沒有得到人民的擁護，政府軍隊不僅與人民隔離，而且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人民；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就在朝鮮也是如此。如平壤爲朝鮮北方重鎮，清軍一萬七千人齊集於此。「朝民素親中國，聞大軍至，爭獻酒漿餉軍，而軍士殘暴，奪財物，殺丁壯，淫婦女，衛汝貴之軍尤甚，朝民大失望」。(註三)當時滿清政府及其軍隊這樣腐敗，當時這種沒有準備的、局部的、片面的抗戰，其結果當然就只能失敗。

(註三) 見羅偉蟲中日兵事本末。

甲午戰後，一時輿論的呵斥，集中於李鴻章。然而後來的史家，却頗有替李鴻章開脫的，他們以爲當時中國的海陸軍本不堪和日本一戰，如果清廷能早聽李鴻章的話，用外交方式來解決朝鮮問題，則中日不致開戰，縱失朝鮮，還不致於割台灣，更不致於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實這些話都是迷惑於歷史的現象，不會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國際形勢去作進一步的觀察，所以成了不合實際的空論。

原來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工業日趨發達，原料的取給與製造品的推銷，漸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所以在甲午以前，日本幾次派遣使臣來華，要求准許立約通商，幾經挫折，後雖達到通商目的，但沒有能夠和所謂列強者享受同樣利益。而日本資本主義的擴張，却已非通商所能滿足，便直接採用進兵台灣，併吞琉球，藉此以伸張國勢，並試探中國。那時候，中國的海陸軍雖沒有能力援助琉球，台灣，然而集南北洋艦隊以固海防，還可防止日本的進攻。假使清廷的大臣們懂得大勢，認清日本的弱點，利用日本與列強在華利害上的衝突，以廢止中日修好條約及通商章程，作對日的經濟制裁，不僅琉球固可不變爲沖繩縣，後來朝鮮的問題也不會很快的就發生了。無如當時清廷的大臣們所認識的日本，還是二十四史中的『倭奴國』；李鴻章是號稱『懂洋務』者，並且他知道『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一八八五年李致總署書），然而他滿腦子裝的是縱橫閩閩的中國祖傳外交方法，最初欲聯日本爲外援，主張『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一八七〇年致總署函），及琉球事起，則又主張『與其多讓於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日而又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得借俄以懾日』（一八七五年奏章），這便是日本人到現在還引爲口實之所謂『以夷制夷』政策。既沒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味想從聯甲拒乙，借丙懾丁的縱橫策略中去求苟安，這種外交方

式，如何能解決當時的朝鮮問題？所以清廷即使聽從李鴻章的話，除了無條件的讓日本滅亡朝鮮之外，中日戰爭還是不能避免的。中日戰爭既然不能避免，而李鴻章却除一決主張和平解決以外，不預作萬一宣戰後的適當措置之建議，甚至日本已經對中國宣戰，而李鴻章還是遲疑寡斷，仍自恃其懂洋務，妄想懲患英俄出而調處，以此坐誤時機，遂使日本得達其所欲，一朝敗壞，至今爲梗。所以凡稍稍懂得一點近代史者，斷不應再替李鴻章辯護的。而且李鴻章的錯誤還不只在於他迷信外交，而更在於他到應該運用外交的時候，却又不肯運用。假使李鴻章能洞燭當時國際情勢，看出日本的弱點，先撤退朝鮮駐兵，一方調集兵艦，游弋渤海內外，修築砲台，厲兵秣馬，以作戰備，一方宣佈與日本絕交，則日本也就很難大舉進攻中國，所謂列強者，在利害關係上正希望清廷能把日本的勢力趕出中國去，當不至助日攻我，如此堅持下去，日本不堪經濟上之壓迫，自會向我要求重修舊好，那時主客易勢，說不定朝鮮事件會得到較適當的解決，然而李鴻章却又不肯運用這種有利條件。尤其是當李鴻章自日本携馬關條約回天津時，咸認其損失較諸前比南京、天津、北京諸約爲尤多，故輿論大譁，交詆鴻章，奏疏凡百十數上，甚至有請將鴻章父子拿辦治罪，欲將和局推翻者。同時爲了割讓台灣問題，引起台人大憤，主事邱逢甲等建議自主，公舉唐景崧爲大總統，圖謀台灣獨立。而俄法德三國又起而干涉，要求日本還我遼東，那時候清廷儘可不批准換約，以待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李鴻章反派伍廷芳迎駐津日領事來大沽，密令其速電東京，催促清廷換約。同時王子春已向法國交涉，願把台灣質押給法國，法國且已許價若干萬萬佛郎，允以台灣土地歸法，而海關仍歸我，質押若干年，任我贖還。李鴻章得到了這個消息，急電伊藤博文，竟匆匆於午夜在烟台換約，不僅斷送了許多中國權利，而且斷送了台灣民族的生存。可見李鴻章只計自身利害，不顧國家民族利益，加他以「漢奸」的頭銜，實在是並

不冤枉的。

然而甲午戰爭所以慘遭失敗，却不簡單由於李鴻章等一般大臣的誤國或禍國，還有更根本的經濟政治因素在。在經濟因素上，甲午戰爭前，日本的產業已到了『大產業的階段』，而中國却還在『工廠手工業時代』；這無異『在社會經濟的發展水準上，日本比中國走了一大步』。這反映到軍事技術上也就要發生質的差異，例如當時中國『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兩艘，爲倭船所不及；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汶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遲速懸殊爲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倭人心計詭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置』（見李鴻章奏章）而日本當時海軍則馬力、速度、艦齡、速射砲數、水雷發射管等，均較中國爲優。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以爲政治的因素還比經濟的因素更來得重要。我們要知道，『沒有富有朝氣的政府，也就不會有鞏固的國防。不根本改革政治，休想談抵禦外侮，更休想談振興工業』。當時『慈禧太后以建築頤和園故，撥海軍經費三千餘萬，因之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全』，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況滿清政府完全建築在反動的剝削基礎上，它們對內則恣意壓迫，對外寇則妥協投降。它們根本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民和領土，那裡還敢動員和組織真正的力量去抵禦外侮。所以甲午戰爭的失敗，在表面上似乎只是兵艦、兵器、兵力都不及敵人之故，然而戰爭的勝負，初不限于兵器優越及兵力的強大，歷史上以弱勝強，儘多先例。問題是在有無抵禦外侮的政策，能否改革政治去動員和組織禦侮的力量，以及在軍事上有無正確的計劃和指揮等。如果這些

都能得到正面的解決，則劣勢可以逐漸改變成優勢，弱國也可以戰勝強國。當時滿清統治者對於這些根本問題都不能作正面的解決，加以李鴻章輩之誤國，結果當然只有一敗塗地。

中日戰爭充分表示了滿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役，雖然說明了滿清政府的無能，可是還是沒有澈底的暴露。中日甲午戰爭結果，中國海軍覆滅，陸軍敗北，以往的軍事建設都宣告破產，偌大的中國爲小小的日本所征服。這樣就在全世界前面指明：中國完全是一個腐敗無能的國家，各帝國主義因此都看穿了中國的實質，因此便毫無忌憚的向中國肆行侵略了。中日戰爭後，各帝國主義到處強迫中國承認各種條約，強迫中國租借土地，把中國劃分爲各國的『勢力範圍』。(詳下章)這樣，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便在實際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因爲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勝利，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機會，而且朝鮮的佔領，正被它拿去做推行大陸政策的基點。以後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它又打敗了俄國，以及在第一次大戰中日本的投機取利，使日本帝國主義更加擴展反動，以至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生存解放的最大敵人。正因爲甲午戰爭的敵人仍是今天中國的敵人，所以我們在今天抗日戰爭中來檢討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也就有格外深切的意義。雖然四十五年後的今日，跟甲午戰爭的歷史條件與國際條件已經大不相同；那時候滿清政府是腐敗無能，而現在已經有了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與新的抗日政策；那時候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個以平等待我的民族，而現在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做我們的隣邦；那時候滿清軍隊很快即被覆滅，而現在我們已經支持兩年又三月之久，却愈戰愈強。所以現在如果有人拿甲午戰爭爲例，以爲中國武器兵力都不如日本，就不能戰勝日寇，而發什麼『抗戰必亡』『再戰必亡』或『戰則兩傷』『和則兩存』的謬論者，那便是汪逆精衛一派的漢奸理論。然而反對漢奸理論不能妨害我們接受正

種的歷史教訓，而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現在的抗日戰爭，雖然已經有了勝利的把握，然而真正要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偉大目的，那就無疑還要走許多曲折不平的路程，還需要經過無數艱難困苦的重圍。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已經明白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就必須團結自己內部的力量，澈底改革政治，執行獨立自主的抗敵政策。不根本改革政治，休想談抵禦外侮，更休想爭取最後勝利。正確的認識歷史教訓，應該使我們警惕到，我們不能安於目前的現狀。所以怎樣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反對中途妥協危險；怎樣力求全國團結加強，反對各種分裂陰謀；怎樣力求全國向前進步，反對一切反動倒退現象，以達戰勝日寇建設新中國之目的，應該是檢討甲午戰爭失敗教訓的實際課題。

第五章 戊戌政變與義和團運動

第一節 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

中日戰爭後，正是十九世紀的末葉，資本主義發展已經進到帝國主義，即從自由競爭轉到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其侵略情形，較之以前大異其趣。蓋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時期，對外侵略的主要手段為貨物輸出，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則其侵略手段已由輸出商品到輸出資本；在前一時期，它們所急急找求的是能銷售大批貨物的市場，到後一時期，則所找求的是能夠消納大量資本的投資地。前者的侵略還帶有自由競爭的意味，後者的侵略則利於獨佔。因此，它們相互間的衝突更比以前劇烈，侵略也就更爲毒辣，他們都不以爭得市場爲滿足，要進一步來獨佔所得的市場，換句話說，他們所要求的已不止是市場而是殖民地。以對中國侵略的具體事實講來，他們不只要打開中國的閉關政策，讓他們來銷貨，且要更進一步，把所得部分放在自己管理之下。中國市場固然廣大，物產固然豐富，但已經數十年來被歐美列強所掠奪，如今又新添加日本強盜，自然使列強中更增多一個角逐分子。加以壟斷原料與投資地比以前僅僅奪爭市場的時候，必然引起更多的糾葛，因爲爭奪市場與割地佔據還不十分密接相關，而壟斷原料與投資地却至少要有勢力範圍。因此列強對於在中國權利之擴張，比以前更爲迫切，他們侵略的方式也就更進到列強爭相以武裝力量與外交陰謀，各自佔據勢力範圍，實行公開的掠奪，而這種新方式就如上章所說，是利用中國新敗之餘來進行的。

自馬關條約締結後，中國須籌一筆鉅大的賠款償付日本，贖回威海衛，更兼要整頓軍事，而清廷國庫空虛，於是不得不出於借外債之一途了。沙俄便是首先借款於中國的債權人之一。不過那時沙俄政府自己還要向法國借債來建築鐵路，編練軍隊，沒有餘錢貸與中國，於是與法國組織法俄銀行團，借給中國四萬萬法郎，利息四分，而由俄國政府擔保，這樣一來，中國便成爲俄國的債務人。英國因爲不願俄國獨管臺灣之味，因此曾用盡種種方法來阻止，然而沒有發生效力。在遼東半島退還中國後，俄國本欲向中國索重償，事前俄公使喀西尼與李鴻章已有成約。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禮，清政府派李鴻章赴俄致賀。李抵俄京後，俄國朝野對李行包圍政策。因於是年三月在莫斯科締結中俄密約其要款如下：（一）中俄二國如遇日本侵犯，不論被侵犯者爲誰，中俄二國應在軍事上與軍需上互相援助；（二）中國允於黑龍江、吉林地方建築鐵路以達海參崴，其事由中國交華俄銀行辦理。其實當時世界所喧傳的中俄密約尙不止此。然由此可見俄國的目的在拉攏中國對日結攻守同盟，同時可使西比利亞不必迂繞西比利亞東部，卽可以橫貫黑吉三省直達全滿，以遂其侵略滿洲之慾望。滿清政府卒批准此約，設立華俄銀行，於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勢力深入東三省內部了。是年八月中俄復結華俄道勝銀行契約，規定該銀行的業務爲：領收中國境內稅款，代還中國政府募集公債之利息，及敷設中國境內的鐵道等項，接着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又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東清鐵路（卽中東鐵路）會社條約，規定築造由俄赤塔接濟南烏蘇里之鐵路，築造事務概委任華俄道勝銀行，並且規定東清鐵路會社有運送俄國海陸軍通過兩境之權，俄國經該鐵路至俄國境內之一切貨物概免釐稅，而經過此路由華輪俄或由俄輪華的貨物照海關稅則所定之稅額減稅三分之一，及由俄派護路警察等。一八九七年俄國藉口德國佔領膠州灣（見後），命西比利亞艦隊駛入旅順口，又要求租借旅順、大連二港及由哈爾

濱至旅順的鐵路建築權，因之引起了英國的忌妒，曾勸告俄國將旅大開作商埠，俄國拒絕之。一八九八年駐北京俄公使巴布巴夫與李鴻章結旅順、大連租借條約九條，要款如下：（一）中國將旅順、大連灣二處及其附近一帶之地租借與俄國，以二十五年為期，期滿得續商租借之；（二）旅順口作為俄國海軍港，大連灣開為商埠；（三）俄國得在大連、旅順建築砲台；（四）自哈爾濱至旅大之鐵路，與自牛莊至鴨綠江之鐵路由俄國築造。俄國侵略東方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東方覓取自由通海路與不凍軍港，現在完全達到目的了。同年八月俄政府更以遼東租借地改建關東省，置總督治之，以旅順為首府，俄國遂得在遼東建立直接的統治權。這樣，遼東半島雖然從日本帝國主義血口裡啞了出來，現在又給俄國帝國主義吞下大腹中去了。不僅如此，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後，有與築京滬鐵路的計劃，但興築費共需五千萬兩，本國僅籌得一千三百萬兩，餘三千餘萬兩，不能不向外商籌借。一八九七年四月清政府命盛宣懷與比國公司訂約，規定自保定至漢口的鐵路建築費，由華俄道勝銀行出資，而該銀行即得承辦該鐵路之權。於是江北大幹線之鐵路建築權歸於俄國。同年山西省商務局倡修正太鐵路，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六百八十萬兩，限二十五年償還，並規定如到期不能償還本息，則該鐵路由銀行代管。是時英國見俄國已攫取了京漢路與正太路的鐵路權，深恐俄國的勢力侵及揚子江流域。所以急與清政府結關外鐵路借款條約，英國借款二百三十萬鎊於中國為修山海關至新民屯與牛莊的鐵路，而以關外鐵路為抵押。英國的目的是要截斷俄國滿洲鐵路與京漢、正太兩路的連絡，阻礙俄國在中國北方數省的橫行。俄公使聞訊大憤，強迫清政府解除關外鐵路借款契約，結果英俄成立了一妥協案，即規定揚子江流域為英國的鐵路建築範圍，長城以北為俄國的鐵路建築範圍，彼此不得侵犯。這就是一八九九年有名的英俄協定，從此，滿洲與新疆、外蒙都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了。

英國則以香港爲根據地，在中國南方、中部積極擴充它的勢力範圍。中法戰爭後，英國會與法國交涉，締結英法協約，規定得與法國同享川滇之權利。及中俄密約成立，英國起了絕大的惶恐，遂更加緊其對中國的侵略。在一八九七年中英果成立新協約，規定中國開騰越、思茅、梧州、三水、甘州等爲通商口岸，又許滇越鐵路相聯絡。一八九八年二月英公使瑪德納藉口俄艦佔據旅順，亦向清政府捏得下列權利，即：（一）揚子江沿岸各省之土地不得租借與他國；（二）開放內河；（三）二年後開長沙爲通商口岸；（四）中國稅務司永久聘用英人。同年二月中英更結租借威海衛條約，規定威海衛租借與英國，租借期限一如俄國之租借旅順，爲二十五年，於是在北方，英國對抗俄國的計劃，由於威海衛之租借，得到部分的成功。同時，當中國支付第二期對日賠款的時候，英國爲與上次俄德借款競爭起見，也趕即由英國的匯豐銀行和德國的華德銀行聯合借了一千六百萬鎊給中國。這次英德借款於一八九六年簽字，規定以中國海關的收入做擔保品。接着在一八九九年又成立第二次英德借款，數額同樣是一千六百萬鎊。一八九八年四月中法談判成功，清政府承認租借廣州灣於法國，英國又如法泡製要求租借九龍，以『抵制法國危害中國及侵犯英國利益』。六月間李鴻章遂與英使瑪德納締結九龍租借條約，規定：九龍半島及香港附近四十餘島及大鵬，深圳二灣租借與英國，租借年限爲九十九年，歸英國管轄。由於威海衛與九龍的租借，英國在軍事上遂得北與俄國南與法國抗衡，英國在中國建立了兩個重要的海軍根據地，中國方面的霸權便屬於英國。然而英國並不以取得了兩個海軍根據地爲滿足，同年五月間福公司與山西商務局締結山西探鑛附設鐵路條約，規定：由福公司借銀一千萬兩於商務局開採煤鑛，六十年間探鑛全權歸福公司，由是英國更取得了山西的探鑛權與鐵路敷設權。及一八九九年英俄條約成立，規定長城以北爲俄國勢力範圍，長江流域爲英國勢力範圍。這個範

閣議英政府自己表示，包括雲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浙江十省。

德國是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向中國侵略比其他國家爲遲。一八九七年十一月間山東曹州府鉅野縣發生游民暴動，其中分子多爲山東巡撫李秉衡解散的遊勇。暴動群眾殺死了德國兩個教士。這時德國教會已脫離法國天主教會的勢力而獨立，直接受德政府的御用。所以當曹州教案一起，消息傳到柏林，德政府遂下令派軍艦四艘赴膠州灣，青島砲台守兵退走，德海軍遂佔領之，次日又佔據膠州府城。駐北京德公使向總理衙門交涉，要求六項，主要的有：（一）巡撫李秉衡革職；（二）賠償德國教堂建築費及損失六萬九千兩；（三）以中德兩國資本設立德華公司，築造山東鐵路，並開採鐵道附近鎮山；（四）賠償德國辦理此案之費用數百萬兩。正在談判修正中，德國派來第二批軍艦又抵膠州灣，德公使復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膠州灣九十九年。清政府不得已，重與德國訂膠州租借條約，主要的爲：（一）將膠州灣水面與內外群島租借於德國，期限爲九十九年；（二）德國得在租借區域內建築砲台及行使主權；（三）中國准德國在山東築造自膠州灣至濟南之鐵路，德商有開採鐵路附近三十里以內地礦產之權，於是山東便成爲德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了。

自中法戰爭後，法國在中國的勢力日益發展，在國際間大有舉足輕重之勢。中經中日甲午戰爭，法國與俄國勾結，以壓制日本，這固然是由於法國聯俄制德的政策有以使然，可是法國欲藉此取得新鮮的禁鴉，却是不能否認的。所以法國在對日干涉運動及以後對中國的借款中雖然做了俄國的尾巴，但法國在干涉日本歸還遼東的三國中，是向中國索得報償最早的。當中日戰爭時，法公使已向清政府要求續訂中法境界及陸路通商專約這個條約在中日和約換約後，就已實現了。結果法國領土擴張至涇公河上游東岸之地，江洪河畔都成爲法國領土，且開思茅、河口爲新貿易場，並取得了雲南、兩廣的

鑛山開採權與雲南鐵路建築權，然這在法國還不能認爲中國所給與的干涉遼遼之報償。法國一面派遣工商業團體調查兩廣、雲、貴，一面奪取福州的航政權。當英法協約成立後，法國在南方所得的利益爲英國搶去了一大部分，法政府乃轉求報償於中國。一八九七年三月法公使向清政府要求兩項：即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及延長龍州鐵路，開採兩廣、雲南鑛山，修築滇、安間通商道路。清政府大體上均予承認，於是法國在南方的利益範圍算是更進一步確定了。可是到了一八九八年列強對中國正先後作分割運動，如英國之獨佔長江，德國之租借膠州灣，俄國之租借旅順口，都不免使法國垂涎欲滴，於是法政府如法泡製，亦向清政府租借廣州灣，並規定法國得在租借區域有爲軍事上設備之權，在租借期限（九十九年）內全屬法國管轄，於是法國在南方的勢力範圍劃定，足與英國抗衡了。

日本戰勝了中國後，居然也加入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爭奪集團，以強國自居了。我們知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本來是南北並進的，攫取琉球、台灣、澎湖，就是掠奪南方的政策；侵略朝鮮、南滿，就是向北方發展的運動。但在北方日本還正待休養整頓，除非擊倒俄國，日本是莫想前進的，這就是日後日俄戰爭爆發的基因。但在此時日本還正待休養整頓，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不敢和任何強國輕易啓釁，所以只得先經營南方。一八九八年日本伊藤博文第三次組閣，訓令駐北京矢野公使以福建省與台灣相接爲詞，向總理衙門要求發表聲明：福建省及沿海一帶永不割讓租借與他國，總理衙門備文承認之，於是福建成爲日本的初期勢力範圍。日後日本戰敗俄國，又攫取了南滿爲勢力範圍。以後驅逐青島的德國勢力，更將山東劃作它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且都成爲日後日本強盜大規模進攻中國的重要據點。

意大利在中國的勢力遠不及英法日諸國，然意國對中國的貿易亦不小。當各國紛紛伸手中國劃定

勢力範圍時，意大利政府亦欲授均勢原則，在中國海面覓得一海軍根據地。一八九九年意國政府一面派軍艦向中國進發，一面訓令駐北京意公使向清政府要求租借三門灣（在福建與舟山群島之間）爲意國海軍根據地。但這首先侵犯了英國和日本的利益，因爲英國已劃定揚子江流域爲勢力範圍，日本已劃定福建爲勢力範圍，而三門灣適介於浙江與福建之間。所以當意公使以強硬態度脅迫總理衙門締約時，因爲有英國從中作梗，總理衙門的態度也強硬起來了，甚至對於意國提出的哀的美敦書置諸不理，意國竟無可如何，因爲意大利在那時尙未躋立強國之林。

上述各國這樣的在中國爭劃勢力範圍，卽所謂均勢主義之實行。這裡所爭的都是築路、開採等投資權與關稅上的財政權，無一不扼我血管，制我命脈；而且不得中國之同意，它們自己卽互訂協約，何者歸誰，事後再使中國割押，勢同瓜分，中國主權實已掃地。唯時美國，猶未向中國要求勢力範圍，而提出開放中國門戶之宣言（一八九九年由美國國務卿海伊向關係中國之英德俄法日意等六國提出）：

(一) 各國在中國所獲之利益範圍或租借地，或別項既得權利，互不相干涉；

(二) 各國範圍內之各港，無論對於何國入港商品，皆遵中國現行稅率賦課，其賦課關稅由中國政府徵收；

(三) 各國範圍內之各港，對於他國入港船舶，不課本國入港船舶以上之入港稅，各國範圍內之各鐵道對於他國貨物，不課本國貨物以上之運貨費。

交涉結果，英國首先贊成，其餘諸國贊成覆書亦先後遲到，海伊更將門戶開放政策之旨通告各國政府。美國所以要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並非表示美國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而是因爲美國資本主義發展較後，未能及早參加群盜之分贖；來遲了一步，祇得運用另一種妙策，提出門戶開放原則，以便可

得在群盜既已劃定的勢力範圍內徐圖插足罷了。一般近視者認爲「美國是以超然第三者之地位，謀世界公共之和平」，門戶開放政策「可以救出中國於瓜分場中」。其實，所謂門戶開放，不過是共管中國的另一名詞而已。

第二節 維新變法運動的產生和發展

甲午戰後，各帝國主義的猛烈侵略與勢力範圍的劃分，使中國政治經濟都起了基本的變化。這時期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它們不僅要求中國爲商品和原料市場，並要求中國成爲它們的資本市場。它們所輸出的資本，或以高利貸形式，附加殘酷的條件，來支配中國的財政金融；或者投資於鐵路，造成各國的勢力範圍；或者投資於鑛山，握住了中國工業的咽喉；或者開始到中國來設立工廠，以備同中國民族工業爭市場。其結果就使基於農業和手工業的中國國民經濟受到絕大的破壞，加強了帝國主義列強對於全國殖民地化的基礎。然而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入却也助長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給了中國新企業的建立以某種程度的刺激，使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漸次反映到社會政治方面來。但是由於中國封建勢力對於社會變革的頑抗性，以及「帝國主義的統治，在殖民地需要一種社會的倚靠，因此首先和以前的社會結構的統治階層——封建地主、商業與高利貸資產階級結了聯盟，進攻大多數的民眾。帝國主義到處企圖着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搾取形式（尤其在鄉村中），用作反動聯盟生存的基礎」。（註一）使資產階級性的澈底改革，終於不能成功地實現。雖然帝國

（註一）見國際六次大會決議。

義在中國各地奠定了勢力範圍，擴大了對華的貿易與投資，使中國資本主義式的工業與商業亦開始有些發展；可是由於當時帝國主義一面勾結滿清朝廷，一面在每一勢力範圍內又與當地封建勢力相結合，維持當地封建統治，並經過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加強對中國勞苦群眾的剝削，因而沒有形成一個强有力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準備一個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資產階級的革新思想與要求，只是由比較進步和覺醒的官僚與知識分子表現出來，這就是當時中國變法維新運動產生的由來與根據。

清政府自甲午戰爭後，已充分暴露其腐敗無能，然這一戰爭却一方面刺激了進步官僚的覺醒思想，使他們漸次知道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之意義；另一方面却刺激了國內一般民衆反對滿清政府的情緒與運動，這便造成了日後推倒滿清政府的革命之基礎。這裡先說刺激了進步官僚的覺醒思想一方面，他們一向過着單調生活，如今海禁打開了，『天朝』以外，還有更文明、更強盛、更進步的外洋；一向妄自尊大，以爲我們是天下第一的東方文明，與今日『鋼鐵世界』『汽機世界』一拚之後，人人都感覺到萬事都不如人：人家有鋼鐵，我們只有木器；人家有機械工業，我們只有農業和手工業；人家有電燈，我們只有火油燈；人家有汽船，我們只有帆船。於是一敗於鴉片中英戰爭，再敗於英法聯軍之役，現在又三敗於中日甲午戰爭。人們對於彼我的觀念，就有極大的變化了；過去的天朝觀念，也站不住了，至少要公認西洋物質文明的威力了。他們遇着這種種切身的經驗與教訓，使他們一向崇拜聖帝明王的舊觀念，便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其中更敏感一點的人，甚至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發生了變法的要求，如王韜、薛福成、張之洞輩，還在甲午戰爭以前，就已感覺到『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歐州始。以歐洲諸大國，爲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舍此無以師其長』，『設我此時不一變，安能埒

於歐洲諸大國」(註二)了。王韜又說：「故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爲功。變之道維何？曰：取士之法宜變也……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曰：練兵之法宜變也……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強。」(註三)薛福成不但主張變法，而且還提出了『鑄屯議』與『振百工說』等富國強兵的具體方案。對振興工業，在那時新政派中，他特別有見地，他以為富強立國的大本，在於百工的振興，在振百工說裡他說道：『泰西風俗，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爲體，恃商爲用，則工商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則工又兼士之事』，可見薛福成很有想努力建立一個資本國家的意向。張之洞則偏重在學的面，曾著有勸學篇來說明他的意見，在上海強學會序中，張之洞又指出中國的貧弱，在於缺少農工商學者，缺少軍事機械專家。當時這種變法維新的思想曾風靡一時，甚至那時像曾國藩，李鴻章等一班不惜投降外寇來腰斬民族解放運動的衛護名教之輩，也來隨聲附和。尤其是李鴻章且曾一時成爲新政運動的中心，正因為有這些權臣的參加，所以新政派的維新變法，就不是少數文人逸士在舞文弄墨，而確實有了實際的行動。如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設立製炮局；一八六四年南京設立金陵兵工廠；一八六五年在上海設立機器製造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設船政局；一八七〇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機器製造局；一八七六年設四川機器廠；一八八〇年在天津設立水師學堂，在南北洋設立電報局；一八八二年金陵成立火藥局；一八九三年漢陽兵工廠成立。同時和這些軍事工業相追隨而發展起來的，有關平礦務局和漢冶萍公司的開辦，鐵路的開始敷設。並

(註二)王韜變法中，轉引自晚清文選四〇一頁。

(註三)王韜變法中，轉引自晚清文選四〇一至二頁。

且官辦或官商合辦的輕工業也在萌芽，如在上海之織布局，紡織新局，華盛紗廠；廣東之縲絲局，織布局，武漢之織布局，火柴廠等。此外在精神方面，如一八七一年會李鴻章奏請派軍官赴德習軍械技藝等，也都不外說明當時進步官僚已意識到軍備改良的必要。然而他們這些所謂新政派總不能跳出他們認識的界限，他們缺乏明確的歷史觀念，不能理解社會進化的根本法則。因此，他們所能了解的新政，只是表面的槍砲、實業，只是皮相的富國強兵，而不能允許剝削關係的變革和中國禮教成法的改動。張之洞的名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最足代表那時一般士大夫的變法心理。因此，上述的軍用工業與軍事學習，根本就沒有廣大的一般產業與強大的新社會生產力做基礎，同時又沒有和全部的政治改革與軍隊改組配合起來，所以收效甚微。正因為沒有政治上的改革，以致當時浩大的國庫支出仍多浪費於王室的奢侈淫樂上，自然也就不能儘量供給新軍備的建設，所以甲午戰爭的結果，仍是中國慘敗。這樣一來，當時中國的所謂變法維新，就正如偉大的中國民族革命戰士與文學巨匠魯迅先生所諷刺的一樣：『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結果，使一般具有接近於資產階級意識的新官僚覺悟到沒有新的良好政治做基礎，單靠皮相的軍事建設還是不足恃的，於是戊戌改革的軒然大波就此展開了。

先是，一八八八年在上海已有廣學會的設立，以啓發中國文化，輸入泰西科學及圖謀中國之自強爲目的，這是中國科學文化的最早的啓蒙運動。其次是新官僚的強學會的組織，其主要分子爲文廷式、孫家鼐、張之洞等。一八九五年又有桂學會的組織，這是甲午戰爭失敗時出現的，其首創者爲康有爲及其弟子梁啟超等，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以改革政治爲目的，後來就成爲戊戌政變的策動力。這些

革新的小組織，經過報紙積極鼓吹革新運動，在全國發生極大的影響，引起各地紛紛組織各種改革團體，如桂林的聖學會，長沙的湘學會，蘇州的蘇學會，北京的集會學會與格致學會，陝西的陝學會，武昌的質學會，以及算學會，農務會，天足會，禁烟會等，都標榜着革新思想，與強學會相唱和。而桂學會就儼然成爲當時國內改革運動的中樞領導組織，其政治綱領亦隨之而日益具體化，及後遂有保國會的組織，其領袖亦爲康梁，戊戌變法運動就是在此組織之下開展起來的。

第三節 戊戌政變的經過及其評價

康有爲原名祖詒，是當時比較帶有資產階級意識的知識分子與官僚的代表，他和梁啓超、譚嗣同等既已有了相當力量的結合，復受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深感中國再不實行政治改革，實不足以救亡圖強。然而他們由於自己階級地位的限制性，又不願而且不敢採用徹底的革命方法，而只企圖以改良主義的方法實行從上而下來挽救中國的危亡，使中國富強起來。所以這些新官僚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革運動並不是去發動與組織群眾，領導人民革命去推翻舊的統治。他們只想說服統治階級，找尋一個開明的皇帝，經過開明的皇帝來自上而下的實行變法，來改造中國，使中國富強起來。基於這樣的一個立場，康有爲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就已開始提倡變法，他第一次以諸生伏闕上書批評中國的現狀，並提出補救的辦法。他在奏摺中反覆說明列強分割中國的危險，主張和日本維新一樣實行變法，並要求政府能够容納民意，這個奏摺資格不得上。至一八九五年康有爲又起草奏書，痛論改革救亡，集公車一千三百人簽名上書請變法，這就是所謂『公車上書』事件。當時康梁提出的主張，主要的是：一、扶助農業（務農）；二、發展手工業（勤工）；三、振興商業（惠商）；

四、監禁官員（監獄）。具體的辦法就是：裁撤冗繁員額，以抵充外商的壓迫；取消釐金，興辦重工業，獎勵殖產運動，建築國營鐵路，普及國民教育，改良科學制度，取消買賣官爵，訓練新式官吏，注意人民健康與衛生，改良刑罰監獄，建造軍用鐵道與軍艦，給兵士以現代軍事教育等。這些主張都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綱，都是自由資產階級改革的主張。當時這些新官僚與知識分子認識了如果中國不急速進行變法，便將走上滅亡的道路，他們企圖以這種主張，來說服光緒皇帝。

康有為的七次上書都爲堂官所阻，不得上。然最後的一次奏書（陳膠州事件者）在京師已鈔傳殆遍，給事中高燾曾協辦大學士翁同龢等獨抗疏荐之。於是康梁這些維新的提議才得到了年輕的光緒皇帝的同意與接受。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年）四月，德宗（即光緒）乃下詔國中，斥責守舊派的空言誤國，主張變法。詔下，德宗又召見有爲，深以廷臣守舊阻礙變法爲憂。有爲主張不必廢官爵，讓他們尸位素餐，而將行政責任委諸有革新思想的小官吏。於是德宗任用新黨的人，一時如梁啓超、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都各賞以卿銜。當時贊成變法的有禮部尙書李端棻，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庶吉士熊希齡等。自四月至七月間德宗督責京外大臣實行新政的詔諭，凡數十下。如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汰冗員，廣言路，保薦經濟特科人才，開辦京師大學堂及各種學堂，興辦銀行，設立鐵路礦務等局，廢祀典不載之寺廟，裁老弱無用之額兵等，所有這些，都是變法的具體政綱。

可是當德宗實行變法時，清廷守舊派的反動亦就隨之而起。他們忌妒新黨的得勢，唯恐自己的地位爲新黨取而代之，特別是滿族大臣恨新黨刺骨，而慈禧太后正是舊黨所擁護利用來壓服德宗與新黨的。所以當時朝廷儼然分爲兩派：新黨以德宗爲中心，時人稱爲帝黨；舊黨以慈禧太后爲背景，時人稱

爲后黨。兩黨鬭爭甚烈，而滿清整個統治實際上都掌握在封建地主、貴族、官僚手中，因之光緒皇帝的這些變法主張的命令始終沒有實行。這時德宗明知舊黨勢力太大，兼有母后做舊黨的後援，自己又手無寸柄，因與有爲密謀。譚嗣同建議利用袁世凱，奪榮祿兵柄。譚嗣同並親見袁世凱加以鼓勵，使他殺榮祿並派兵圍頤和園以除慈禧太后。（註四）因爲世凱原來亦是表同情於變法的人，故德宗深信不疑，詔見世凱，特賞侍郎，責成專辦練兵。不料袁世凱同情民主原是假的，回天津後竟將新黨密謀告知榮祿。榮祿一面檄調蔣士成軍駐天津，董福祥軍駐北京彰儀門，一面急馳入京告變。於是慈禧太后經過袁世凱對於維新黨的出賣，下詔幽禁德宗於北海之瀛台，捕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有爲之弟廣仁，殺之。時人稱爲六君子。康有爲，梁啟超則在禍變發生之前，已得德宗密詔逃走。於是反動勢力大張，凡以前附和及贊助新黨的官吏都革或囚或流，如張蔭桓、徐致靖之下獄，李端棻之遣戍新疆，陳寶箴之革職。取消一切新政，恢復一切舊制。在反動勢力的鎮壓下，戊戌政變就只經過一百天而完全失敗了，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百日維新』。當譚嗣同被捕殺前，尙留下悲壯激昂的說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與他那『衝決網羅』的勇敢精神，完全是相符合的。

戊戌改革運動只是曇花一現就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廣大的群眾鬭爭做基礎。當時雖然新官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贊助改革，可是人數很少，力量不大。整個滿清統治則掌握在反動勢力

（註四）譚嗣同見袁經過及對話，載在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見中國近百年史料初集四九三至五

手中，他們致力反對變法；康梁等所依靠的光緒皇帝既沒有掌握實權，稍爲有點兵力的袁世凱又是一個賣友的好雄，這種當然起不起反動勢力的錮壓。至於當時下層群眾的力量，又是這些維新派所看不見的，同時也是他們所害怕的。他們只祈望經過上層的統治來進行改革，至於如何去領導當時發展着的農民鬪爭，依靠群眾力量來實施改革，那更是康梁等所夢想不到的。當然，當時六君子慷慨就義英勇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不過他們的犧牲流血是離開群眾的，他們的赤血沒有和群眾聯結起來，這個沒有群眾力量做基礎的改革，只有走向失敗。

戊戌政變的失敗，證明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自上而下來改造中國，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是非常狹窄的。戊戌政變的失敗，就是中國改良主義第一次嘗試的破產。同時也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取得勝利，辛亥革命就是戊戌政變的改良主義的否定。

如果以日本的明治維新來和戊戌變法相比較，那末後者所以失敗，前者所以成功，乃在於：第一，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够獲得成功，是因爲當時日本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依其歷史的條件，不像中國那樣的對於大工業商品的頑抗，是因爲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已經較爲成熟，商品經濟已較普遍化，作爲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階梯的工廠手工業已經發展，在封建諸侯中產生了代表資本主義發展分子，依靠他們的力量，使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第二，在國際環境上說，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情形也不同，明治維新時，歐美資本主義還處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對於日本的染指還僅限於獲得在日本貿易的自由；同時，當時列強又爲俄國與英法土爲爭巴爾幹半島霸權的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與美國南北戰爭（一八五六——一八六五年）所牽制，不能集中力量向日本侵略，使日本統治階級得乘機進行順利的改革。而且日本還從事侵略鄰近的弱小國家，表現了自己的實力，乘這

種威勢來脫出了由先進資本主義諸國所加與的壓迫。第三，日本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是日本順利進行明治維新的一個附屬原因，日本是處於由西方至遠東航路的終點，也就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最後目標；當時列強正忙於侵略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對於狹小貧寒的日本之侵略自然較為放鬆，因而對於日本的維新也就沒有給予很大的阻碍。當然日本的這些有利條件，顯然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因而戊戌政變也就不能如明治維新一樣獲得成功，而必然遭受失敗。

有人將戊戌政變比之於一八二五年俄國十二月黨的宮庭政變，這是因為俄國十二月黨的政變是宮庭政變，而康梁的變法也正是如此。那時俄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農奴制度尚未取消。俄國當時一些留學生與急進軍官主張實行改革，組織十二月黨，企圖解放農奴，取消專制，結果是失敗了。康梁之主張變法與失敗原因也正與十二月黨的宮庭政變相彷彿。宮庭政變失敗時，十二月黨分子的英勇犧牲也正如六君子的就義一樣。同時這兩種事變的失敗都說明：如果單靠幾個先進的英勇戰士來實施改革，那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但俄國與中國的政治社會條件究竟是不同的，因此十二月黨的宮庭政變與戊戌政變也各有其特點。

誠然，戊戌政變是失敗了，但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上，也自有其進步的意義，這就是戊戌政變曾大大地促進了全國人民的新覺醒，在客觀上幫助了革命運動的發展。雖則戊戌代表人物如康有為等日益墮落到墳墓中去，但六君子的熱血却無論如何不是白流的。

第四節 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和特質

從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以來，國內便不斷發生了許多次的民族自衛自救運動，如鴉片戰爭後廣

東平英國的反英運動及太平天國時期上海乙首黨與外國強盜的英勇抗戰，便都是南方貧民與農民反抗外寇侵略之最原始的表现。戊戌政變前後，廣大的農民鬪爭在黃河流域，特別是山東、山西、直隸等省普遍的開展起來，農民的鬪爭騷動的進一步發展就是以後的義和團運動。這是北方農民、貧民自發的反帝國爭，它表现了北方被壓迫民衆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痛憤，曝露了帝國主義列強分割中國的真相。

戊戌政變後，滿清政府更加腐敗昏聩，同時外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亦更厲害起來。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〇〇年即義和團起事之前夜，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所開的商埠已達五十一處之多。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帝國主義商品輸入由五千一百萬兩增加到二萬六千四百萬餘兩；由出超二百萬餘兩轉來至入超六千九百萬餘兩，於是中國現銀幾全爲帝國主義所刮去，以致中國的金融完全破產。而且此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已進到更高的形式，已經由爭奪市場收刮原料更進而向中國移植資本。這裡最明顯的表现，便是搶奪鐵路建築權，以造成各國的勢力範圍，因爲鐵路對於整個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帝國主義支配了中國的鐵路，便以鐵路爲支配鐵路沿線一帶的政治經濟之中心。其他工業方面，當時帝國主義亦已開始在中國設廠，比如僅紡織一業，英國有怡和（設立於一八九五年），老公茂（設立年同上）；德國有瑞寶（即後英之東方，一八九五年設立）；日本有上海紡織有限公司第一廠（一八九六年設立），第二廠和第三廠（均設立於一八九六年）。這些紡織工廠當時規模雖還不甚宏大，然比起中國當時民族工業（如恒豐、三新等），始終是佔優勢。在礦業方面，帝國主義的勢力也是非常大的，許多重要礦山採辦權都歸他們掌握。在財政經濟方面，那時帝國主義者完全是獨霸形式，這正如列寧在論帝國主義一書所說：『金融資本已經真正把它

的金融網羅布到全世界了，在此場合，設置在殖民地的銀行及其支店，演着極重大的任務。那時中國的舊錢已漸破產，新式銀行尙未有一家成立，而帝國主義銀行則已有麥加利（一八五三年設立）、匯豐（一八六五年設立）、有利（一八七五年創辦）、東方匯理（一八七五年設立）、橫濱、正金（一八八〇年設立）與台灣（一八九五年）等，對於國外的一切通商匯兌，固然完全由這些銀行包辦，即國內一切金融，尤其是商埠所在地，亦幾完全受他們的操縱。他們還在中國發行鈔票，又對滿清政府實行政治借款，從中取得重利。我們只看從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四年之間，外國帝國主義者直接對滿清政府借款就有下列數目：

借款類別	起 債 期	債 額	年 利
匯豐銀借款	一八九四年	一、六三五、〇〇〇鎊	七分
匯豐金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麥加利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瑞記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俄法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鎊	四分
英德第一借款	一八九六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	五分
英德第二借款	一八九八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	四分五厘

以上借款合計起來，爲四千九百四十五萬五千鎊，以每鎊值華幣十元計，則爲四萬九千四百五十五萬元，利息又從四分到七分，超過尋常利息二三倍，這種巨大借款與前面所說貿易入超及當時大批賠款，直接間接都要歸中國農民手工業小商人負擔，其中極大部分特別要落在農民身上。所以全國尤

其是北方窮苦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之生活困難與失業增加，和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成正比例發展。加以帝國主義又在中國取得許多政治特權，帝國主義更用領事裁判權等各種不平等條約，加緊壓迫蹂躪中國。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亦非常可怕，傳教已成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重要武器，我們只要看一看德國帝國主義者利用傳教侵略中國的一點事實就可明白：

『先是俾斯麥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對於加特力教徒盡剝奪其政治上之權力，凡不服從政府命令者，皆嚴重處分之，因此當時教徒多逃往他國。後來有加特力教安察爾和富治南特美士於一八七九年至山東傳教，不久安察爾竟在山東南部取得牧師長，甚有勢力。適其時值德國探險家維斯曼烏爾夫之徒，稱揚傳教事業，於取得殖民地大有作用。俾斯麥聞之，於是即回復加特力教之權力適安察爾歸柏林，他又接見安察爾，厚加禮貌，與之約束，並說德國今後對於傳教事業，當加以熱心保護。結果因安察爾，德國竟取得青島膠州灣以及山東一切特權。』（註五）其實不獨德國爲然，其他英法意等帝國主義者無一不如此，我們現在另外引一個描寫法國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記載來看看：

『犧牲者的血是法國在中國侵略的種子。法國用教會和本地的教徒作挑撥的代理人，遭禍和犧牲是其政治上的收穫。英國商業的優勢之對於英國，猶之天主教徒的保護權對於法國一樣，因此他們地位的影響，對於中國人差不多相等。但是法國從宗教的材料較英國從商業的材料所得利益更多十倍。在法國政府卵翼之下，天主教已經成爲無上的威權。不願本地的法律和習慣，宰制

（註五）見清朝全史第四冊。

異教鄰舍，超越所在國的法權，無論何時，教徒與非教徒有爭論，不管爭論的是非如何，牧師就立刻爲之袒護。牧師如果不能恐嚇地方官，強迫給權利與教徒時，他即自己作當事人，控告於法國領事。如此無法無天，是非的真意完全顛倒了。在列強方面，這樣的干預自必跟着而來，天主教徒由此亦更加橫蠻而腐敗。當法國教會官應可以壓迫人民時，本地的教徒亦更變本加厲的恐嚇。

1. (註六)

義和團事變之前，各帝國主義利用傳教以宰割中國之事特別盛行，當時自西江、揚子江流域以至於山東、直隸、東三省各地差不多無日不發生教案。同時，滿清政府又正厲行反動政策，拼命媚外國結外人之歡心，以和緩其責難，保護外人及教堂之嚴令紛如雪片的頒佈到各縣各鎮鄉，因此遂逼成義和團事件。

由此可知，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從中國割去一塊肥肉，以擴大其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用武力鎮服中國的反帝國爭，以遂其自由侵略之願，而緩解於帝國主義的暴力前的滿清政府又沒有能力反抗列強的侵略。正因爲如此，中國飽受了帝國主義侵略的痛苦的人民才燃燒起仇恨帝國主義的憤火。造成這種憤火的根源，就是帝國主義的偵探——牧師 Iswaha 自己也覺得沒有方法可掩飾，他在對義和團暴動所著 *China in Convulsion* 一書中說：

『許多「文明」人逐漸地進攻中國內地，中國的無數受禍者自己不明白受災害的原因，好像

(註六) 見英國牧師 Iswaha 所著 *China in Convulsion* 一書所引 A. R. Colquhoun 所著 *Overt and*
China 一書中批評天主教的一段。

日本農民被地震所造成的海水或海洋沉落所起的潮水之淹沒一樣。可是有許多人很知道在外國商業未進來擾亂舊秩序以前，在普通的年歲裡是能够吃够穿的。現在各方面都缺乏，覺得前途一天天地可怕，像這樣的經驗，在活動的方面，能怪中國人對新秩序（帝國主義侵略）感覺很深的滿意麼？

『火柴從外來，洋油及洋油所帶來的各種洋燈，代替了中國工業的大部分，對社會有極大的影響，此處不能詳說。人們讀了輪船公司的廣告，棉紗貨商業在中國怎樣興盛，此種商業從廣東到牛莊，將來極可樂觀……但是沒有一人能讀到此種商業的發展，實大影響於中國生產棉花地面上之無數萬人民。這些人民以前靠着紡織十五寸寬的布來謀極低度的生活，一尺布須費兩天勞力，在市場上把布賣去，買進能够一家最低度的生活需要品，餘則再買些棉花來繼續紡織。但是現在呢？外國棉紗貨有很好的「樂觀」，可是土貨則完全失掉了它的市場，從那時到現在都是如此。……費力的紡紗工作沒有利益了，又沒有別的生產來代替它。』

Hopkins 先生這樣描寫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之後，使中國廣大農民手工業群眾窮困悲慘的情形，自然還是掛一漏萬的，實際的情形必然比他所描寫的還要可怕幾千百倍。特別是北方數省廣大農民及已失地失業的游民群眾，他們眼着着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霸道，教堂教徒氣焰薰天，英法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洋貨充斥，物價飛漲，政府因仿辦洋槍洋砲而增加租稅，覺得自己的生活一天艱難一天，失業的一天天多起來，災荒一天天厲害起來（義和團事變之前，北方數省有很嚴重的災荒），而政府却無一點方法補救。所有這些情形，便是造成他們極深刻的憤火的來源，便是造成義和團運動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的憤懣過於深刻，而且又是農民之原始暴動，所以事變情

勢非常嚴重。據說當山東、直隸各處農民投入義和團及天津、直隸鄰近的義和團進北京之時，簡直瘋狂的一樣，人數非常廣大。據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派來鎮壓暴動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他那本拳亂筆記中說：『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註七）

義和團是由義和拳得名的。義和拳一名梅花拳，金鐘罩，始於清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與白蓮教的遺黨有關係，在它的歷史上就帶有反抗外族壓迫之特性。最初它的口號是『反清復明』，清政府亦下令嚴禁，犯者處死刑，然民間私相傳授拳術仍繼續不絕。光緒間，義和拳彌漫於山東之清平、館陶、冠縣等地。甲午戰後，一方面因為中國備受壓迫，同時復因他們在山東鬧過幾次教案，便更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這種『滅洋』的主張博得了廣大民衆的同情，於是愈集愈衆，寔成爲一勢不可遏的反帝運動。義和團爲什麼拋棄他那『反清復明』的本來面目，一變而爲『扶清滅洋』的運動呢？爲什麼本來反對滿清的義和團反而與滿清政府結合起來呢？這裡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中國到了義和團運動時代，已經變了一個局面，最高統治者已經不是滿清政府，而是國際帝國主義者。由於中國民族與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國內矛盾便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當時，農民群衆最迫切的要求是反抗那帶痛苦給他們的『洋人』，所以義和團的組成分子雖然和過去白蓮教差不多，大多數是農民群衆，其次是手工業者，失業游民和少數知識分子，但是義和團組成分子的社會性質已經和白蓮教時代不同。這些義和團的群衆已經深深體驗到洋鬼子（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滋味，在他們眼中，只有『可恨的洋鬼子』、『該殺的洋鬼子』。所以只要有人說『殺洋鬼子』，『我們可以

（註七）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中譯本一四四頁。

有方法殺洋鬼子』，『我們可以堵住洋鬼子的槍不能開放』，他們聽了，直狂跳起來，什麼都不管了，只一心一意『殺洋人去』！哪裡還管得什麼反清復明和受人利用呢？這就是義和團變反清復明運動爲扶清滅洋運動的根本原因。

同時，因爲那時的中國，已經開始成爲資本帝國主義宰割之下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略一天天變本加厲，滿清政府已經沒有方法可以抵抗他們。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滿清政府一切對外國帝國主義都節節讓步屈服了，可是外國帝國主義仍對他們要挾備至。滿清政府固然害怕義和團，但是也很外國人；而且他們覺得如果能够利用他們去反對洋人，便可轉移他們那反清復明的意志。政府中雖然有很多人（如直隸總督榮祿等）反對這種『危險的政策』，但是端莊、毓賢、剛毅、慈禧輩竟利用了義和團。尤其是山東巡撫毓賢因沂州教案被斥，恨洋人刺骨，乃欲利用義和團報復，並貽書朝貴，謂『拳匪皆爲義民，且有神術可用，今國勢日衰，民志不伸，若再殺拳民，不啻自翦其羽翼。』義和團得到滿清政府的同情與援助，聲勢更加大起來，以後居然進京圍攻公使館，打死了德國公使克林（Kluckhohn）與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

第五節 八國聯軍之後與列強的衝突

這樣嚴重的事變，使帝國主義更有所藉口以進攻中國，並且組織了八國聯軍，調動大兵到北京，天津來剿滅他們認爲『破壞文明』的所謂『拳匪』，實際是企圖乘機來瓜分中國。聯軍由英俄德法美意奧日八國所組成，初各國軍艦已雲集大沽海口，凡四十七艘，聯名致書於守將羅榮光，限期交出砲台，榮光拒之，五月二十一日遂開戰，榮光戰死，大沽陷。英提督西摩爾統各國兵入京，至楊村，被

阻折回。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下詔與各國宣戰，命各省招義和團助戰。聯軍則改由德人瓦德西爲統帥。時榮祿在天津迭次來電報捷，太后信以爲真，其實當時各國援軍已紛集，正在大規模攻擊天津，提督聶士成力戰死，六月十八日天津遂爲聯軍攻陷。天津敗報至京，朝廷紛亂已極。聯軍既據天津，壓得北京使館乞援之信，遂大舉分路進攻，清軍節節敗退，榮祿兵潰自殺，楊村乃失守。聯軍更進據通州，陷之，欽差大臣李秉衡自戕。這時義和團與清軍攻使館雖五十日之久，仍不得下，聯軍遂入京，擊敗甘軍董福祥兵。太后挈帝后狼狽逃出，至山西。復聞聯軍將入晉，復逃至陝西。北京戰局既開，東南各省之總督巡撫，均不與聞戰計。山東爲這次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發源地，巡撫袁世凱，力主剿匪，部下武衛左軍之在直隸者，都召回本省，任『保護外人，剿討拳匪』之責；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騫，互相協議，各督一致以正式公文通知上海領事團，告以『無論北京成如何形勢，本省內之和平秩序與外國人條約上之權利保護不怠。』領事團欣然承認上述數省爲『中立地』。(！)於是東南各省民衆之以暴動來反抗帝國主義以與北方民衆響應者，終因封建軍閥總督『保護』帝國主義『不怠』，未能成爲一種運動。

聯軍入京，不消說首先是大肆殺掠。例如聯軍統帥瓦德西就承認：『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現在各國互以搶劫之事相推諉，但當時各國皆曾經澈底實行共同搶劫之事實，却始終存在』。(註八)瓦德西又描述各國搶劫的方法，至爲詳盡。中國這次損失最重大的，要算是大宗的文化古物。今日各國大圖書館、博物館都

充滿了中國大批的珍貴圖書與儀器，便都是庚子年從中國搶去的贖物。至於平民遭受劫掠的數目，那就更是不可數計了。聯軍不但肆意搶劫，而且姦淫殺戮，無所不爲。例如瓦德西自供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爲數必極重大無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對於此次戰事有罪之人，反受損失極微。又因搶劫所發生強姦婦女之殘忍行爲，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亦屬不少』。（註九）瓦德西供出了帝國主義軍隊的強盜行爲，說明了自命爲『文明國家』的帝國主義是怎樣對中國肆行殘暴的掠奪蹂躪。此外還有俄國駐北京的財政代表鮑何啓諾夫在一九〇〇年八月致俄國財政總長的電報說：『聯軍炸城之後，便佔據了皇宮，現在差不多沒有事了，但是中國人還非常反對，非常憤恨外兵。因爲軍隊壓迫中國人民，搶劫中立的無辜的民衆，並且搶掠得比拳黨更利害些。其中以日本人爲尤甚，他們自居爲北京的主人翁，分配步哨，佔領國庫，雖是其中的錢不多，而日本人完全收歸己有』。（註十）這就是所謂文明國所演的暴行，其中尤以日本帝國主義的面目最爲猙獰，今日日本法西斯軍閥在中國各淪陷區域所行的殘酷的劫掠與屠殺，不是更有甚於庚子年在北京的暴行嗎？這重重的血債是非用血來還不可的。

當聯軍攻入北京時，俄國帝國主義便乘機擴大了它在滿洲的侵略。一九〇〇年七月間海蘭泡俄兵假道齊齊哈爾至哈爾濱保護鐵路，黑龍江將軍壽山拒之，俄兵遂與瑗璋副都統鳳翔開戰，鳳翔陣亡。八月俄軍佔大北嶺，旋攻陷齊齊哈爾，壽山自殺。後來長春、遼陽都先後爲俄軍攻破，東三省遂全爲

（註九）同書五十五頁。

（註十）見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所引證。

俄軍佔領，俄帝國主義以十八萬重兵鎮之，更想進據關內外鐵道，衝入北京。這自然引起了其他帝國主義的畏忌，聯軍在英德勾結的局面之下，急派重兵據山海關，爲的是要遏止俄軍南下。英國自來就是與俄國勢不兩立的，至是兩國衝突更尖銳化起來，幾至火併。瓦德西對於這一點曾有很明晰的曝露：「余之行動，頗爲英俄兩國因互爭直隸勢力範圍而生之極端齟齬情形所厄。該兩國軍隊之緊張程度業已達到彼此相見以兵之可能」。(註十一)又說：「英俄兩國之衝突，已達極盛之點。兩國方面，尤其是英國，各皆增派軍隊赴津。英國艦隊已由揚子江口，駛往大沽」。(註十二)很顯然的，英俄是爲了分贖而起衝突。當時英國欲在中國取得更多的利益，劃定更大的勢力範圍，而俄國欲由東三省之佔取進而衝入關內以干涉分割英國之勢力及利益，這是英俄衝突的主要契機。德國在三角的對立關係中，雖與英德結成聯合戰線以抗俄，然英國之間亦有衝突，不能完全協調。瓦德西自己曾說：「現在余與俄國幸而脫離，但對於英國，一定還有許多難題在後」。可見帝國主義只能彼此利用，而絕不能誠意的合作。實際上，德國的策謀是要引起英俄兩國的衝突，好從中取利，所以在鐵路方面極力挑起英俄的仇視。不僅英俄因爭奪在華利益衝突甚烈，而且英法俄日以及美日與德國的衝突也都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以後日益尖銳化。瓦德西說：「英人與法人之間，亦不相和。」蓋英法在非洲的衝突至是已展開而爲分割中國的鬭爭。此外，日本看見俄國着着奪取滿洲，極其不安，因派大兵前赴朝鮮，這是俄國所引爲患的。例如俄國皇子恩加里切夫在對瓦德西的談話中，就對日本此舉表示不能容忍，

(註十一) 見瓦德西參亂筆記一六九頁。

(註十二) 同書六五頁。

這就預伏了日後日俄戰爭的張本。至於美國則仍高唱門戶開放主義，一九〇〇年七月美國國務卿海伊（Hay）在致列國的通牒中，仍斤斤以此爲詞，要求『保護國際上及條約上給與各國的利益，防護在中國全土的貿易平等原則』。但美國當時已佔有菲列濱，而計劃向中國海面擴張特別勢力以與英法日諸國抗爭了。

當聯軍攻入北京時，事實上成立了一臨時的軍事獨裁政府，北京、天津已完全置於帝國主義的直接統治之下，這個統治是建築在中國民衆的鮮血與骷髏之上的。起初帝國主義是想在一攻下北京之後，即直接瓜分中國的。而且德英就主張瓜分最烈，試看下引瓦德西供詞，即不難窺見其中消息：『關於近年以來時常討論之瓜分中國一事，若以該國現刻武備之虛弱，財政之衰竭，政象之紛亂而論，實爲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現在所欲問者，只是各國對此問題究取何種態度？俄國方面，因佔滿洲之故，在最近期間，當可心滿意足。假如現在在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英國取得長江流域一部分，德國佔據山東，則中國方面實無力加以阻止。因此我們對此問題，必須十分注意，倘一旦列強對於瓜分之事，果有妥協之望。』（註十三）又說：『甚望能將該省（指山東）大部分均置諸自己勢力之下，以作瓜分中國時我們應得之部分。』可是這種瓜分，在當時總算沒有實現，這就是因爲帝國主義列強相互衝突，關於這點又是瓦德西給了我們以確切的報告：『但余對於此事（即指瓜分中國之事——崗註），却認爲絕對不能實現。英國極不願意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日本方面對於德國之據有山東，亦認爲危險萬分。各國方面對於英人之壟斷長江，認爲勢難坐視。至於美國方面，更

（註十三）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一四一頁。

早已決定，反對一切瓜分之舉。俄國方面若能聽其獨佔滿洲，毫不加以阻撓，則該國對於他國之實行瓜分中國，當可袖手旁觀；蓋彼固深信，各國對於此事，彼此間必將發生無阻糾葛故也。」（註十四）各帝國主義都爲了自己的利害打算，而不願別國在中國妨礙自己的利益與發展。美國之所以反對瓜分，亦就是因爲自己在中國沒有勢力範圍，不能從英法俄日德諸國的口裡嘔出一塊來分給它，在地理上它又距離中人最遠，不利與他國相較；反不如實行門戶開放，它有較多染指的機會，所以它不願意中國被瓜分。此外，當時各國革命政黨與進步報紙的斥責反對，亦是列強沒有實行瓜分中國的有效因素。

第六節 辛丑條約與拳亂事件之評價

慈禧及德宗等既抵宣化，乃下了一個罪己詔。後再到山西大同府，命慶親王奕劻回京，會同李鴻章辦理一切事宜，旋抵西安。聯軍代表力主先懲辦主持亂黨之人，然後開和議。德使亦稱德皇訓令，非交出四兇，不准停戰。所謂四兇，即指端王載漪，董福祥，莊親王載勛及剛毅。至是諭將載勛等革去爵職，剛毅、趙舒翹等交都察院吏部議處。倭邸被殺德國公使克德林，日本書記官杉山彬。閏八月清帝再授奕劻爲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妥商和議，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各國對於議和的態度主張不一，如俄國主張使臣既脫險，當撤兵議和，美國亦贊成之；英德法奧則表示反對。這是因爲俄國已佔領滿洲，知各國不許其更進，不如先議和撤兵，既可阻各國之分割中國本部，又可減列強對於滿

流佔領干涉之威脅。美國橫豎因爲沒有勢力範圍，利益範圍之可言，和後反可恢復市場通商，瓜分中國對於美國是無利益可言的。英國是要干涉俄國之侵滿，並堅持取得長江流域，極力阻和議之進行；德國藉口公使被殺，欲奪取山東，並利用統帥的地位繼續進攻，取得更多的利益；法國亦欲伸展其勢力於北方，利於戰事擴大。如此，列強之間齟齬衝突，即無法再協同動作，而且義和團暴動已經被它們撲滅，滿清政府已表示低頭屈服，所以就在一九〇一年議和，訂立辛丑條約。從此，北方的國防，如大沽砲台等完全撤廢；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駐紮帝國主義的駐防軍；北京使館界變成了外國領土，東交民巷變成了中國太上政府的堡壘；英國取得海關監督權，中國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即所謂庚子賠款。

悲壯熱烈的義和團暴動，結果是被葬送於血海中了！這一次事件，決不是什麼少數無知『拳匪』的胡鬧，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後中國革命的先兆。雖然他們被滿清政府利用了，可是它還是表示舊中國崩潰的一個伏流的波浪。後來一般中國社會，附和帝國主義『二毛子』『三毛子』的反宣傳，把義和團事件看成是『野蠻的排外』，自然是很大的錯誤。其實真正野蠻的倒不是義和團，而是帝國主義者自己。世界革命的偉大導師——列寧，當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發生時，曾在火星報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中國之戰爭，充分暴露了沙皇及其他帝國主義的陰險。他說：

『我們試想中國人爲什麼反抗歐洲人？英人、法人、俄人，日人要肅清中國的叛亂究從何產生？主戰者（帝國主義者）倡言黃種仇恨白種，中國人嫉視歐洲文明。誠然不錯，中國人是嫉惡歐人，可是究竟爲什麼要嫉惡歐洲人，中國人所嫉惡的又是哪一種歐洲人呢？中國人並不仇恨歐洲人民，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中國人所仇恨的乃是歐洲的（當時還應加上：日本

的（——附註）資本家如代表歐洲資本家的政府（當時日本政府也在內——附註），他們矜誇西方的「文明」，到中國肆意誑騙和竊盜虐待此等貪慾無畏的歐洲人在中國，豈有不使中國人嫉惡的嗎？他們對中國開戰乃為掠奪權利，為要自由販賣鴉片權，藉以昏迷中國人民，利用基督教的假面具藉以達到盜竊政策之實，這樣豈有不使中國人嫉惡的嗎？此種盜竊政策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固早已實行於中國，而今又有俄皇專制政府參加其中。他們不過沒有公開瓜分，而像暗中的偷兒一樣，他們搶掠中國好像偷兒竊屍體，但是如果這個假屍起來抗拒的時候，則就立刻如對待野獸般的攻擊，把樹林也燒了，屠殺沒有武裝的人民，同時却大聲疾呼去制服野蠻的中國人。

『中國的民衆所受到的痛苦是和俄國民衆所受到的痛苦一樣的。他們從亞細亞的專制政府一直侵入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壓迫所作的罪惡感受到痛苦，這種專制政府是從飢餓的農民榨取租稅，以武力鎮壓一切自由解放的運動。』

列寧在這篇評論裡，把帝國主義侵略及分割中國的陰謀與罪惡以及義和團運動產生的原因，都給了很深刻的分析。列寧的論斷完全符合事實，當時各國帝國主義派來剿滅拳亂的八國聯軍，簡直在北京、天津大肆搶掠，這種搶掠的情形，甚至就是聯軍統帥瓦德西也無法加以否認，上節已經引證了一些，為使讀者留一更深刻的印象起見，現在再補引一段如下：

『從大沽至天津之間，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種不可描寫的荒蕪破碎，據我在津沽路上所見，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頹垣廢址，塘沽係五萬居民之地，已無華人足跡，從此地到北京之一段，我的參謀長 *Kehwa zho* 少將，曾兩次經過其地，據他報告，凡軍隊行經之地，但見其一片淒涼荒廢而已。即北京自身，亦因燒搶之劫而大受破壞，失所流離之民，據估計約有三十萬人，但

實際上似或多於此數，散居於該段旁邊，大半均在露天之下，在現刻天氣良好之際（瓦德西寫這個報告的時候是九月二十九日——崗註），或者可苟延幾時，至於飢荒疫病之必先後繼至，實已毫無疑義。我相信此種無居無食之災民，必將使附近居戶，咸陷恐遭搶掠之不安狀態，或者此項災民竟自投身拳黨，我因此之故，遂以爲如此行軍，則只能多多製造拳黨，且其製造之數，當遠較戰前剿殺之數爲多也。」（註十五）

帝國主義強盜自己『製造拳黨』，同時又當他『匪徒』剿殺，這就是帝國主義口中的『文明』，同時也就是義和團事件的真相。有人說，假使這些『匪徒』不這樣胡鬧，八國聯軍既不會來，辛丑條約也不會訂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義和團是少數無知愚民做的事，外國人不應該將這種責任和罪名歸到全中國人身上，使全國人負擔這樣鉅大的賠款。這種意見完全是受了帝國主義宣傳而且是不顧事實的謬論，他們簡直連帝國主義劊子手瓦德西都不如，因爲連瓦德西都不敢否認『拳黨』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義和團事件，實際上就是當時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這種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自然，義和團運動本身包含着很多的錯誤和缺點，他們得不到別的進步階級做領導，於是就不可避免的被封建社會的迷信神權所支配。他們拒絕一切洋貨，拒絕並且反對一切科學文化，他們主張『國粹』，相信五行符咒；他們迷信拳術符咒可以抵抗鎗砲，他們盲目服從所謂『大師兄』『二師兄』，他們被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思想所蒙蔽，結果竟被封建貴族所利用。然而無論如何，義和團運動究竟是一種群眾的運動，『凡屬群眾的運動，起初必然是混沌的，因爲它總

（註十五）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二八至二九頁。

搖擺於許多矛盾之間，群眾思想往往是缺乏明顯性和凝結性的。」（恩格斯）義和團運動實在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而且是失業群眾的暴動。在義和團運動中，還沒有一個先進的有組織有力量的階級做領導，因此不能不歸於失敗。義和團這一原始的農民暴動，雖然有他本身的弱點，雖然他被滿清政府所利用，打着『扶清滅洋』的尊皇口號，不免有保護舊制度的反動意味，雖然被國際帝國主義強盜——八國聯軍血葬了，可是仍不失為現代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悲壯的一頁。

第六章 辛亥革命

第一節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和鬥爭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既獲得了許多特權，取得了對華投資的保障，便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與政治侵略。在中國方面，可以說是已爲國際帝國主義者所征服，自辛丑條約締結之後，從前輕視外國人的心理，而今已一變而爲畏懼外國人的感覺了。因爲在聯軍入京以後，他們對於義和團的報復，固然無所不用其極，而尤其是在辛丑條約裡面，直把中國束縛得周全緊密，絕不容有所迴旋。首都要地絕無屏障，則外國權力可以操縱自如；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則中國財政將長久受其桎梏。而且迫令清廷，曉諭全國各地，嚴禁一切『排外』事項，如果地方官奉行不力，卽革職永不敘用，更足使一般人爲之寒心，不肖者轉而媚外，相習成風，這就使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略得以大膽進行。至於侵略方式，則前面業已說過，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之一就是輸出資本。辛丑條約後，帝國主義列強便更積極向中國投資。除了政治上的投資外，便是帝國主義者直接在中國設立工廠，並經過各種方式，奪取了中國各地重要的煤礦鐵礦，使之在外資支配之下（如英得開平煤礦，日得撫順煤礦，鞍山鐵礦等），另一方面就是在中國建築鐵路。這是爲了控制每一勢力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爲了便利於帝國主義輸入商品，輸出原料，運輸軍隊以鎮壓中國的反帝運動所必需的。

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築鐵路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帝國主義用自己的資本開辦，直接投資經營的，如

中東、膠濟、滇越鐵路等；另一種就是名義上由中國借外債建築，實際上權力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裡的，如滬杭甬、京漢、京奉鐵路等。中國借款建築鐵路的條件簡直是駭人聽聞的剝削，外國資本家根據鐵路條約，不僅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主要的來路，就是中國實收借款數較名義借款額爲少。通常如借一萬元，實收僅九千元，但利息不按九千元計算，却按一萬元計算，借款當然要擔保的。此外建築鐵路的資本國還可取得代購建築鐵路材料的一切權利。這樣，借款的銀行，不僅獲得利息，而且在購買材料中，又可以賺到不少的錢。同時，鐵路的管理權，實際仍落在外人手裡。雖然中國政府可以委任督辦職員，但實際管理者不是那些督辦，而是外國工程師，一切重要職權大部分都操縱在外國人手裡。此外還有更特別的，就是當中國政府不付給利息的時候，鐵路就歸建築人所有了。這就是說，若是中國政府無力償付利息的時候，就拿這條鐵路的財產來抵贖。僅僅到後來中國政府才變動了付債的方法，用關稅的收入來擔保借款的付還。上述這種建築鐵路的國外借款，到辛亥革命時爲止，約達十五萬萬元。其中有許多鐵路借款移作他用，使鐵路沒有建築起來，這些負擔都加在中國民眾身上。

帝國主義不但經過鐵路來侵略中國，同時又依靠河道來發展航業，建立許多輪船公司，如英之怡和、太古，日本之日清、大連等。

至於辛丑條約後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開設的銀行，則更如雨後春筍。這樣，帝國主義就經過它資本雄厚的銀行來壟斷中國經濟命脈，因爲無論軍事的、政治的或實業的借款，帝國主義者都經過它們自己的銀行。並且組織銀行團，以聯合的金融勢力，來束縛中國的財政，進一步監督中國財政。

所有這些，都說明辛丑條約後，帝國主義者怎樣向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與政治侵略，然而

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爲爭奪中國而鬪爭，在辛丑條約後也不但沒有減輕，而且更趨於尖銳，蘇聯共產黨（波）歷史簡要讀本對於這一點有很精闢的分析，茲引一段如下：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各帝國主義國家即開始加緊爲爭奪太平洋上的統治權，爲瓜分中國而鬪爭。沙皇俄國也參加了這個鬪爭。在一九〇〇年，沙皇的軍隊聯合日本的、德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軍隊，以空前殘暴手段，鎮壓了在中國的人民起義，而這個起義底鋒芒是反對外國人——帝國主義者的。還在這時以前，沙皇政府便強迫中國以遼東半島及旅順口砲台讓給俄國。俄國獲得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的權利，北滿方面的鐵路——中東路建築成功了，並爲保護該鐵路而把俄國軍隊開到北滿去。北滿被沙皇俄國用武力所佔領。沙皇政府底勢力逼近高麗了，俄國資產階級會製定在滿洲成立「黃色俄羅斯」的計劃。沙皇政府在遠東進行侵略中，碰到了另一個強盜——日本；日本這時已很快地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國家，並同樣企圖在亞洲大陸施行侵略，首先是佔領中國。日本也如沙皇俄國一樣企圖佔有高麗和滿洲，日本在當時就已夢想佔領庫頁島和遠東。英國害怕沙皇俄國在遠東之加強而暗中贊助日本。俄日戰爭逼近了！尋找新市場的大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地主階級推動沙皇政府去進行這個戰爭。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戰，而首先開始了戰爭。日本既在俄國設有良好的偵探機關，所以它知道，在這個戰爭中的敵人將是沒有準備的。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不經宣戰而忽然襲擊旅順口的俄國砲台，並使駐在旅順口的俄國海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俄日戰爭就是這樣開始了的。」（註一）

（註一）見該書莫斯科外國文書館出版局中譯本六四至六五頁。

這裡，爲使讀者對於事變的發展，有更清晰的了解，對於當時滿洲問題與英日同盟及俄日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還應加以簡明的補充。

當義和團事變初起之時，俄國以保護滿洲鐵路爲口實，即派軍隊進迫滿洲。但爲免除各國疑忌起見，俄皇曾於一九〇〇年八月對外宣言，一俟滿洲秩序恢復，俄國即行撤兵，斷無佔領滿洲之意。其後俄軍次第佔領滿洲全部，乃欲乘機與中國締結特別條約，以期收得滿洲的圓滿利益，然後撤兵一部。一九〇一年二月，倫敦外交界喧傳中俄之間，已有密約成立，其中規定，俄國駐滿軍隊，今後應留一部，且將滿洲門戶封鎖，置於俄國保護之下。此消息傳出後，各國輿論大譁，紛向中俄提出質問；其結果，中國以各國反對爲辭，拒絕批准，俄國以形勢不佳，亦只得聲明廢棄之。是年九月，辛丑條約成立，義和團事件告終。俄國以佔領滿洲，漸次失其口實，更急急於實際利益的取得，於是中俄第二次密約，又喧傳於是年十一月協商妥貼。此約內容，外間所傳各有不同，但其要點則爲：（一）俄國以兩年爲期，撤退滿洲軍隊；（二）今後中國軍隊，須用俄國將校訓練；（三）俄國將牛莊鐵路交還中國，而附以自後該鐵路不得受他國干涉，英日兩國軍隊不得由此鐵路輸送，將來中國若建造此鐵路之支線須先得俄國之同意等等條件。此消息傳出後，各國反對如前，擾攘多日，又以不得批准而罷。

以上中俄兩次密約，雖均未得成立，然而俄國對於滿洲的大慾，則已深予各國以不安，而以英日兩國爲尤甚。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對外發展的目標，首在朝鮮滿洲；一八九五年中日締結馬關條約，日本不僅截斷了中國與朝鮮的宗主關係，並從中國奪去了遼東，日本上下，爲之狂喜，而不料忽有俄國出面干涉退還之事。此中屈辱，日本豈能去懷？而且自從日本退還遼東以後，俄國自身對於滿洲的侵略，更加急進；並有據滿洲以爭朝鮮之勢。如一八九八年的租借旅大，一九〇〇年的進佔滿洲，都

是大刀闊斧的行動，日本於此，當然更難坐視，早準備在外交上與軍事上抵抗俄國，因此急要找一個同盟國以爲己助。而當時與俄國立於對抗地位的是英國，所以在拳亂事件中，日本卽有親英的傾向。在英國方面，則英俄勢力處處衝突，歷數世紀如此，爲人人所共知。現在俄國勢力，在滿洲的過渡膨脹，固與日本大不利，而同時亦足使英國在遠東的局面發生動搖，爲英國所忌；且當時俄國對西藏亦有所活動，更非英國所能容忍。於是一時英日兩國的對俄方針，遂不期然而然的趨於一致，一九〇二年一月乃有英日同盟之成立，締盟約如下：

(一) 兩締約國相互承認中韓之獨立，若因他國侵略行爲或因中韓兩國自起騷擾致妨礙締約國之利益時，兩締約國得執行必要手段；

(二) 兩締約國之一方若與他國交戰時，他一方須嚴守中立，並阻止第三國與敵國同盟；

(三) 若他國與敵國同盟與締約國之一方交戰時，則他一方卽當出兵援助；

(四) 兩締約國無論何方，若不與他一方協議，不得與第三國締結妨礙同盟國利益之條約。

此條約對於中國乃至對於國際，關係均極重要。第一條雖以承認中韓兩國獨立爲名，實則欲將中韓兩國，尤其是中國，置於英日兩國共同控制之下；而將其他各國，特別是俄國，排除於英日兩國利益所在地之外。第二條規定嚴守中立事項，則爲未來之俄日戰爭早作準備；日本於此，不僅確定英不助俄，且可利用英國的海上轄境，以妨礙俄國的海軍活動。第三條規定協同戰團事項，亦係爲未來之日俄戰爭預示限制，以防止將來各國或有助俄之事。綜觀全約，同盟關係甚爲密切，此實爲東方國家與西方帝國主義結對華同盟之第一次。同盟締結以後，英國固藉日本之力，得以舒其東顧之憂，而日本所獲得於此同盟者，則其利益尤爲重大。俄國爲抵制英日同盟起見，遂再度與法締約，並將範圍擴

張至遼東方面。

俄國爲緩和英日諸國的壓迫，於一九〇二年三月與清政府結滿洲撤兵條約，規定分三期撤兵：六個月內撤退盛京省至遼河的軍隊，再六個月撤退殘餘盛京省各段及吉林全省軍隊，又六個月撤退黑龍江全省全部軍隊，但中國須極力保證及實行與華俄銀行締結之條約，即是保證俄國在滿洲築路及採鐵、設警諸權。條約簽訂之後，俄國向各國發表了撤兵宣言。同年十月，爲第一期撤兵屆滿之期，俄政府果於前半月間將駐軍開始撤退，遼河以西，悉能如期撤盡。不料至一九〇三年四月，俄國之駐在滿洲的第二期應撤軍隊，不僅到期不撤，反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七條。其中要點，約有滿洲土地，中國不租借或割讓與他國；俄國撤兵之區，中國不得開作自由通商港；牛莊一切公務，應歸俄人管理；中國所設滿洲電線，俄國得使用之等項。此要求提出後，列強皆警告中國不得承認，而日本輿論尤爲激昂。俄國亦表示東三省斷不能無條約撤兵，即使因此與日本開戰，亦所不顧。同時俄國對於朝鮮，亦復進行壓迫，朝鮮拒絕俄國租借龍岩浦，則強於其地築砲台以備之。因是種種，日俄關係乃日趨於惡劣。計自一九〇三年七月起至一九〇四年二月止，日俄之間，迭開談判，均以各執己見，不能求得妥協，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日本開御前會議，決議取自由行動；五日，對俄斷絕國交；六日，日本艦隊出發攻擊旅順之俄艦，俄日戰爭即由此爆發。

俄日開戰以後，其戰爭所在地，除一部在朝鮮外，大部實在我之滿洲，以常理言，斷難忍受，但以彼時各國皆勸中國嚴守中立，而清廷亦以義和團事件剛了，無力從事戰爭，遂允以滿洲遼河以東爲日俄交戰地。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三日，清政府曾向俄日兩國發表中立宣言，以中國疆土供外國作戰，真是可恥可憐，達於極點了。

自一九〇四年二月俄日戰爭開始，以至一九〇五年五月日本海大海戰時止，歷時凡一年有餘。戰爭結果，俄國海陸俱敗，日本財政亦極困難，遂同時接受是年六月上旬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勸告，雙方停止戰鬪，派遣全權議和於美國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一九〇五年八月，日俄和約成立，全文共十五條。根據這次和約，除俄日同時撤去滿洲軍隊，俄國割讓庫頁島南部，日本在朝鮮確保優勢外，並由俄國將租自中國的旅順、大連以及長春、旅順間的鐵路完全讓渡於日本。於是旅順、大連、南滿鐵路等等，便如此輕易地從俄國移入日本之手。不僅如此，日本於戰勝俄國後，並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派遣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到北京與清政府締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更擴張權利於代有俄國利益之外：一方面既強迫東三省開商埠十餘處，以爲日後日本向滿洲大移民的張本；同時又規定滿韓陸路通商之最惠待遇，以取得以俄國之無稅貿易及減稅貿易同等之特權；此外，並得繼續經營安奉鐵路，更貽滿洲以無窮之後患。

上述中日協約成立以後，日本對於南滿洲的侵略，便已有了條約的根據。一九〇六年六月，日本政府設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名義上以經營滿洲鐵路爲業務，實則爲日本侵略南滿洲經濟的大本營。同年八月，日本政府復設立所謂關東都督府，成爲日本以後進攻中國之策動機關。以後又發生撫順炭礦開採問題，間島主權問題、安奉鐵路等問題，因受日本以後之壓迫，全依日本之要求以解決，舉我國南滿洲之全境，盡歸日本所有，所有礮山，隨與俱盡，其心計之毒，手腕之辣，視沙皇政府蓋尤過之。

當俄日爭奪朝鮮、滿洲時，俄英亦在西藏競爭甚烈。俄日開戰，英軍乘機由印度侵入西藏，藏兵遠遁，英國遂進據拉薩。同年八月間西藏副王班禪額爾德尼與英人締結英藏締和條約，於是西藏完全劃爲英國的勢力範圍。

第二節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辛亥革命前立憲與革命之爭

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對華投資建築鐵路與開辦各種企業的結果，客觀上刺激了中國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資於工業，中國資本主義就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下面的統計可以作為一個實例：

紡織工業情形

廠名	地點	開設年代	資本額
申新第二廠	上海	一九〇七年	一〇〇（單位萬元）
大生二廠	崇明	一九〇七年	二二〇（單位萬元）
振新	無錫	一九〇六年	一〇〇（單位萬元）
大昌	太倉	一九〇六年	—
利用	江陰	一九〇五年	七二（單位萬元）
廣益	河南	一九〇九年	一五〇（單位萬元）
和豐第一廠	寧波	一九〇七年	九〇（單位萬元）
和豐第二廠	寧波	一九〇七年	六〇（單位萬元）
廠名	地點	開設年代	資本額
立大	上海	一九〇六年	二〇（單位萬兩）
中大	上海	一九〇七年	二〇（單位萬元）

麵粉工業也有微弱的發展

裕豐	上海	一九〇五年	二〇 (單位萬兩)
大豐	清江浦	一九〇六年	一〇 (單位萬元)
海豐	海州	一九〇五年	
裕隆	漢口	一九〇九年	
漢隆	漢口	一九〇六年	

其他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建立。如山東之中興煤礦公司開設於一九〇五年，資本八十萬兩；漢冶萍公司開設於一九〇八年，資本二千萬兩；揚子機器公司開辦於一九〇七年；雲南之錫務公司開辦於一九〇八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開辦於一九〇六年等。可見辛丑條約後，在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已有一些發展，雖然這一發展還很晚。

然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始，就受到帝國主義的阻礙。這是因爲：第一，中國主要的經濟樞紐與生產條件爲帝國主義所操縱了，例如中國的關稅爲列強所掌握，祇是保護外國貿易在中國市場的繁興。中國的產業與商業反而受到國內的厘金的束縛，其他如外國商品在內地的免稅、內河航行權、鐵路建築權、採礦、伐林權之爲外國資本攫奪，都是有利於國際資本主義的；第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以巨大生產力所生產的商品足以征服中國的市場，中國小規模的機械生產是不能與此等大的機械生產抗衡的；第三，外國資本家藉着不平等條約所賦與的一切特權在中國各地所作的鉅大投資，可以利用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與廉價的原料獲取高利潤，同時可以和它們本國的資本團與企業取得密切的聯絡，這是以壓倒中國土著的資本的；第四，外國資本團可以假手於它的代理者——買辦與封建勢力佔奪中國的市場與原料，而終殺中國土著的資本主義之發展。這樣，外國帝國主義在這一時期中不

僅取得了在中國各種特權，而且已經操縱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控制着中國整個的經濟，就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能順利的獨立的向前發展。同時滿清的封建統治及其對於帝國主義的屈服，實際是幫助帝國主義來絞殺中國幼稚的工業。這就說明當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已經發生衝突，生產力要向前發展，就非打破舊有的生產關係不可。這一衝突反映到政治鬥爭上來就是：帝國主義，滿清政府封建勢力極力要求現狀的維持，舊有生產關係的保證，以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工人、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新興知識分子、一部分新官僚、農民、手工業者則要求打破現狀，打破阻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舊有生產關係，也就是要求推翻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與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道路。這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發展，結果就引起了辛亥革命。

當時滿清政府完全成爲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中國民衆的工具，滿清政府擔負着巨大的外債和賠款，同時又須供給官僚機關的揮霍；這樣，滿清政府就不能不殘酷的榨取民衆以償付外債和賠款。實際上，滿清政府就成爲帝國主義在華的稅收機關了。滿清政府對於廣大民衆之無饜的榨取，使中國民衆的生活更形惡化，羣衆的反抗也就不斷爆發。辛亥革命以前，羣衆反抗苛捐雜稅的運動到處發生，特別在一九〇六年，這種運動差不多已遍及全國，計共數千百起，參加每一次運動的鄉民人數，往往從一千到十餘萬。廣西歸順縣數百餘村鄉民反對抽捐運動，河南葉縣萬餘人反對加稅，山東萊陽幾萬人因地丁而起的運動，就是明例。據河南葉縣鄉民所發的傳單，稱當時縣官在一年內已抽捐七次，這可見當時農民的痛苦了。當時滿清政府對於羣衆的反抗一方面採取屠殺的手段來鎮壓，另一方面却也就產生了御用式的立憲運動，想用一套新的手法來維持其腐敗的、動搖的統治。

清政府雖然昏憤，但它却震駭於國內的革命運動與叛亂的進展，感覺自己的統治權隨時有被推翻

的危險。在壓伏了康梁的變法運動後，接着就是抗捐運動的開展。於是以前反對維新的，現在也都贊成立憲了。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俄日戰爭之後，一般士大夫以爲立憲可以圖強，於是駐法使臣孫寶琦首先奏請立憲；立憲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諸如梁啓超組織東京政聞社，以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相號召，要求滿清政府實行立憲。上海一些紳士則組織立憲公會，在湖北有憲政籌備會的出現，在湖南有憲政分會的建立，在廣東有自治會的組織。當時力量較大的就是朱福詵、張謇等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在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下，這些新官僚士大夫會進行各種請願運動，要求滿清政府實行立憲政治，以挽救當時的危局。清政府也想借用立憲的幌子來壓制革命，即派載澤、載鴻慈、端方、徐世昌、紹英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旋以黨人吳德拋擲炸彈，徐紹二人受傷，改派尙其亨、李盛鐸前往。光緒三十二年八月載澤等回國，清廷宣示預備立憲，以九年爲期。一九〇七年各省設立諮議局，並改考察政治館爲憲政編查館。可是諮議局却僅僅以「遵諭旨採各省之輿論，指陳各省利害，籌劃地方治安」爲宗旨，當然說不上是民意的機關，而僅僅是一些新官僚的活動場所。此外，在宣統皇帝之下設立資政院，由欽選議員與諮議局議員各百名組織而成。因而資政院的所謂議員，實際大多數却是滿族的貴族官僚，當時大家稱之爲「皇族內閣」，實在是名符其實。至一九〇八年頒佈憲法大綱，主要內容爲：（一）大清皇帝爲帝國主權所有者，不能侵犯；（二）清帝有立法、司法、召開解散國會、制定官制、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爵賞恩赦、發令施令諸權；（三）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言論、出版、集會、財產、居住諸自由權，非依法不得逮捕監禁；（四）臣民有納稅、當兵及遵守法律的義務。這個欽定的憲法大綱祇是合法地保障了清室的統治權，奴隸般的人民雖然在名義上享有各種自由權，而立法、司法諸權都操諸皇帝手中，隨時可以「依法」來剝奪人民的自由。很顯

然的，這種欽定憲法大綱只能給滿清的統治權以保障而已，但就是這種立憲，滿清政府也儘量設法使之拖延。當時各省諮議局不斷聯名請願，要求速開國會，而清廷則以宣統五年召開國會相搪塞。由此可見清廷絲毫沒有決心抹納資產階級的改革政策，於是覺悟的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乃不得不傾向於革命運動，他們對於清室的改良開始幻滅了。

由於對欽定憲法的失望，改良主義的幻滅，於是革命與反革命兩個營壘的對立就逐漸明顯，兩種力量的鬭爭也就逐漸劇烈起來。一面是革命階級反對滿清政府的革命力量：首先是廣大的下層群眾，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貧民、游民。他們受到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小私有者日益破產，凍餓死亡，因而積極要求推翻滿清政府而參加革命，他們經過哥老會的鬭爭與新軍的革命化和暴動而顯示着參加革命的堅決和英勇。其次，革命力量的另一種就是資產階級，華僑資本家和商人。中國資產階級爲着解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束縛，求得中國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而積極的參加與領導反對滿清政府的鬭爭；旅居國外的華僑資本家則企求將他們積累的資本投入國內的企業，可是當時的滿清政府不僅不能保護他們的投資與經營，而且協同帝國主義反來損害他們的投資與經營，因而華僑資本家同樣要求推翻滿清政府而參加革命。此外，當時一部分士大夫新官僚因窺破滿清政府之無能與中國民族的危亡，亦走向同情與參加革命推翻滿清統治的方向。這些就是辛亥革命的力量。這些力量，在推翻滿清的共同目標下形成一支強有力的統一戰線，在辛亥革命前不斷的與滿清政府作鬭爭。

另一方面，反革命的營壘就是滿清政府與擁護滿清政府的腐敗官僚、大地主、舊軍閥、大買辦。這些反革命階級，有的與滿清統治休戚相關，有的與帝國主義相互聯結，企圖維持其對民衆的榨取而積極擁護滿清統治，以各種方式來反對革命。至於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當時的革命運動，形式上雖然表示

中立，或有個別對清廷不滿，但一般的則實際上從各方面幫助與支持滿清的封建統治，因為滿清政府的統治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究竟是適合的。

第三節 興中會與同盟會的產生和活動

上節所述革命與反革命營壘的對立和鬭爭，就掀起了辛亥革命前革命運動的發展，和領導革命運動的政黨的出現。這種政黨之成爲辛亥革命的實際領導者的就是革命同盟會，然而同盟會乃由興中會演變發展而成，故在研究同盟會之前，應該先講一講興中會。興中會是在中日戰爭中一部分市民層和少數會黨分子組織起來的，主要的領導人爲孫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成立於檀香山，最初沒有明確的政綱，且帶着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其成立宣言雖會籠統指出『辱國喪師，翦藩腰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方今強隣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然而對於創立興中會的宗旨却又只說：『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爲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次年香港興中會所發宣言，亦只提出創立宗旨爲『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很明顯的，如果中國受列強欺凌，只是由於『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當然就沒有提出推翻滿清政府的必要，而只須向中堂大人上書，要求政府施行改革就可以。不過，雖然如此，興中會在那時却做了相當的活動，孫中山先生且曾因此在倫敦蒙難，而且和那時康有爲等所組織的保國會儼然成爲對立的組織。後來，因爲滿清政府進一步的腐敗與喪權辱國，推動了他們新的覺醒，便明

確地由改良主義走向革命的方向。尤其是從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脫險再赴日本後，與中會與康有爲的保皇黨對抗甚烈；當時保皇黨的機關報是清議報，而與中會的機關報則爲中國報，兩方時起鬪爭。同時中山先生根據自己在國外考察的心得與活動的經驗，開始確定了三民主義的主張。中山先生自己曾說他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接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者。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註二）如此使救國的民族運動，變爲振興中華的民主運動之一部。他並認爲會黨是當時最可依賴的力量，隨後與中會即與光復會（以章太炎爲首領）、華興會（黃興爲首領）合併，組織革命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是：驅除韃虜（滿清），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除此綱領外，同盟會更在宣言中指出：「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這正如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所預料的一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由此可見，當時同盟會已具有進步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它要實現民族獨立，保障民權，解決土地問題，這正是要以新的革命政權代替舊的封建專制。滿清政府的封建專制是建基於當時

（註二）見孫文學說第八章。

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上的，此等封建剝削妨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平均地權這個口號的提出，正是在當時有着重要的意義的，雖然它並不能解決土地問題。這就是說，以孫中山先生爲代表，中國人民現在是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民族的整個的使命了。這一使命雖由革命同盟會所提出，然而三民主義問題却是半殖民地化後的中國全國人民身上擔負着的普遍問題。從太平運動起，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就爲着這三大問題的解決而戰鬥起來了。然而在這以前，中國人民只是無意識地在激發着這戰鬥的運動，並沒有明白地整個地意識到自己的全部使命，而現在却看清楚了自己的三個大目標，這是同盟會一個很大的歷史功績。所以列寧對辛亥革命的綱領，譽爲『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列寧說：『孫逸仙綱領底字裡行間，充滿着奮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够。他絲毫沒有不開政治或者甚至於絲毫輕視政治的態度，甚至於完全沒有認爲中國專制政體可以與中國社會改良及立憲改革等同時並存。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直接提出民衆生活狀況問題，群衆鬥爭問題，對勞動者及被剝削者表示熱烈的同情。』雖然它只達到問題的提出，沒有達到問題的解決，可是不管怎樣，同導會是市民層代表分子和當時工人農民及一部新士大夫推翻滿清統治的聯合戰線的革命組織，是領導辛亥革命的政黨，那是無疑的了。

辛亥革命前，中國同盟會根據中山先生所指示，由已往的教訓與實際鬥爭的經驗，覺悟到革命的勝利非有力量的依靠是不可了的。於是便在三合會特別是哥老會與華僑留學生中活動，另一方面則積極在滿清的軍隊（所謂新軍）中進行工作。這種轉變顯然和過去自由資產階級上層知識分子與勞苦民衆相隔離的改良行動，完全不同了。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推翻滿清政府，一方面是由於有廣泛的及滿統一戰線，另一方面也便是由於有有力量的依靠。列寧說得正好：『如果沒有民衆底偉大精神的和

革命的高漲，中國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未能爭得共和國。這種高漲，就需要和產生一種對勞苦民衆的狀況所表示的極懇切的同情與對他們壓迫者及剝削者所表示的極熱烈的仇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就是在這種需要中產生出來的，而聯合會黨的政策，正是這種需要的反映。

民族的獨立運動是辛亥革命勃發的一個契機。滿清政府對於漢族的壓迫早就激起了一部分民族獨立運動者的反抗。例如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後，活動於南方各地而舉行過多次暴動的三合會就是一種反抗清政府的秘密結社。他們最初活動的根據地是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因着官府嚴重的壓迫，大多數會衆逃到海外，海峽殖民地是三合會最佔勢力的地方。他們的綱領是「反清復明」，疾病相扶助，貧困相救濟，其中以貧民爲中堅。自是三合會的勢力自菲律賓以至暹羅、印度、澳洲、太平洋沿岸發展甚速。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三合會的領袖鄧士良與興中會領袖相約，於廣東之惠州舉行革命，從此三合會才爲人注意。與三合會同一性質的秘密會黨是哥老會，三合會是向海外發展，而哥老會則以長江流域爲活動的地帶。哥老會在乾隆年間就已成立了，後來被發散的湘勇投入會中的頗不少，其勢益大。哥老會在清末會陰謀舉行推翻滿清政府的大暴動，不幸被發覺，失敗，後來其領袖多與革命黨相結託。此等反清復明的秘密組織支流甚多，三合會與哥老會不過是其中較著名的罷了。正是因爲他們的組織是以城市貧民與流氓無產階級爲中堅，因此就沒有很明確的政治意識。他們並不希望在推翻滿清政府以後，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權，祇是具着一種朦朧的民族意識而已。然而他們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却積極參加了反對滿清政府的鬭爭；而同時，同盟會因爲得到哥老會的援助與合作，也大大擴張了自己的聲勢和力量。當黃興在長沙舉行暴動時，哥老會的領袖馬福益遇害，這促成了哥老

會與同盟會的結合。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同盟會策動的革命軍在湖南瀏陽起事，萍鄉的鑛工起而響應，哥老會參加者亦甚多，會佔領了好些城鎮，不幸爲湘鄂聯軍所壓伏。此時在日本的革命同盟會亦因清政府的壓迫，將指導機關移到安南。不久乃有潮、惠、欽、廉之役，都得到了會黨的援助與響應。這些暴動既先後失敗，同盟會乃謀襲廣西、雲南，先後有鎮南關、河口之役，最初都得到了很大的勝利，後來却失敗了。僅僅在兩年之間，革命黨在雲南、兩廣竟前後失敗六次。於是失敗的情緒支配着一部分青年，重新開始了個人恐怖運動，如汪精衛在北京謀刺攝政王，徐錫麟刺殺恩銘於安慶，熊成基謀刺載灃於哈爾濱，溫生才刺殺孚琦於廣州。這種暗殺運動和十九世紀俄國「民意」社和虛無黨人暗殺沙皇的情形相彷彿，並沒有給人民以絲毫的益處。用刺殺個人物的手段，是不能推倒滿清政府，消滅專制制度的。而且其中有些分子如汪精衛之流，根本就說不上是革命者，而只是爲了一時的投機衝動，這有汪精衛一生的歷史可爲證明。抗戰以來，汪精衛之流所以公開成爲漢奸，充當日寇進攻中國的工具，更完全不是偶然的。

革命的進展究竟還要依靠群眾的鬪爭力量。當時在同盟會的推動下，不僅哥老會等積極參加反對滿清政府的鬪爭，而且革命的浪潮漸漸捲入兵士群眾中。他們大都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游民，他們對於滿清的統治充滿仇恨，因而在辛亥革命前會不斷的譁變和起事，如一九一〇年廣東新軍在革命同盟會的指導之下，舉行大暴動，爲官軍所平服，這是黃花崗之役的先聲。新軍失敗後，革命同盟會的影響反漸漸擴大，乃加緊活動，決定籌款大舉於廣州。當時謝良牧等曾在南洋華僑中籌得數萬盾爲革命費用，暴動的指揮機關設於香港，黃興爲總指揮。一面計劃準備軍事動作，一面派人運動新軍及防營，預備分路攻佔廣州各重要機關，與城外新軍會合。事洩，粵督張鳴岐下令嚴密戒備，到處搜

捕黨人。黃興乃與同志百餘人攻入總督署，清軍四面圍捕，死難者七十二人，黃興負傷逃香港。事後張鳴岐即大施恐怖，黨人及剪髮民衆被捕殺者甚衆。有人將殉難的七十二戰士葬於紅花崗，改紅花崗爲黃花崗，所以這次起義稱爲黃花崗之役。黃花崗之役雖然失敗了，但它却是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個有力號砲。由於這次起義的震動國內外，才掀起了全國反滿清政府的革命浪潮。

第四節 辛亥革命的經過和意義

帝國主義對華投資，在中國興築鐵路，而滿清政府則出賣築路權利。這種行爲給了中國人民以很大的刺激，而資產階級又正企圖投資於交通工業，想自己來建築鐵路。因爲十九世紀末既然開始有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新興的資產階級亦漸將蓄積的資本投於國內的企業上，鐵路商辦正是當時工業資本開始活躍的一個起點。然而這點資本主義的萌芽，亦不能見容於帝國主義與滿清的專制主義。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載澤、盛宣懷等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借款一千萬鎊，託名爲貸款築路。更因日本的欲得債權，復向日本借款一千萬圓。是年四月清政府乃宣佈鐵路政策：幹路均歸國有，支路准商民量力酌行，以前批准鐵路各案，一律撤消，如有抵抗，即照違制論。這種鐵路國有政策是新內閣成立後在御史石長信與郵傳大臣盛宣懷的建議之下所發佈的，名爲國有，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者所有。令既下，直隸的商人資產階級首先反對，他們堅持鐵路商辦已早有成案，不得以一紙命令更改，因擬推代表赴京抗議。湘粵川漢各省士紳商民皆謂：「粵漢鐵路始由盛宣懷私售與美商合興公司，光緒二十八年各省人民爭之，慘澹經營，僅得收回集股商辦。今政府忽又宣佈國有政策，與民爭利，是不啻奪我生命財產，付諸外人」。於是聯合抗爭，形勢極爲緊張。清政府主張用武力壓服抗議者，各省議

員則以不到諮議局開會以爲抵制，許多地方發生罷市罷課。清政府起用端方爲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欲倚以籠絡兩省人士。當時川路公司並電請川省京官堅持反對國有及收回股本之主張，日本留學界甚至力主「路存與存，路亡與亡」之議，川人議以拒付租稅爲抗制。粵路公司亦召集股東大會，議決保持商辦之局，致電郵部力爭聯合湘鄂川三省同志堅持到底。旅美華僑且通電抗爭，措辭極烈，川鄂湘各省議員更聯合爭路，嚴劾宣懷罪狀，這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最初反對專制政府的大運動。並且當時築路工人亦爲爭路權而發生過暴動——如川漢路宜萬工人——運動是日益蔓延擴大了；但清政府竟不爲動，仍堅持原案，於是四川、廣東都有保路同志會的設立。清廷以川督王文韶壓不力，且附和川民，以趙爾豐代人文。川人舉代表赴督署請願，爾豐拘代表十餘人，群眾擁入督署要求釋放，爲衛兵開槍擊斃四十餘人。爾豐更電京稱川人藉爭路爲名，希圖獨立，造成變動。事實上當時這一爭路運動也確實帶有比較廣泛的群眾性質，事後很久郭沫若先生曾在反正前後一書中對那次爭路群眾運動加以很生動的追寫，茲引一段如下：

「保路同志會在當時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庶政公諸輿論」，一個是「鐵路准歸商辦」。這聽說是從光緒皇帝的一道上諭上摘下來的。……由保路同志會發出來的命令，是四川人在爭路期中一律都要供光緒皇帝的牌位。理由不消說是戊戌政變的一個插話，表示這位滿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時川漢鐵路准歸商辦又是在他在位的時候實現的。這個策略在當時的指導者中可以說是傑作。保路同志會有的是錢，因爲有鐵路公司做背景。宣傳的文件因而也層出不窮，如像小冊子，如像日報，都陸續發行，還發行了無數的光緒皇帝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長條的黃紙印的，正

中寫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邊寫着「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的兩個口號，這在現在想起來，覺得好像有點滑稽，然而它在當時的效力的確在後來的傳單標語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這種黃紙條貼在自己的門口，一早一晚都焚香點燭的禮拜。……這使運動帶着了一種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時代的迷信，無形之間把群眾在一個目標之下統一了起來，團集了起來。……鐵路的股東是由各縣派來的代表，在成都所擬定的宣傳方針，在成都所擬定的運動步驟，便照樣的傳到各鄉各縣，於是俄頃之間而運動便普遍於全省。……趙爾豐早是有準備的了。他在總督署的門口及附近的要隘已經派兵把守着的了，手無寸鐵的市民剛好走到督署的東轅門，門口的衛兵便一排槍打過來，可憐爲頭的便打死了好幾個。附近要隘處把守着的衛兵聽見督署的衛兵在開槍，他們也就開起槍來，打那如潮水一樣崩潰下來的群眾。這樣，群眾便陷在槍彈的重圍中了，大家只好向兩街兩側的鋪面裡面逃避。槍聲只開了幾次便停止了。街上一街都是光緒的牌位，一街都是線香，一街都是踏脫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傷了的人，究竟有多少，當時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調查，我現在連大概的數目都忘記了。我所能記憶的，只是那死裡面有十二三歲的小兒，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媽，街上的聖位台也同時由軍警拆毀了。這樣一來，簡直是趙爾豐造反，成都全市從那天起便開始罷市。對於成都附近的縣份，消息是很容易轉達的，各地的同志會便都暴動化了。對於遠方的縣份，當時的宣傳方法是利用的「水電報」。「水電報」這個名詞乃至這個方法是四川人特造出來的。方法是在一個木板上寫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會起鑿，速來救援，上面塗以桐油，就把這種信報投在川河中，四川的河差不多是四通八達的，它便被傳達到各處下游的地方去了，這個方法最初是學生會發明的，一應用起來便一個傳十，

十個傳百了；一處的人接到了一通水電報，同時又仿造出無數的信板流下河去。在這時儘管當局者在怎樣的戒嚴，要檢查郵電，檢查出版物，然這遍地遍河的水電報，它怎樣也沒有方法來扣留了。暴動的中心是在新津，這兒是首先發難的地方。這兒的同志會把城池攻陷了，殺了縣官，佔領了縣城，各地的武裝勢力便都絡繹的投到這兒來。趙爾豐先派鳳凰山的新軍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軍不惟無戰意，而且有的竟投向了民軍。舊式的營防軍更全無戰鬥的能力。新津一縣既不能彈壓下來，各縣的同志軍又聞風興起，趙爾豐弄到無兵可派，無兵可戰的地步，他不能不屢電滿清的朝廷請援，甚至於請撤回鐵路國有的命令以緩和民意了。四川一局部的亂機已經使中國的全局騷動，各省的諮議局都起來力爭，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請朝廷速斬趙爾豐以謝天下。」

配合這種鐵路商辦運動，在當時還有東三省主權收回運動，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雲南滇礦收回運動，江浙爭回滬紹航權運動，以及各處鄉民反抗官吏苛斂運動。正是在這種全國民眾反對滿清的憤怒下，在滿清政府腐化動搖崩潰的情況下，在湘鄂粵川這種爭路運動的基礎上，辛亥革命爆發了！當時湖北新軍早已運動成熟，革命恐慌使清政府下令嚴拿革命黨人，鄂督瑞徵聞革命黨有定期起事之風說，嚴密戒備，陸續捕獲黨人甚多，而不知防範的軍隊大半已在革命黨人的影響之下。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受革命黨策動的新軍一部分——工程營首先起義於武昌，攻楚望台，佔領軍械局，響應軍隊漸眾，乃會攻督署，瑞徵等棄城而遁。起事軍隊改稱民軍，擁協統黎元洪為總指揮。遂改諮議局為中華民國軍政府，以黎元洪為鄂軍都督，湯化龍為民政廳長。於是派兵佔領守藩庫、官錢局、財政處、度支公所等機關，武昌省城完全為革命軍所佔。旋佔領漢陽、漢

口。軍政府宣佈保護外人生命財產，領事團認民軍爲交戰團體，表面宣告中立，這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幕。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九月初一日湖南黨人與新軍聯合，攻入長沙，佔領之。江西九江府新軍接着於九月初二日發動，南昌宣佈獨立。陝西新軍亦於九月初四日起事，佔領渭南、臨潼諸城，設大統領府，後改都督府。山西新軍譚變，攻入撫署，巡撫陸鍾琦被殺。雲南總督李經羲聞鄂變，繳新軍械以防變，蔡鍔率所部起事，佔領省署。同時江蘇省上海、蘇州、鎮江、松江、揚州都先後宣佈獨立，爲革命黨人所佔。浙江紳商請巡撫增培宣佈獨立，增不允。黨人遂圍攻撫署，擒增培，復與旗營開戰，敗之，浙省乃獨立。廣東商民集議主張承認革命軍政府，粵民豎獨立旗幟，粵督張鳴岐禁止之。時各地革命黨人已紛紛起事，諮議局乃乘勢宣佈獨立，鳴岐逃。廣西革命黨人起事，商民迫巡撫沈秉堃宣佈獨立。福建諮議局聞武昌起義，要求總督松壽讓出政權，松壽不允，革命軍遂起與旗兵戰，旗兵敗退乞降，松壽自殺，大局遂定。此外如山東、四川、貴州、甘肅、新疆都先後獨立，不上一個月，革命軍已佔有十餘省，滿清政府的政權乃不得不瓦解。這次革命所以蔓延得這樣迅速，一面是由於廣大民衆對滿清政府的不滿與新軍之革命化，隨武昌起義而到處響應；同時也由於一部分官僚與各省商民、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同情與擁護，隨武昌起義而威逼各省各地統治者實行獨立，而當時滿清統治的腐敗無能，客觀上自然也有利於革命的發展。

然而就是這樣速成的辛亥革命也並不是沒有經過流血戰爭的，特別是武漢之役與南京之役，都經過相當劇烈的爭鬪。當武昌起義時，清政府聞訊大恐，急命陸軍大臣蔭昌統率大軍赴鄂，又令薩鎮冰統率海軍赴援，革命軍遂開始與清軍激戰。初民軍頗佔優勢，清廷再派援軍來鄂，戰事益劇。相持月餘，民軍敗，退守武昌，清軍佔領漢陽，這是武昌起義以來革命軍所受到的最大失敗。清軍佔據漢陽

後，據龜山以砲轟武昌城，及礮和令下，始停戰。當武漢民清兩軍激戰時，南京新軍亦起事，攻雨花台，不利，退駐鎮江，及援軍至，遂組織蘇浙滬聯軍，進攻南京，皖粵桂三省亦派兵會攻，敗清軍，攻入城。張勳及滿清官吏俱遁走，南京遂爲民軍所佔，旋又攻下浦口，以阻清軍南下之師。南京的戰爭決定了清政府的命運。清廷知大勢已去，乃有民清兩軍之和議。

武昌起義後，滿清政府會企圖作最後的掙扎，挽救其已頻於崩潰的統治。一方面派軍向武漢民軍反攻，另一方面仍希望用讓步政策來緩和革命，於是頒布憲法十九條，對君權加以限制，並以袁世凱代奔勳而爲內閣總理，以代理滿清政府維持封建統治，實行所謂君主立憲制。但此時革命大勢已成，獨立各省代表齊集上海舉行各省都督府聯合會議。會議後各代表至武漢，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民軍佔領南京，各代表乃回南京，於十一月初十日開臨時總統選舉會，到會代表十七省，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大總統，黎元洪副之，定國號爲中華民國。孫中山於民國元年元旦日赴南京就職，並發表就職宣言，大意謂：「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後此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阻，必使中華民國基礎，確立於大地，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接着南北議和，清帝退位，臨時政府因又製定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註三）

以上所述，即爲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期經過。辛亥革命是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

（註三）臨時約法全文共七章五十二條，此處所引即該約法第一第二兩條條文。

命，由於這一革命的初步勝利，第一次在中國推翻了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的專制皇帝政治制度，開闢了中國和亞洲民主共和國的新曙光。這對於中國後來歷史的發展，甚至對於世界一般文明歷史，都有很大的意義。特別因為中國是擁有四萬萬數千萬人口的國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這在亞洲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國家。明白了這點，我們正可以進一步地認識：爲什麼亞洲新起的反動的堡壘——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辛亥革命後，會那樣起勁地幫助袁世凱來消滅革命，幫助他建立一切可能反動的統治。辛亥革命的第二個歷史意義，就是：在當時中國人民反帝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鬥爭中，首先推翻了滿清在中國所建立的『民族牢獄』，這在當時客觀歷史上，會是一個正確的步驟，而帝國主義者爲維持其在華的統治，正是要維持這中國國內自己爲滿清所建立的『民族牢獄』的。所以，辛亥革命雖然並沒有真正完成它所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而且留下了許多不良的結果（見下節）。可是不能否認它也會有其成就的某一面，決不止是剪了幾條辮子，而確確實實是推翻了代表數千年來專制皇帝制度和代表國內牢獄的滿清朝廷。而辛亥革命在這點上之所以會那樣迅速地成功，就是因爲當時有很廣泛的反滿民族統一戰線，正因為革命所聯合的階級範圍及革命直接間接的後備軍，都很廣泛，才使清廷陷於孤立。各帝國主義者雖希望維持滿清的統治，但在革命力量的脅迫下，表面上却不能不採取中立的態度，還沒有立即幫助反革命來進攻革命。這雖然祇是革命某一面的成功經驗，可是這種成功經驗也自有其歷史的意義。

第五節 辛亥革命的結果和教訓

辛亥革命雖然在表面上推翻了滿清政府，但封建勢力並未剷除，反革命的力量仍未受到致命的打

擊。在反革命尚保存有優勢力量的情形下，民軍方面就開始與反革命妥協了。這種妥協的表現，首先就是民清議和。在民軍佔領武漢、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民軍方面大多數的領導分子均以爲革命已經勝利，主張南北議和，以求得南北統一。爲着求得表面上的南北統一，求得清帝退位，孫中山先生向袁世凱提出五項保證和條件：第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凱轉知民國政府；第二，袁須宣佈政見，贊助共和；第三，孫中山接到清帝退位之通知後，即行辭職；第四，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總統；第五，袁被舉爲臨時總統後，暫奉行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授受事權。這種條件和保證，在表面上好像是孫中山去說服袁世凱，實際上袁世凱是以『贊成共和』的詭詞，獲取了控制民國的實權。當時袁世凱看得很清楚，腐敗的清政府已經不能繼續維持其統治，南方的革命勢力正在蓬勃的發展，僅僅是靠武力來抵抗革命是異常危險的。漢陽雖然給反革命奪回來了，而南京却爲民軍所佔領，同時各省的獨立運動正有擴大而變爲革命的內戰的形勢，所以他極力主張與南方的革命黨人暫時妥協。當時南方的資產階級畢竟軟弱得可憐，既不能領導革命向前擴大，便祇有和封建勢力妥協，他們幻想着以妥協手段去籠絡反革命的領袖，結果當然祇有失望。

民軍與反革命妥協的另一表現，就是爲着取得清帝退位，不惜承認清帝退位的條件。其內容：（一）保存清帝尊號；（二）每年發給清室經費四百萬兩；（三）保護清帝及皇族原有財產及宗廟陵寢；（四）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這種對舊皇室的優容乃是各國革命所未有的，革命的新政權既已淹有全國，尙容許滿清政府與之對立，這真是一種可笑的矛盾現象。民軍方面的這種妥協的發展，結果使革命由勝利轉到失敗，日後乃有袁世凱的稱帝與張勳的復辟。

在民軍妥協行動下，臨時總統選舉會的結果，袁世凱當選爲總統，從此袁世凱便掌握了政府的

大權。袁世凱當選後，發生了國都的爭論。孫中山先生主張以南京爲國都，以爲這樣可以給北洋軍閥以束縛。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早已看到這一着，不肯南下，自入牢籠。南京參議院派代表赴北京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袁氏遲遲不肯行，並授意部下使在北京、天津製造兵變，袁氏乃藉口北方不靖，不能南下。參議院復議決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袁世凱乃於三月十日在北京就總統職，以唐紹儀爲內閣總理，政府又從南京遷回北京，這是北洋軍閥第一步的勝利。

袁世凱進攻革命的第二個步驟便是掌握政府中的全部權力，實行總統個人的獨裁。當時唐紹儀任內閣總理，但在袁世凱的束縛與逼迫下終於辭職了，接着同盟會的閣員都相繼辭職。袁世凱乃提出陸徵祥代理，陸病不就職，乃以袁黨趙秉鈞組閣。從此內閣就成爲北洋軍閥的御用機關，袁世凱就遂行其反革命的獨裁了。袁世凱既實行反革命獨裁，即壓迫民黨不遺餘力，甚至暗殺革命黨的領袖，二年三月宋教仁在滬之被刺殺，即係袁世凱所指使。革命黨人聞之大憤，這是二次革命爆發的導因之一。

反革命進攻革命的第三個步驟，就是擴充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向革命大舉進攻。袁世凱當時最主要的依靠，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更藉日本之助，向五國銀行團（英法德日俄）借款（所謂善後借款）達二千五百萬鎊，以鹽稅爲擔保，寫添置軍械擴充軍隊之用，以進攻革命。同時積極剝奪革命黨人職權，於二年六月九日下令免國民黨三都督職（即江西的李烈鈞，廣東的胡漢民，安徽的柏文蔚），以遂行其反動統治。

在北洋軍閥對革命的着着進攻下，國民黨（當時同盟會已改爲國民黨）不能不於一九一三年在袁世凱之免國民黨三都督職命令發出後發動二次革命，這是革命黨在妥協完全失敗後，企圖挽救革命局勢的反攻。二次革命是以討袁相號召，出動的民軍均稱『討袁軍』。李烈鈞起兵湖口，黃興則進據南京

；安徽、福建、廣東、湖南亦相繼響應。討袁軍並遣冷遶扼守徐州，防北兵南下，陳其美在滬舉兵，圍攻製造局。袁世凱令段芝貴、馮國璋率軍南下討伐，自稱「國軍」。結果因南京革命軍內訌，徐州之軍退走。未幾，湖口爲北洋軍所佔，上海民軍亦不利；江西、安徽先後爲袁軍所平定，南京亦爲袁系之張勳軍佔領，龍濟光據有廣東，四川民軍亦失利，湖南、福建均先後撤消獨立。於是南軍瓦解，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乃得暫時穩定其統治。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乃向革命作最後的進攻，這就是修改約法與解散議會。袁世凱首先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不久又下令停止國會開會，解除兩院議員職務。各省省議會亦相繼被解散。另以北洋軍閥御用的政治會議代之。是時憲法會議在北京天壇舉行，憲法草案定於十月三十一日完成，是爲天壇憲法。袁世凱以所定憲法不合己意，通電各省軍民長官起而反對。末後更組織約法會議，修改臨時約法，制定新約法。袁氏即依據新約法的規定，廢除國務院，設立政事堂，至是名義上的內閣制亦宣告解體，而袁世凱事實上則成爲唯我獨尊的「皇帝總統」了。袁氏之由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獲得反革命統治權，就是以後袁世凱稱帝的基礎。

事變發展到了這裡，辛亥革命慘被壓碎已經是沒有問題了。因爲這一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務，是推翻封建勢力和爭取民族獨立，客觀上要求開闢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大道。然而北洋軍閥袁世凱代替了滿清政府統治中國以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不僅沒有被推翻，而且正像列寧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五月十八日在他寫的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一文中所預見的一樣，外國帝國主義正與中國一切黑暗復古勢力聯合着來驅軛和壓迫中國，使開闢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獨立發展道路的歷史要求又成了流產；而整個中國民衆且由於北洋軍閥的出賣，依然並進一步在帝國主義的奴役下，封建勢力

的掙取下，度着黑暗慘澹的生活。辛亥革命這樣的結果，誠所謂『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自然談不上是成功勝利的。現在應該探究的問題乃是：辛亥革命爲什麼竟會遭到這樣慘敗呢？爲什麼在袁世凱有着進攻的前面，領導這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竟不能作一有效的反攻以拯救革命呢？這裡當然不能光拿客觀的因素或者什麼『袁世凱出賣民主』來解釋，因爲袁世凱根本不是民主的擁護者，而且，『如果一個政黨底全部政治資本，只在於認識某人不可靠這種孤單的事實，它底勝算該是多麼渺茫可憐呀！』（恩格斯）所以真正的原因祇應該從社會的政治的基礎上去找，而不應該委之於某人可靠與否的孤單事實上，這種方法從歷史的觀點上說，尤其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是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革命的動力，固然包括着工人、農民、手工業者與資產階級等複雜成份，然而就當時歷史行程說，無產階級的工人還只是新茁起的幼芽，自然還不足以領導革命；手工業者與農民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根本就不大，而且歷史早已證明，農民也不能領導革命。所以在實質上，資產階級無疑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可是不幸的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那時也是很脆弱。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在政治上的表現是戊戌政變，但是前面已經說過，資產階級在戊戌政變時還只能提出改良的要求，而不敢提出革命的口號。即孫中山先生在當時亦只能向李鴻章上書（一八九四年），要求政治的改良，還沒有提出革命的口號。其後因爲種種事實的教訓，才有同盟會與革命運動的出現。可是不能否認，在辛亥革命時，中國資產階級在實質上也還很脆弱。有人說：『辛亥革命沒有堅實的民主要素，所以在實踐中失了主導的作用』，這當然是有見地的觀察。正因爲資產階級的脆弱，所以才表現了辛亥革命中民軍對反革命一連串妥協的事實。當時民軍雖會奪取了很多優勢，可是他們並沒有去謀澈底掃清數千年來腐敗的封建專制制度，而且相反地把革命政權讓給這種制度的萬惡代表者——繼續滿

清而起的北洋軍閥袁世凱，讓他假借民國的名義，去做許多禍國殃民的勾當。結果，清帝退位以後，反動的封建勢力仍是在五色旗之下掩蓋着，革命也就不能被以革命的幽靈所摧殘所縊殺了。事後孫中山先生對此是極痛心的，而且屢次拿這個事實來警戒革命黨人和國民，如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即曾公開以自我批評的方式指出這一妥協的錯誤，並謂「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爲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一個教訓。

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和教訓，可以說是還沒有把廣大群眾真正動員起來。雖然同盟會的活動已經不像過去自由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那樣同群眾完全隔絕，而在哥老會中會進行不斷的工作，可是他們在哥老會中工作的目的是經過哥老會去進行新軍中的活動，以實現其軍事陰謀，而不是真正去改造哥老會的組織，去訓練教育哥老會的群眾使成爲革命的力量。正因爲辛亥革命是單純憑藉軍事力量的軍事投機，所以在組織群眾發動與領導廣大群眾到革命運動中來的任務是沒有做到。譬如當時廣大群眾的抗捐抗稅的運動與轟轟烈烈的爭路風潮，同盟會並沒有認真去組織與領導這一運動。我們知道：如果不去發動民衆，如果沒有真正群眾運動的高漲，要想保障革命的發展和勝利，乃是不可可能的。中華民國成立後，雖則中山先生會呼籲過民生主義，呼籲過平均地權，但是他的許多同志對於改善群眾生活，發動群眾的問題則終究置諸腦後，並沒有想到去實行。恩格斯在研究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教訓時，曾經得到這樣的結論：「即令是在革命劇最初開演的時候，除非是依賴於民衆的和更進步的政黨之援助，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就不能牢牢守住它底陣地去反對那已擊敗但未被摧毀的封建的和官僚的政黨。」（註四）在中國辛亥革命時，「更進步的政黨」自然還沒有產生，而民衆的力量又沒有廣大

（註四）見恩格斯所著：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中譯本五七至五八頁。

的去發動，這就使資產階級失去真正力量的依靠，所以雖然取得了政權也不能保持，以致當袁世凱向革命進攻時，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也就不能作一有效的反攻以拯救革命。

辛亥革命失敗的第三個重要原因和教訓，就是在於當時革命統一戰線的分裂。因爲當時以同盟會爲中心的統一戰線聯盟，僅僅是在推翻滿清政府的共同目標下形成的，並沒有更明確的革命政綱，各種力量的聯合也缺乏深刻的革命意識基礎；因此在滿清政府推翻後，這一聯盟跟着瓦解，革命力量隨之涣散。同盟會本是當時聯合戰線組織，可是滿清政府剛被推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就已經流行著一種分裂聯盟的口號，即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於是同盟會也就無形瓦解了。當時同盟會雖曾發表團結同志宣言，謂「元兇未滅，如虎負隅，盟誓已寒，義士所不忍爲」。然而許多同盟分子却紛紛退去組織其他政黨，反對革命的繼續。後來同盟會終於瓦解，與統一共和黨、國民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組織合併成爲國民黨，集合官僚政客爲一集團，喪失了革命的性質，而其黨員也就僅僅進行一些議會的活動。革命陣線這種分裂，以及當時革命黨人這種墮落腐化，恰好給予反革命的進攻以最大的便當。而當時反革命的代表——袁世凱也正是首先從分化革命營壘和腐化革命分子來着手，以進攻革命的。

最後，從民族解放的根本意義上來說，當時同盟會及其領袖還有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就是辛亥革命沒有執行反帝國主義的任務。我們知道：興中會與同盟會綱領雖則都同樣地表現了自己痛切當時列強的壓迫，國勢的岌危，對於救亡圖存，大聲疾呼，但是他們都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具體主張，沒有明確將反帝當作一個鬭爭的任務。顯然的，當時興中會與同盟會的領導者，還只見到國內的韃虜統治，以爲只要推翻滿清韃虜的統治，改建民國，實行民主政治即可以自強。這樣狹隘的民族革命思想，

假使在沒有帝國主義束縛之前，還有可說。可是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事實上中國的民主革命，就必須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解放的勝利之後，才能澈底的完成。不消說，這一點在當時同盟會的綱領中是十分含糊的。當時同盟會的領導者的心目中，還以為列強能够同情與援助中國革命。所以在辛亥革命前七年（一九〇五年）時，同盟會即曾以軍政府名義發表『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的宣言，並對帝國主義保證：（一）所有中國前此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二）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佔領區域內人民財產。這四條保證不反對帝國主義的宣言，假使僅僅把它當作策略，用以孤立滿清，也許有幾分作用；然而當時同盟會却把它當作革命政綱看待，這就預先決定革命不能有澈底完成的希望。所以一到滿清被推翻的時候，他們便以為民族革命完成了，同盟會也解體了，再沒有料到中國民族解放的最大敵人——帝國主義者，正在勾結中國反動的勢力，以圖消滅革命。民國二年袁世凱果然被帝國主義所利用，致發生洪憲稱帝與宋案及借款等等反動事件，結果辛亥革命也終於走上失敗的道路。從這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當時同盟會的領導者，其革命目的只在反對滿族統治，他們把反滿的民族主義，看為整個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這是對的；可是他們沒有把反對帝國主義看為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同時，他們也沒有注意到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獨立自由，也應該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而且還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忽視，影響到當時不能鞏固革命統一戰線與廣泛動員民衆，以致辛亥革命遭受失敗。

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並不能完結中國的革命。反之，這種失敗的教訓，却會教育出更偉大的革命。恩格斯說得好：『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騷動的地方，必有一種社會為要求背景，這種要

求爲陳舊的制度所阻撓，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民普遍地強烈地感覺到，足以保證立即得到勝利，但一切用暴力壓迫它的企圖，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枷鎖爲止。『五四運動以後的歷次革命以至於現在的抗日戰爭，在歷史的意義上說，正是要完成辛亥革命所沒有完成的任務，並要求對較高級的革命任務，也能在抗戰勝利以後，求得一澈底的解決。』

第七章 五四運動

第一節 五四運動的國際環境

一九一四年秋，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必然的產物。在帝國主義時代，強大的資本家聯合（壟斷公司）和銀行，在資本主義各國生活中，已具有決定的作用。財政資本已成爲資本主義各國裡的主人翁。財政資本要求新市場，要求侵佔新殖民地，要求新地盤以輸出資本，要求新的原料產地。

但是，遠在十九世紀末葉，整個地球領土就已爲資本主義各國所瓜分。而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之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和飛躍式的：那些從前是佔居第一位的國家，比較緩慢地發展自己的工業；而其他那些從前是落後的國家，却迅速躍進，趕上和超過它們。這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勢力及軍事勢力的對比發生變更，再來重分世界的趨向出現了。再來重分世界的鬭爭，就使帝國主義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九一四年秋所開始的世界大戰，就是各帝國主義爲重分世界和搶奪勢力範圍而進行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在好久以前就爲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準備了的。這次戰爭的罪人，乃是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

特別起勁準備了這次戰爭的，一方面是德國和奧國，另一方面就是法國、英國以及依賴於它們的俄國。一九〇七年，產生了三國協約，或者說協約國，即英法俄三國的聯盟。而德國、奧匈帝國和意

大利則組成爲另一個帝國主義的聯盟，即普通所稱的同盟國。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時候，意大利退出了這個聯盟，然後就加入了協約國。當時援助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有保加利亞和土耳其。

德國之準備帝國主義戰爭，是力圖從英法手中奪取殖民地，從俄國手中奪取烏克蘭、波爾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德國建築了巴格達鐵路，就威脅到英國在近東的統治，英國長懼德國海軍武裝的增長。沙皇俄國企圖瓜分土耳其，夢想侵佔由黑海到地中海的海峽（韃靼海峽），奪取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在自己的計劃中，還要奪取加里細亞，即奧匈帝國一部分。英國企圖用戰爭來擊破自己的危險競爭者——德國，因爲德國底商品在大戰前曾日甚一日地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底商品。此外，英國還企圖侵佔土耳其所屬之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並穩定自己在埃及的地位。法國資本家企圖從德國手中奪取富於煤鐵的薩爾流域和愛爾薩斯；勞倫，而後者是使德國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從法國手中奪取去的。由此可見，帝國主義大戰，是由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最大的矛盾所引起的。

這個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的掠奪戰爭，牽連到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底利益；因此，日本、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後來也被捲入這個戰爭，甚至中國後來也去「參加」了戰爭。這樣，這戰爭就成爲世界的戰爭。帝國主義大戰是資產階級深深隱瞞着本國人民而準備起來的。當大戰爆發時，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企圖證明，不是它進攻隣國，而是隣國進攻了它。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蔽戰爭底真正目的及其帝國主義掠奪的性質。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宣稱：戰爭是爲保護自己祖國而進行的，正和現在帝國主義戰爭中英法德政府各自所宣稱的一樣。然而不管宣稱得怎樣好聽，而實際上，參戰國家的雙方的目的都是爲着掠奪別人的土地，奴役和掠奪殖民地，奪取投資場與原料資源。因此，這次戰爭不論參

戰的任何方面，都是一樣的非正義的侵略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

帝國主義的兩大基本集團既進入了互相間的拼死鬭爭，也就沒有時間，沒有力量，來繼續地加緊對中國的侵略。這便減輕了中國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而使中國最後地走入資本主義的軌道。同樣，亦是由於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使中國覺醒起來，使中國加入到全世界的革命的巨流中去，列寧說過：

『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印度、中國等等，正是因為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走出了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最後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的軌道。普通歐洲式的醞釀在他們中間開始了……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

五四運動就是大戰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鬭爭的第一個雄偉的巨浪，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偉大的民族覺醒的最初的爆發，亦就是中國捲入於世界革命運動總漩渦的開端。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給了革命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戰爭會是各國人民生活中，國際工人階級生活中最偉大的轉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成功了。正如斯大林所說：

『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群眾鬭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的一個根本轉變，是他們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的一個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對於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影響亦正如斯大林所說：

「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殖民地革命底時代。而這種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裡，是在與無產階級聯盟中，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平安無事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底紀元已經過去，無產階級覺醒底紀元，無產階級領導底紀元已經來到了。」（註一）無疑的，十月革命對於中國的民族覺醒給了極大的推動，他使中國的民族解放的鬭爭開始了一個新紀元——群眾的覺悟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鬭爭的新紀元。孫中山先生是首先感覺到十月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推動作用的，「當時中山先生在廣州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曾託華僑由美洲費重金致電祝賀列寧。」（註二）十月革命對於中國的最重大的影響之一就在它使中國人民的革命鬭爭的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使中國的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五四運動就是這個根本轉變的偉大的發端。

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歐列強雖因無力東顧，無形中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甚至對中國表示好意以便拉攏中國參加世界大戰；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却利用其接壤中國的特殊地位，利用西歐列強放鬆對中國侵略的時機大舉向中國侵略。所以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時期，同時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時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滅亡中國吞併整個中國的企圖第一次曝露的時期；是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與加劇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歐洲帝國主義無暇與無力東顧的機會，猛烈地全線地展開它的對華侵略行動，企圖把中國

（註一）見斯大林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註二）見陳鈞著：論三民主義與中國問題五七頁。

變爲它的獨佔的殖民地。在這個全線展開的侵略中，日本帝國主義使用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一切手段和方法：軍事佔領和外交恫嚇，強迫簽訂亡國條約，財政的奴役，內戰的發動和挑起，企圖在『防共』的名義下實現滅亡中國等等。所有這些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愛用的慣技，在當時已經開始採用了，直到現在還在更加熟練的基礎上擴大地使用着。

當時具體的表現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名義，宣佈對德宣戰。派遣海軍封鎖膠州灣，陸軍則大舉進攻青島。當時中國政府要求共同出兵，爲日本所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青島與膠州灣後，更破壞作戰區之規定，於是年九月二十六日突在濰縣，佔據車站。十月三日，復迫中國軍隊退出鐵路附近地方，同月六日，日本大隊進達濟南，佔領了膠濟鐵路的全線及鐵路附近各礦產。事實上，山東半島已完全處於日本強盜的軍事佔領之下。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並不以軍事佔領部分的中國領土爲滿足，而企圖實行淪中國爲它的殖民地。它以武士道所特有的無賴與蠻橫，反噬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撤兵的正當的合理的要求爲侮辱日本，突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中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所謂二十一條件，共分五號，其原文如左：

第一號

一、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

二、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三、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四、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速與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改至九十九年爲期。

二、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需要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三、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業工業等項生意。

四、中國政府，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擬開各礦，另行規定。

五、中國政府，應允下開各項，先經日本政府同意，然後辦理：(甲)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許他國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時；(乙)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六、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先向日本政府商量。

七、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劃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候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二、中國政府，允將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

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於該公司有影響，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一、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之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

一、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所有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如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辦日本材料。

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之鐵路，及南昌、杭州間，南昌、潮州各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六、福建省內籌辦鐵路贛山，及整理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時，先向日本國協議。

七、允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宣教之權。

這二十一條件是實實在在的亡國條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加於中華民族頭頸上的絞索。當日置益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亦知此種蠻橫要求，爲中國民意及各國政府所不容，故力責袁政府嚴守秘密，從速解決，並聲明中國政府如果洩漏條件，日本政府必當更索賠償。同時日本更以援助袁世凱稱帝相誘惑，一面又派大批海陸軍隊，次第開抵我國福州、廈門、吳淞、大沽以及山東、奉天等地。

，以實行軍事的威脅，當時袁世凱雖有承認之意，但尚在遲疑之中；而英美兩國得到消息亦已提出質問，日本帝國主義恐遷延生變，復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五月七日向袁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令『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止，爲滿足之答覆，否則日本政府即將執行必要之手段。』袁世凱終於屈服於五月九日午前，命外交次長曹汝霖向日本公使館交付答覆書，除第五號中各項容日後協商外，其餘一概應允。於是日本向中國要求的二十一條，便居然達到目的了。

這個賣國條約的簽訂是中華民國的最大恥辱，是我們民族生存的重大的威脅。日本猶恐這種生存的重大威脅會引起中國民族的反抗，因此便竭力促使中國的分裂，使中國互相殘殺，使中國在內戰中削弱下去。於是在簽訂二十一條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就竭力贊助袁世凱顛覆共和，恢復帝制。它深知道：經過了辛亥革命的中國人民決不會容忍帝制復活的，袁世凱稱帝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國的分裂和內戰。果然，袁世凱十二月十一日宣佈稱帝，兩星期後雲南便宣佈了討袁起義，展開了護國之役。以後的張勳復辟，南北戰爭及直皖不斷的戰爭，都可以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魔手。而且它永遠是站在中國的最黑暗反動的勢力方面的。爲着促進與延長中國的內戰，爲着財政的奴役中國，日本帝國主義者大批地供給了中國反動政府以借款，在一九一七——一八兩年間，日本政府供給了北京政府差不多將近五萬萬元的借款。（註三）

作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手段的最新一着的就是以共同『防共』的名義與中國簽訂軍事協定，而實

（註三）此項借款的名目、數目、債主及成立日期等詳情，可參看錢亦石著：中國外交史一

際上用來滅亡中國。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五月間由中日雙方好幾個公文和協約，訂立了所謂共同防俄的中日軍事協定，在這個協定之中，日本取得了日本軍隊進駐吉林、黑龍江與外蒙古等地的自由，中國軍用地圖交給日本查閱；在中國軍隊中請日本軍官作教官等等。所謂『共同防共』原來早就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二十年唱濫了的濫調，現在歡迎與日本共同防共反共的健將汪精衛之流，其賣國也不過是安福系老賣國賊的小學生。

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帝國主義大戰的機會，展開了對中國的全線的侵略，他假參戰之名出兵佔領了山東半島，他用威脅利誘的方法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了亡國的二十一條，它以巨額的借款供給中國的黑暗反動的力量，挑起了中國內部的分裂，製造了連綿不斷的內戰。二十一條如絞索一樣，緊扣了中華民族的頸項，而中日防共的軍事協定則如鎖鏈一樣，束縛了中華民族的手足。中華民族的命運已處在十分危急之中，這不能不引起中華民族熱血的兒女們的滿懷義憤與熱烈的反抗，這不能不使中華民族的廣大的群眾的民族覺醒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開始，這不能不使中國的民眾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銳鋒首先指着處心積慮要滅亡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這樣，五四運動就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鬪爭的姿態出現了！這樣，五四運動就成了今天的神聖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先驅和序幕。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俄國十月革命，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的瘋狂侵略——這是五四運動前夜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最主要的標誌。

第二節 五四運動的國內環境

至於國內的環境，則最可注意的是五四運動前後這一時期是國內資本主義比較迅速地發展的時期

。據統計，這個時期中國紡織工業之發展如下表：

年 代	廠 數	紗	錠	布	機
一九一五	二二二	五四四、〇一〇	二二五四		
一九一九	二九	六五九、七二一	二六五〇		
一九二〇	三七	八五六、八九四	四五四〇		
一九二一	五一	一、二三八、九三三	六六五〇		
一九二二	六四	一、五九三、〇三四	九八一七		

麵粉工業在歐戰中也開始發展。一九〇〇年中國只有二所麵粉工廠，一九一六年便增加到六十七所了。在歐戰期間，中國會由麵粉輸入國一躍而為輸出國，請看下表：

年 代	入 口 (擔)	出 口 (擔)	入 超 或 出 超
一九一二	三、二六一、五〇一	六三七、四八四	二、六二四、〇一七 (入超)
一九一四	二、一六六、三一八	八七、〇〇〇	二、〇八〇、〇〇〇 (入超)
一九一五	一五八、二三七	二二六、二二五	五七、九五二 (出超)
一九一六	一二三、四六四	二八四、七四七	五六、二八三 (出超)
一九一八	四、五五一	二、〇一一、九〇六	二、〇〇七、三五五 (出超)
一九二〇	五一、〇二一	三、九六〇、七七九	三、四四九、七五八 (出超)

絲業方面，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平均每年增加的資本只有五萬元左右，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則平均每年增加資本已達一百八十萬元左右。其他如火柴業、水泥業等等，於歐戰期間

也開始發展起來，例如火柴業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平均每年增加資本只有三萬元，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則每年增加資本爲七萬餘元。（註四）銀行業在歐戰中亦有發展，在滿清時僅有七行，一九二三年已達一百餘家了。這是這個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概的描述。

用什麼來解釋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在中國比較迅速地發展呢？它的原因在哪裡？原因是在：第一，帝國主義戰爭使西歐帝國主義無暇東顧，減少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如列寧所說：『東方印度、中國等等，正是因爲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他們的發展最穩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軌道。』第二，不能不歸功於辛亥革命——這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整個周期的第一個浪潮。這一個浪潮雖然沒有消除當時中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沒有消滅引起革命的客觀基礎，但是這個浪潮打擊了舊制度，推翻了滿清專制主義的統治，這樣，他便給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相當的領域。第三，就是『五九』『五四』這一時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鬪爭——首先是抵貨運動亦便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這個發展仍然是片面的病態的，比較地有發展的還只是輕工業部門。爲國家獨立生存所必需的國防基礎的重工業，則仍然停滯着，而且原有的一些可憐的企業，亦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染指所覬覦。就是在速度上說，即比較先進的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來說，仍然是非常可憐的。這裡的原因同樣是在：第一，帝國主義戰爭雖然一時地使歐洲帝國主義減輕對中國的侵略，但是並沒有根本地改變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要根本地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這祇有民族解放戰爭獲得勝利才能達

（註四）見上海總商會出版的第八卷第五號商業月報。

到；因此，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仍然受着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第二，辛亥革命雖然打擊了舊制度，但是沒有澈底打破它；雖然推倒了滿清專制，替生產力的發展多少開拓了一些領域，但是封建勢力還未被剷除，因此舊的生產關係依然嚴重地阻礙着它的發展；第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它與中國的黑暗反動勢力的結合，更加阻礙了生產力之發展。中國社會生產之多少重大的發展，也必得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者鬭爭中才能獲得。由此可見：祇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澈底完成，才能開闢生產力向前有力發展的基礎。

在國內政治方面，則『五四』前後是一個內戰連綿的時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統治，但是終以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袁世凱得到外國帝國主義，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便着着實行反動政策，建立獨裁制度，解散了國民黨，解散了各省省議會，停止了國會的開會等等。到一九一四——一五年，袁世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贊助之下，企圖最終地顛覆共和制度，而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稱帝改號爲『洪憲』。在稱帝之前，袁世凱曾經實行製造民意，製造輿論來讚助帝制，組織籌安會，出版報紙，鼓吹帝制，壓迫反對帝制的輿論，陰令各省黨羽響應所謂君主立憲制，以及組織公民團向袁氏御用的國民代表大會請願，然後再由參政院呈遞推戴書，袁氏更假惺惺作態，表示不敢承受，直到第二次呈遞推戴書才敢『登極』。袁世凱及其黨羽這樣費力偽造之後，似乎是爲民所歸，一致推戴。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不容虛造的，亦不是任何摧殘壓迫所能風服的。一手包辦的偽造輿論，其結果祇有使偽造者自己受其麻醉，得其應得的懲罰。充其量，也至多祇能夢囑一些政治上的色盲者，以爲真的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如陳獨秀之流）。然而真理既不歸偽造者，也不屬於政治上的色盲者，而必然在進步勢力一方面。果然，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及以後轟轟烈烈的護國

之役，洪憲不及百日而亡。護國之役的成功，顯然指明：經過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和君主制度調和。指明了：任何偽造民意，任何壓迫民意，決不能援救反動派沒落的命運。

袁世凱死後，由黎元洪代攝大總統職權，段祺瑞爲國務總理。至一九一七年爲對德宣戰問題，發生了黎段的衝突，因國會反對宣戰及要求罷免段祺瑞，段乃利用督軍團強迫大總統解散國會；黎召張勳入京調度，張勳即迫黎解散了國會，並且實行政變，擁戴宣統復辟。但是經過討逆軍的十多天的戰鬥，復辟軍擊潰了，復辟運動亦撲滅了。

但是國會之解散，引起國民黨的反對，中山先生召集非常會議於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這樣形成了南北的對峙。在日本帝國主義援助下，北方的段祺瑞政府採取武力政策，爆發了南北戰爭，激戰於湖南。而這時候北洋軍閥內部已分裂爲皖直二系。直系以馮國璋爲首（馮死後，曹錕、吳佩孚繼之），皖系以段祺瑞爲首。前者依靠着英國帝國主義的奧援，後者以日本帝國主義爲其主人。互相爭奪，以後即接連發生了直皖戰爭與奉直戰爭。在南方亦發生了分裂，爆發着粵桂戰爭。這樣，中國是處在循環不息的內戰中了，這些戰爭之幕後的策動者爲外國帝國主義者，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同時，也是軍閥間爭奪地盤擴張勢力的鬭爭。

由此可知，那時候，在經濟上，中國資本主義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而在政治上却處於黑暗與混戰的局面中，這裡就曝露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存在着顯著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如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所分析：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爲刀俎，而以人民

爲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非投降帝國主義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卽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卽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中國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卽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卽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試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後，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家漸致失業，淪爲游氓，流爲盜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以其土地廉價讓與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是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

這裡，把『中等階級』寫得『尤爲困苦』，這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要求自己的前途。其實，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使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增長起來，同時，使得無產階級亦日益壯大。不過，那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已用大力在提倡國貨。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必然與舊制度，舊的政治統治發生劇烈的衝突。這一衝突當然不是什麼『護法立憲』與『聯省自治』所能解決，而必然要孕育成爲大革命的爆發，五四運動正是這一大革命爆發的前奏曲。

第三節 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

在上述國際國內環境之下，五四運動的發生便成了不可避免的趨勢。而且前面所敘國際環境，還只說到俄國十月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促進作用，這當然是最基本的積極的作用；然而除此以外，當時德奧匈芬蘭等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土耳其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印度、埃及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以及朝鮮的暴動等，也都幫助推動了五四運動的來臨。同時，當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時，在和平會議上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世界各地而提出了國人的十四條，其十一條說『扶助弱小民族。』這種騙人的提議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中引起了一種幻想，這也給予五四運動的產生以相當影響。下面，我們即進而敘述五四運動本身的發展過程。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結束，一九一九年各帝國主義舉行巴黎和會，這一和會當然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當時中國政府亦想在和會中爭回一些權利，任命外交總長陸徵祥及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震組五人，爲全權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在和會中提出希望條件七項：（一）希望列強放棄在中國勢力範圍；（二）撤退各國駐華軍隊；（三）撤銷各國在華的郵政電報；（四）取消領事裁判權；（五）歸還租借地；（六）歸還租界；（七）關稅自主。時中國留歐學生，以和會關係中國甚大，特組織團體，推舉代表，探詢提案內容；而主張欲收回山東權利，非要求和會取消二十一條中日協約不可。於是五代表又作成請求和會取消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的陳述書，一並送交和會最高會議，陳述書中並請求歸還歐戰時在山東被日本奪去的各種權利。當然帝國主義是不會答應這些要求的，因爲答應這些要求，即無異提高中國的地位而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

略特別兇惡，同時它對於中國的佈置也就特別周密。在大戰正劇的時候，日本即和中國以及歐洲訂了許多條約，以爲先發制人之計；到大戰將了的時候，日本便又運動各國駐華公使，向中國提出參戰不力的警告，以損傷中國在協商方面的地位；而在巴黎和會的時候，日本更利用它在最高會議的地位，多方搗鬼，多方要挾，以牽制各國並打擊中國。各帝國主義一方爲了保持它們各自在華的特種利益，同時又被日本所劫持（事先英法政府爲了拉攏日本反對德國，曾和日本訂立密約承認日本攫取膠、澳），於是中國的希望條件便完全歸諸泡影。當時巴黎和會解決這一問題是異常滑稽的：帝國主義的強盜們說，二十一條不在和平會議的討論範圍以內；至於希望條件呢，則現在不是希望時期，將來再說。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的一般提案，既經最高會議一筆勾消，今後所進行者，誰看討論山東問題如何。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是開演這一幕的日子，這天最高會議開會時，中國代表山願維鈞、王正廷二人出席，提出中國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及其他關於山東省之德國權利，直接歸還中國之提案。提案提出後，中國代表曾有聳動視聽之發言；然而日本代表已早有佈置，中國代表發言之後，日本代表牧野，即起立宣稱：關於膠州灣之處置以及山東鐵路辦法，中日兩國早已訂有成約，根本不必提出討論。中國代表旋即聲稱：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中日協約，係被日本強迫所致，不能發生效力。可是日本代表說：一九一八年九月的山東善後協定，中國政府固有『欣然同意』之明文。因之中國在和會之地位，乃大趨於不利。同時日本對於國際方面，更大施其活動。英法意三國，因爲有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對日密約的關係，早已不能爲中國進一言；美國雖可不受拘束，但是它的所謂『扶助弱小民族』，根本就是騙人的話，所以也絕不會替中國仗義執言；且日本又提出人種平等案，以爲要挾或交換之地。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中旬，意大利代表爲着阜姆問題未能貫徹，憤然離去巴黎；日本代表更

好乘機伺隙，聲稱最高會議若不承認日本的山東權利繼承案，則日本亦祇有離去和會。帝國主義強盜恐怕分贖會議中途散夥，也就更加遷就日本，於是山東問題的解決乃全依日本意志。茲將當日協商各國對德和約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條，分別錄之如次：

第一百五十六條：『德國根據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中德協約，及其他關於山東省之一切協約，所獲得一切權利特權，膠州之領土、鐵路、礦山、海底電線等，一概讓與日本。德國所有膠濟鐵路權，及其他支線權，及關於此項鐵路一切財產，讓與日本。自清島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電線，及其附屬一切財產，無報酬讓與日本。』

第一百五十七條：『膠州灣內，德國國有動產、不動產、及關於該地直接間接之建築，及其他工事，無報酬讓與日本。』

第一百五十八條：『德國於和約實行後三個月內，將關於膠州之民治軍政財政司法一切簿籍契據公文書，讓渡於日本。同時期內，德國將關係前兩條所記權利特權之一切條約協約合同等，讓與日本。』

觀此三條規定，可知中國在巴黎和會中，對於山東問題，顯然是完全失敗。這一完全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大大的激怒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同時中國代表向北京政府電告經過情形，其中有『此次中國主張失敗之原因，一由於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膠、澳讓歸日本之密約；二由於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們當局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遂使愛我者無從爲力』等語。而北京政府在親日派勢力控制之下，又有不願屈辱，訓令代表簽字的消息，於是群情益趨憤激，五四運動就如火山一樣爆發起來了。

中國民衆怒吼了，首先是中國留法學生起來反對巴黎和約的簽字，接着北京的學生也動員起來，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約』，『誓死爭回青島』，『抵制日貨』等行動口號下，五月四日（民國八年），北京學生五千餘人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盛大的遊行示威。示威群眾首先以懸掛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交通總長）、陸宗輿（幣制局總裁）、章宗祥（註日公使）爲目標，示威洪流擁至趙家樓，火燒曹汝霖住宅，並痛毆章宗祥。當日反動政府立即派大批軍警鎮壓，拘捕學生多人，北大學生郭欣光等且因傷致死。於是引起北京學生的總罷課，宣言：外交緊急，國賊未除，日本逮捕中國學生，政府毫無辦法，今又逮捕屠殺愛國同胞，故罷課表示反抗。罷課後學生即組織講演團出發喚醒民衆，並查禁日貨，六月三日，學生因此被捕者又達千餘人。於是更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要求罷免曹章陸，釋放被捕學生，並通電中外嚴令中國代表不得簽字和約。同時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的學生及搬運苦工，先後響應，一致聲討賣國賊及排斥日貨。反動政府不懂在北京，同時在其他各地，亦對救國運動施行鎮壓：在南京，警察刺傷學生二十八人；在武漢，學生亦大批遭捕，並被軍警毆死一人；在福建，被殺學生爲數亦不少。這說明當時賣國政府，正努力替帝國主義者來鎮壓中國的救國運動。

然而親日派賣國政府對於學生及整個救國運動的屠殺和壓迫，並不能阻止五四反帝國主義的高漲，相反的，這個運動更加深入和擴展了。在全國民衆反帝國主義反親日派賣國賊的壓力之下，逼使當時反動的政府，不得不罷免曹章陸的職務，並答應拒絕巴黎和約的簽字。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拒絕簽字，給了全世界一個大震動，這正是表現了五四運動之勝利的結果。

然而五四運動的收獲決不限於此。在五四以前，中國青年學生是很少組織的。在『五四』反帝國主義與反賣國賊的國爭中，覺悟到學生本身團結組織的必要，在北京『五四』爆發後兩天，就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領導着當時的北京學生救國運動。至六月，北京、天津、南京等處學生代表因情勢惡劣，集中上海，會商互相聯絡與援助等事，感到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之需要，乃通電全國各地學生聯合會，各派代表來滬舉行成立大會，並進行籌備工作，至六月十六日開成立大會，這樣全國學生聯合會便誕生了。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青年運動的開始。在中國這個社會中，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封建思想的束縛，使知識分子的青年，首先感到這些壓迫束縛的痛苦和苦悶。他們爲西歐民主思想所感動，他們爲近代科學所驚醒。這樣就在中國民族自覺的發展中，青年學生成爲當時運動的發難者。從五四運動後，中國的青年運動蓬勃的發展着，帶給了中國社會以活潑生動的青春氣象。在歷次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中國的青年都成爲一部分活躍的力量。

不僅如此，五四運動又是一個強烈的反封建文化的運動，千古崇奉的封建的神聖——孔子竟被人起來推翻了，這是一個典型的啓蒙運動。在五四運動前已經開始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正是反映中國社會新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加強，而要求適應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的新文化。五四運動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範圍擴大了，使五四運動以前一種純粹文化上的運動，變爲與群眾運動首先是與民族解放的群眾運動相聯繫。五四以前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爲五四運動準備了民族自覺運動發展的條件，而五四運動則給了新文化運動以群眾的基礎，這就是新文化運動能够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上起着這樣深刻的影響的原因。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內容，就是民主與科學的要求，這都是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條件。五四

新文化運動對舊的封建主義宣佈了戰爭，提倡發展科學運動，這表示了中國要向着現代的社會前進。

五四運動的一個主將——李大釗，他是五四運動時代一個典型的人物，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革命的偉人，他是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是一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倡導者，他是一個偉大革命的行動家，他對於舊的中國作了死刑的宣判，對於新的中國抱着無限的希望。他在民國五年就做了這樣的號召：『吾族青年所當奮發且且，以昭示於世者，不在限縮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註五）這位徹底的民主主義者，這位革命的行動家，正是以他畢生的精力，為中國民族之解放，為中國人民之解放，為中國工人階級之解放而奮鬥。他始終忠於中國民族中國人民中國工人階級的事業，因而而遭受了軍閥的殘殺。他的名字現在為每一個中國人民所記憶着。他的事業為革命的一代青年所承繼着。

五四運動的另一主將——魯迅，對於中國社會觀察的深刻，他對於舊社會批評的深刻，他對於革命運動的熱烈同情，他從不為舊勢力所屈服，他的文學創造，就是表示了他的一生的反抗的事業。魯迅如李大釗一樣，他們之所以成為近代的偉人，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在不斷的前進，他們並不為五四運動的階級基礎所局限。但同時又是一個一貫的最勇敢的民族戰士。從阿Q正傳裡就可以看出這位民族戰士的思想態度，他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熱愛，希望，和對他們的缺點的痛恨，是始終一貫的。『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這正是魯迅的偉大的地方。

（註五）見李大釗所作青春，載新青年二卷一號。

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了反對舊禮教的鬭爭，所謂『思想的解放』，這正是傳播近代科學思想的必要前提。五四時候痛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在吃人與禮教（註六）裡說：『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這很嚴厲的打擊了中國的舊禮教。

此外，五四新文化運動，又提出對中國文字的改革，用提倡白話文來代替文言，用活的文字來傳達活的人的意思；並且提倡文學革命，開闢了以後革命文學的新道路。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富有戰鬥性的一個啓蒙運動，他與民族解放的群衆運動相連結。有些歷史家把五四運動當作一個單純的新文化運動去觀察，這是不能真正了解五四運動的，同樣也不能解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爲什麼會得到成功的。

第四節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教訓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是很大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裡的革命潮流，因袁世凱的反動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幾乎一般社會都認革命是作亂，民黨是亂黨。而民黨自己呢，則右派宋教仁、黃興等在二次革命前力主妥協緩進，使袁世凱得以借帝國主義之資助鞏固反動勢力；在二次革命後，就已有許多民黨投降軍閥，受其收買；再則，這些右派於宋案發生之後遠避於所謂法律手續，和平解決；同時各地紳商階級爲保存自己的優越地位起見，竭力去結託革命後初興的軍事勢力以鎮壓所謂『土匪』——貧民的暴動，造成新的軍閥，並且鞏固軍閥的地方政權。這樣，所謂革命黨便不啻

（註六）見新青年六卷六號五七八頁。

與廣大民衆脫離關係，袁世凱等軍閥和士紳階級自然容易拿着和平秩序的假面具欺騙一般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結果，反動勢力便完全戰勝了革命黨。

直到五四運動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終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要求自己的前途，所謂提倡國貨；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遠遠的可以聽到西歐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所以在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實在是劃時代的運動：

第一，五四運動是一個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運動，集中它的主要鋒芒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親日派賣國賊。而且在運動中還自發的結成反日民族聯合戰線，參加運動的成份包括中國社會的一切抗日的階層。在這運動裡，我們切不可只見見學生，學生不過是運動的先鋒，當時上海有工人的罷工，上海、天津等處的商人也都以實力參加，這的確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裡各階級努力以行動干預政治，帶着群眾運動的第一次；而且取得了勝利的結果，打破了日寇第一次獨佔中國滅亡中國的狂妄企圖。

第二，這一運動的意義及其影響也是非常廣泛的：在政治方面，它演變成爲一個爭取民主政治思想的運動；在思想方面，它演變成爲一個反封建思想，反舊禮教，反玄學而推崇科學思想的鬭爭；在文學方面，它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爲今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開了一條發展之路。所以五四運動，除在我們民族解放鬭爭的歷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又是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啓蒙史上的一個大的轉變點。

第三，五四運動時所發生的種種群衆的組織，如檢查日貨，抵制日貨等行動機關，往往真能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權。上海罷市的幾天內，革命的學生商人竟直接行使警權，尤其是工人的罷

工，也居然能以舊有行會的工人組織自行指揮。它不是軍事投機或軍事陰謀的行爲，而是一個廣大的革命的群眾運動。這種情形，顯而易見是辛亥革命以後第二次的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後，直到五四運動，中國的革命運動往往只是軍事的反對北洋軍閥的運動，或者只限於士紳階級的排外的愛國運動，沒有群眾的反抗，直接要求廢除對外條約，收回外國攘奪的領土的。五四運動，一方面反對賣國親日的官僚和軍閥——安福系曹章陸等，以革命的群眾的直接行動襲擊這些反動派，別方面很明顯的提出廢除二十一條，收回青島等要求。於是便把辛亥革命以來反動派與『革命』派爭相『保護外人，奪重外人生命財產條約權利』而求帝國主義者之援助的局面改變了；換句話說，便是把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尊洋主義』的大經地義打破了，這是五四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值得注意的又一點。

第四，這種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開始衝動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雖然工人階級的力量還在發動，然而它無疑的把中國革命運動向前推進了一步。這就表明：跟着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某些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也發展起來了。上海的工人——銅錫業機器工人、印刷工人、紡織工人、火車電車工人開始舉行罷工響應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出現，它走上中國政治鬭爭的舞台，這就預示着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將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後來二七罷工、五卅罷工和省港罷工中得到了證實。在五四運動中已有一部分急進的青年熱烈的同情社會主義運動，後來開始介紹馬克思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工人階級增長的基礎上，爲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準備先決條件，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的先聲。從此發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工會的組織，隨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產生，開始把社會主義的意識與工人的群眾運動相結合，這就把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提到更高的階段。五四運動要算是當時行將到來的中國大革命之序幕，啓發廣大人民的覺悟，

準備革命力量的團結，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功績。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在這運動發展中形成起來；同時，這運動也引導了業已陷於瓦解狀態的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的新生。而如果沒有中共的產生和國民黨的改組新生，是不會有後來的大革命的。

至於五四運動對於目前抗戰的教訓，則從上面各方面的分析，亦可以指出其最著要的幾點如左：

第一，五四運動是工、商、學自發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這自發的民族統一戰線對於當時反對賣國賊和拒絕簽字於巴黎和約，以及打破了日寇第一次獨佔中國滅亡中國企圖的勝利，是起了決定的作用。這一勝利的歷史經驗對於現在的抗戰自然有莫大的意義，在抗戰的烈火中，全民族的團結正在加強著，中國民族統一的過程正在完成著。兩年餘來的抗戰完全證明中國只有團結才能抗戰，只有團結才能加強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處在日寇侵略的下面，除了全民族偉大的團結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而外，別無其他方法可以挽救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和爭取抗戰勝利的重要保證。敵人所害怕的再沒有比中國民族團結更厲害的了，因此它們用盡一切方法攻擊和破壞中國的團結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是挑撥國共兩黨的合作，製造磨擦，進行反共的各種陰謀。它們正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許多弱點進行破壞中國的團結。它們知道要破壞中國的抗戰，首先必須破壞中國的團結；要破壞中國的團結，首先必須破壞國共的合作。因此五四運動所給予我們的最大教訓，就是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發展民衆運動，這是戰勝日寇的基本條件。

第二，五四運動示威群眾反對的首要對象是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這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二十一條，反對袁世凱親日派賣國賊運動的繼續發展。正因為中國人民在五四運動中嚴厲的打擊了那些親日派賣國賊，才使中國代表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才使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獨佔中

國滅亡中國的計劃不得不歸於失敗。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順利的進行，是與反對內部的漢奸賣國賊不能分離的。不肅清內部的漢奸賣國賊，就不可能進行與帝國主義作勝利的鬭爭。當今天我們進行神聖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時，五四運動的這一教訓更值得我們學習。汪精衛賣國賊之流不但早已公開投降日寇，爲日寇策劃進攻轟炸中國的城市，策劃進攻中國的侵略戰爭；而且加緊反共宣傳和活動，以破壞和分裂國共兩黨的團結；並利用它們過去歷史關係，以破壞和分裂國民黨。不肅清這些親日派賣國賊妥協分子，就不能進行勝利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神聖戰爭。

第三，五四運動時代以及五四運動以後的青年運動，表現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民族解放中青年運動的統一和團結的精神。因此我們要發揚五四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就必須：（一）接受五四運動所表現的青年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活潑生動的青春氣象，把這種優良傳統發揮到抗戰中來，積極的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在抗戰中成爲一部分最活躍的力量；（二）接受五四運動所表現的青年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統一和團結的精神，把這種傳統發揮到抗戰中，經過各種的方式，使全國青年群眾都能不分黨派、信仰、階級、職業而統一團結起來。要繼續五四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首先應當把全國的青年組織起來，增長青年自身的力量，用各種形式，擴大舊有的組織，創立新的組織，發展各種適合於青年興趣的組織。現在大多數的青年沒有組織，不僅勞動青年沒有組織，就是知識青年的組織也是非常的不够。要達到青年運動的統一和團結，不把廣大的青年組織起來是沒有可能的。要繼承五四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必須要使各方面的青年工作者，對於自己的責任，對於自己的工作方法，都要有自覺的認識。要捐除成見，要發揮民主合作的精神，同時尤爲重要的是改變某些青年團體的工作方法，就是青年的工作應該是羣衆工作的方法，而不是行政的工作方法，更不是特務的工作方法所能收效的。

第四，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文化運動與民族解放的群眾運動相結合，當着文化運動把握到群眾的時候，它就變成了把社會推向前進的一種物質力量。現在我們來接受五四文化運動的教訓，就是要把抗戰中的文化運動與抗戰的群眾運動相結合，使抗戰的文化運動，更能在抗戰中盡更大的作用，幫助堅持抗戰，幫助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總起來說，五四運動是我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光榮的一頁，是我們民族自覺和反帝反封建運動底新發展，是我國近代青年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底總發動。同時，五四新文化運動又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工人階級增長的基礎上，為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準備先決條件，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的先聲。隨着就是二七罷工與大革命的发生，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也就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脫稿

1949

8

5000

